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楊三億博士

現實主義典範研究與歐洲聯盟
軟性平衡之實踐

碩士班研究生：林佑勳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為歐盟針對美國單極強權採取現實主義「軟性平衡」戰略的權力關係之修正，並且研究過程配合從理論層次上以及客觀安全環境的文獻分析探究，獲得此次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可整理為下面三點呈現：

首先，藉由知識論邏輯實證的辯證結果選定完整的典範研究程序，說明研究過程中選擇典範的必要與現實主義典範不斷進行理論修正的進程，軟性平衡理論則是現實主義典範持續修正的結果。換言之，軟性平衡理論本身就有其存立的適用性。

次之，安全議題的範疇因為冷戰結束客觀環境改變而轉向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以人為本的人類安全議題浮現成為國際體系的威脅來源。涉及傳統安全議題的現實主義典範也需要銜接現實問題的落差，依此人類安全與軟性平衡理論產生了因果關係的連結。

第三，由於美國持有單極支配優勢，採用單邊主義與先制戰爭兩項傳統軍事戰略處理人類安全威脅恐怖主義問題，發現無法根除實質上的主要威脅源頭，反而衍生更多衝突。相較於美國，歐盟選擇以人類安全為出發點制定解決安全問題之途徑或戰略框架基礎，進而歐盟採納軟性平衡戰略抗衡美國不對稱的權力投射。

總而言之，歐盟採納軟性平衡戰略短期內得以解決人類安全的現實安全問題，於長期策劃上得以修正與美國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且依照歐盟人類安全戰略框架鞏固歐盟成員國之間互動關係、政策維繫與多邊整合進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以符合歐盟的現實

考量。

關鍵字：知識論 (Epistemology)、典範 (Paradigm)、現實主義 (Realism)、軟性平衡 (Soft Balancing)、人類安全 (Human Security)、恐怖主義 (Terrorism)、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單極體系 (Unipolarity System)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3
第二節 研究假設	7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11
第四節 文獻述評	19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37
第二章 典範的研究程序與現實主義典範	41
第一節 典範的革新？典範的長成與選擇典範研究程序的 必要	41
第二節 現實主義典範研究	53
第三節 現實主義典範之侷限	69
第四節 小結	77
第三章 權力平衡理論的修正	79
第一節 對於權力平衡概念的重新詮釋	81
第二節 軟性平衡概述	93
第三節 軟性平衡戰略與實踐評估	99
第四節 小結	107
第四章 安全觀的演進	109
第一節 傳統安全觀之更迭	111
第二節 人類安全觀	121
第三節 小結	129

第五章 單極體系下的歐盟軟性平衡實踐	131
第一節 美國的單邊主義作為	131
第二節 反恐戰爭與美國反恐作為之困境	139
第三節 歐盟的軟性平衡實踐	147
第四節 小結	161
第六章 結論	163
參考書目	169



表目次

表 1-1 歐洲化的選擇模型	32
表 2-1 有效的否證矩陣	46
表 2-2 現實主義學派的硬核與保護帶	72
表 3-1 權力平衡理論的修正歸納	89
表 4-1 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觀之比較表	118
表 4-2 安全研究的分類模型	119



圖目次

圖 1-1 研究架構	37
圖 2-1 科學革命的結構	44
圖 2-2 輔助性假設組成保護帶圍繞硬核概念圖	50
圖 2-3 結構現實主義概念圖	58
圖 2-4 現實主義學派保護帶長成概念圖	74
圖 3-1 軟性平衡戰略實踐過程分析圖 A	105
圖 4-1 軟性平衡戰略實踐過程分析圖 B	128
圖 5-1 軟性平衡戰略實踐過程分析圖 C.....	159



第一章 緒論

回顧當今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演進過程，其中扮演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之中佔有首屈一指地位的現實主義學派，本論文尤指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在冷戰結束之後遭受大批國際關係學者們的重新檢討與再反思。如欲探究其主要原因，在冷戰時期由美國與蘇聯所構成的兩極平衡體系崩解便為壓倒結構現實主義解釋力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冷戰的結束使得結構現實主義所支持的核心理論概念權力平衡在蘇聯政權倒台之後一併瓦解，使其成為無法解釋失去兩極平衡後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國際體系的浮現，並且伴隨以區域為主體的整合所帶來的衝擊，尤其當歐洲地區堪稱為區域整合過程的模範，其實質上改變了過往結構現實主義下權力平衡理論解釋力所能夠涵蓋的範疇以及其理論所能解決的問題。

此章將分為五節做為說明，第一節點出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亦即傳統的權力平衡確實存在解釋力的問題，企圖以修正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為出發點，並且舉出歐盟因人類安全之變因而採取的軟性平衡作為，進而達到軟性平衡確實會產生作用的論述目的；第二節為論文研究假設，此節暫且提供研究問題三個暫時性的答案，其一是典範會存立，但並非一成不變。其二，國際新興安全議題改變了國際體系中行為者的權力關係本質。其三，歐盟考量本身權力配置問題，而必須採用軟性平衡戰略；第三節主要以論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途徑為呈現，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法，此外並站在結構的視角，以軟性平衡作為論文研究途徑切入點；第四節文獻述評部分回顧研究歐洲整合課題各項主要理論架構並釐清之，以確定在何種情況之下哪些理論比

較適合處理何種歐洲整合的問題；第五節提供本論文章節安排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動機源起在於國際關係學者一般認為，冷戰結束之後結構現實主義無法有效解釋並且處理為什麼一個穩定且相互平衡的兩極體系會崩解的棘手問題。即使如此，結構現實主義學者們並不贊同上述的批評，支持結構現實主義一派說明指出，在兩極體系之後所成形的單極領導或是一超多強的體系中，結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體系之內的行為者的互動運作過程產生了不同的行為模式而已，此即體系的改變(Changes of the system)是經常發生，但是在體系內部本質的改變(Changes in the system)的確是不太可能輕易出現，支持結構現實主義一派認為，結構核心的改變是與體系內部的單元層次改變為完全不同的兩個層面。所以結構現實主義學者預言，權力平衡將會再度出現。換言之，依照結構現實主義對於結構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行為者只能自助(Self-help)的結構假設脈絡之下，在當今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之中，其他次級強權國家(Second-ranked great power state)依然會為了抗衡單極的超強成為霸權的行為，而進行與之抗衡的行動，一個新興型態的權力平衡模式就會再度出現。¹

基於上述，即便如同結構現實主義學者們所言之，一個新興型態的權力平衡將會再度出現，以抗衡任何超強成為霸權的可能，但是結構現實主義學者們並沒有能夠斷定這種新興型態的權力平衡，在國際情勢變遷的環境下，是否依然會依照傳統的硬性

¹ Kenneth N Waltz,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pp. 5-38.

權力平衡(Hard Balancing)的型式出現。因此，在今日國際重要安全議題的重要性逐漸提升之際，當面對這些來自單極體系可能成為霸權所造成的問題時，區域體系內的國家或行為者，例如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是否還會採取相同的途徑，也就是傳統的權力平衡之行為模式來進行抗衡的動作，在檢閱相關文獻的過程中，對於上述權力平衡作為的疑問並沒有獲得一個確切的答案，因而值得後繼研究者持續研究。

貳、研究目的

本文的主要目標便在區隔傳統硬性權力平衡中不同概念的軟性權力平衡(Soft Balancing)之實踐與觀察，以探究軟性平衡是否能夠成為國際關係權力平衡研究的新型態，或是成為可能的國家對外政策的合理選擇模式。其中在軟性平衡的實踐案例的部份，本論文採取以歐盟在掌握國際重要新興議題中所提出的人類安全議程(Human Security Agenda)為經，而歐盟在 2001 年阿富汗、2003 年伊拉克反恐怖主義戰爭的軟性平衡觀察為緯，以進一步探究歐盟如何回應冷戰結束後由美國所支配的單極體系所帶來的強力區域壓迫。一方面，歐盟獨特的整合體制，對於人類安全的概念而言，能做出具有效益的成本利益考量和價值散播的功能，且在另一方面，歐盟可以藉此議題所產出的安全外部性來有效抗衡美國單極體系的單邊對外行動，或甚至是抗衡未來體系中可能崛起的強權國家。

然而，值得關切的地方在於，歐盟的這種抗衡行為與傳統結構現實主義的硬性權力平衡(以軍事為主的軍備競賽、戰爭聯盟的建立與對峙等)是存有不同的內涵的，歐盟在冷戰結束之後，面對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系，在特定議題上其所選擇的是軟性平

衡的抗衡作為。由此延伸，本論文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點次要目的：

一、期望透過此次研究，能夠使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滲入更為多樣的思維，且軟性平衡是建立在符合科學歸納、演繹與假設驗證的邏輯基礎上，²藉由典範研究程序的知識論強調，使得軟性平衡加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在描述、解釋或預測國際情勢的功能能夠更為完整，更加貼近現實並且符合國際關係發展。

二、人類安全議題為研究國際關係學者原先鮮少關注的議題領域，隨著冷戰結束，國際情勢改變，人類安全議題的提倡也許會是改變國際行為者採取不同戰略的關鍵變因，透過此次研究，希冀研究國際關係學者能夠持續注意人類安全議題，並且本論文試圖透過不同的軟性平衡理論視角進行觀察歐盟在相關人類安全對外行為之採納與施行。

三、雖然權力平衡理論已經有過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探究，但是以往的探討大部分著重在國際政治結構的方向，以從軍事層面的議題著手進行傳統權力平衡的論述，然而歐盟在美國反恐怖主義戰爭的對外政策回應時，歐盟基於人類安全威脅因素介入，並且選擇一種有別於傳統權力平衡的軟性平衡的展現。因此，對於傳統權力平衡的理論，或是現實主義學派，可能有重新被認識與省思的空間。本論文認為軟性平衡確實是存在且會發生的，並認為軟性平衡戰略是得以解釋透析歐盟的內部整合以及其對外政策的架構，並依此提供一套國際關係理論之機制以及操作的實況探討為目的。

² 徐宗國，2008，〈紮根理論研究法：淵源、原則、技術與涵義〉，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頁 45-46。

第二節 研究假設

假設(Hypothesis)是研究問題的暫時性答案，並且以明確描述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與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關係的形式呈現出來。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符合社會科學「律則式解釋」(Nomothetic explanation)的邏輯，律則式解釋具有三項指標，變項之間有無相關性(Correlation)為其中之一，例如學校實施點名制度對學生成績有無改變；必須符合時間順序(Time order)，確定變項是因在前果在後；最後為兩個變項之間不可具有虛假關係(Nonspurious)。³此外，研究假設尚必須要具有幾項特徵，首先是假設必須是清楚的，以概念的方式來加以定義所有變項，尋找一個適合變項的定義；第二，假設是明確的，必須指明變項之間所預期的關係正、負方向，以及關係成立的條件；第三，假設必須有可供使用的方法進行檢證；最後是，科學性假設是價值中立的，因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發生在社會環境裡，研究者必須瞭解本身的環境以明確表達既有立場。⁴

在建立假設之前，本文試圖思考下列幾點問題。首先，冷戰結束之後在探討過去現實主義的理論演進脈絡時是否能夠適用所謂典範(Paradigm)終將進行典範轉移的科學革命轉變？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脈絡如果是不同於典範轉移的科學革命，那麼現實主義一派的理論建立與延續又是如何以其他較符合科學的方式來認定知識且承先啟後的？對於現實主義理論進行反思的軟性平衡該如何在典範變遷的過程中站穩腳步？次之，有別於過去國際體系

³ 邱泯科、陳佳穎、蔡毓智、姜馨彥譯，Earl Babbie 著，2004，《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台北：雙葉，頁 105-106。

⁴ 潘明宏、陳志瑋譯，C. Frankfort-Nachmias、David Nachmias 著，2003，《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韋伯，頁 78。

所強調的軍事安全議題，本文關切當今國際重要新興議題的地位提升，而其中，非傳統安全範疇之人類安全議題是否改變了傳統國際體系內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本論文納入歐盟為何要提出人類安全議程與其他國家行為者(本論文尤指美國)之間作為互動模式為案例，以說明如果非傳統安全範疇的議題改變了體系內國家互動的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種新的互動模式其中的權力關係或內涵是什麼？順此，是否歐盟會選擇一種有別於傳統硬性權力平衡的軟性平衡，作為其本身對外互動的新方式？又這些軟性平衡的戰略選項又該是如何展現？

延續上述所提出的問題，本論文設定以下幾點假設。假設一，理論的產出是為了有效解釋國際現狀。典範會存立，但並不是一成不變，所以檢視的關鍵在於現實主義學派是否因為國際情勢變遷而遭受批判，現實主義理論沒有發生典範轉移的科學革命，硬核(Hard core)依然不變，結構的影響因素依然存立，而是現實主義理論在當今國際體系中所能夠體現的現實不同於過往，本文假定以軟性平衡的戰略作為一種調整的過程，相較於使用傳統硬性平衡戰略更具有解釋力，然而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並非拋棄固有現實主義理論，些許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與假定依舊適用。假設二，除了在理論層次之外，國際情勢的變遷會改變國家本身對於安全的重新認識。國際新興安全議題改變了國際體系中行為者的權力關係本質，以及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關切的主體與所涉及的範疇跟過往不同，因此影響所及是體系內行為者對於戰略思維選項之選擇的改變。假設三，伴隨國際情勢的變革，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對於安全的看法都會有所轉變，因而歐盟在選擇對外戰略時也會有不同的考量，歐盟考慮本身權力配置問題，而採用軟性平衡手段於以抗衡美國單極體系，以非軍事性的

外交方式去拖延、阻止或是以削弱的方式抗衡，例如拒絕領土的授予、糾纏外交、經濟上的鞏固、釋放予以平衡的訊息以及區域主體自主性的強化等戰略選擇以鞏固本身聯盟利益。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壹、研究方法

如果將「研究」的英文單字「Research」做單字字首的拆解，可以將其拆解成為「Re-search」，從字面上所呈現意涵就是「再尋找」的意思。研究，顧名思義，就是一再的且不斷重複尋找的過程。研究便是針對不同問題本身，以不同的方法蒐集資料、取得資料並且分析所獲得的資料，藉而回答問題，進而建構知識最後完善研究結果。換言之，研究社會科學就應該有不同於自然科學的資料蒐集方法存立，數字、公式、統計，為自然科學常見的量化研究方法，但因為在人類生活的環境當中是充滿各式各樣的符號標語，多樣的訊息反映出的是社會的現實情況，如果研究者要分析這些社會的現實情況或瞭解社會問題，就比較難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只以數字、公式、統計去量化推論。相反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必須用文字、語言、觀察或參與的研究方法，才能更適切的理解社會現象，此種依靠文字與邏輯辯論的研究方法，稱為質性研究法。⁵本論文建立在質性研究法的脈絡基礎上，較傾向質性研究法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歷史分析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以真實的呈現內容。⁶本論文之文獻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法內容分別由下列所陳述：

⁵ 蕭瑞麟，2007，《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台北：台灣陪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46。

⁶ David M. Silbergh, 2001, *Doing Dissertations in Politics: A Student Gui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25-139.

一、 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所選定的文獻資料以第二手資料為主，例如期刊文章、專書、研討會論文，⁷採用文獻分析法主要有三點理由，第一，採用文獻分析研究方法能夠對無法接近的主體進行研究；第二，文獻分析法能夠增加研究本身的客觀性，不必忌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而影響研究結果的客觀性；第三，有助於未來長期研究分析，找出因果關係。⁸而評估資料來源時，主要選定美國《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當中，2005 年份，第 30 期中有關談論軟性平衡的文獻作為本文文獻分析的基本理論架構。分析期刊文獻中，對於軟性平衡的評述，此外再輔以國際關係理論、歐盟整合理論、知識論辯證、安全、歐盟官方文件等文獻整理探究當國際情勢變遷，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觀的變遷對於歐盟對外戰略選擇的關聯性，採取詮釋文獻資料的方式，針對上述文獻作客觀的分析，以進一步驗證本論文的主要觀點與論述。

二、 歷史分析法：

歷史與這個世界上很多事物的行為模式都有極大的關聯性，國際關係對既有世界的認識的研究也逃脫不了歷史的因素。歷史的功能在於，透過經驗的與物質上的累積重新建構，除此之外，歷史思想的辯證實證也是具有科學價值的，再加上解釋現象時透過邏輯推論的能力，歷史研究途徑也可以是一項好的方法。雖然政治學或國際關係一直是以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研究政治現象，但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究竟是否為科學，牽連到下列幾項以往

⁷ 同註 3，頁 82-90。

⁸ 宋鎮照，1997，《社會學》，台北：五南，頁 105。轉引自林泰和，2011，〈歐洲聯盟打擊恐怖主義洗錢措施之演進與展望-後 911 的政策研析〉，《歐洲國際評論》，第 7 期，頁 32-33。

所堅持的研究方法，即尋求簡約性、獨立變數與自變數的區別、對於現實改變的解釋、客觀性以及共同性等，即便政治學與國際關係一直以來堅持上述方式來形成科學，但是只要科學有其信念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研究可以有更多的方式來完成科學，歷史分析法就是其中之一。⁹本論文使用歷史研究法，目的在建立事實以及達成對過去事件的相關論斷。¹⁰理論是歷史的產物，歷史是理論的基礎，¹¹透過參照過去歷史有助於梳理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脈絡，如果將國際關係的研究與歷史作區隔，研究的成果將無法貼近現實。本論文在分析時，包括安全觀由傳統安全觀演進至人類安全觀的歷史脈絡，並且也將焦點擺在回顧美國 2001 年阿富汗反恐怖主義戰爭，當時處於由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系中，說明歐盟制定哪些對外政策或戰略或是官方回應，以訴求美國應該緩和反恐怖主義戰爭的範圍的擴大，進而藉以觀察歐盟軟性平衡的作為。在這部份的資料蒐集方面，主要選擇期刊文章、學術論文以及相關報導作為歷史分析的基礎。

貳、研究途徑

確定研究方法之後，接著則是處理本論文研究途徑的問題，本論文是站在結構的視角，以結構現實主義軟性平衡作為研究途徑切入。回顧軟性平衡的理論架構，其依然是結構現實主義中的結構概念脈絡，亦即國際政治的根源是由不同的體系(System)所組成，而體系則是由互動的單元(Unit)所構成，並且受結構的影響。結構現實主義學者們認為，結構是由體系的部分安排所定義

⁹ John Lewis Gaddis, 2001,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 Karen A. Mingst and Jack L. Snyder,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Y: Norton Company, First Edition, pp. 11-16.

¹⁰ William B. Casterter and Richard S. Heisler, 1977, *Developing and Defending A Dissertation Propos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 19.

¹¹ 倪世雄，2003，《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頁 9。

而成，此安排便是體系以及互動的單元。以國內政治結構為例，國內政治是一種上下階層秩序，而單元便是各個制度與部門，各個政治部門在上下階層的結構之下，因為他們的權威性與功能性上的不同而在結構中就會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擁有不同的權力基礎，這與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一樣，相同的階層結構，會創造相同的結果，但有別於垂直權力安排的國內政治結構，國際政治的結構為無政府狀態的平行權力安排，亦即無單一權威性行為者可以掌控國際政治的權力安排，故呈上所述得知，下列這三項概念得構築成本文要討論的結構：¹²

一、秩序的原則(Ordering principle)：

不同於國內政治階層秩序，在國際政治中，體系與體系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上下階層之分並不是主要現狀，本文沒有排除國際體系中的上下階層的存在，但國際政治還是以去中心化且呈現無政府狀態為主要。在無政府狀態的結構秩序下，體系內之國家行為者成為最主要的單元，每個單元都是自助的，因此，生存(Survival)成為國家行為者追求的永續目標，在無政府的秩序之下，每個國家行為者都希望其他國家行為者能夠以相同的模式追求生存。

二、單元的特色(The character of the units)：

在無政府的秩序之下，國家成為最主要的單元行為者，在此必須說明 Kenneth Waltz 並不排除體系內有其他行為者的存在，

¹² 請參照 Kenneth N. Waltz, 2001, "Political Structure," in Karen Mingst & Jack Snyder,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pp. 70-76. 有關傳統權力平衡的理論，請參閱信強譯，2003，肯尼思·華爾滋 (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

由於無政府秩序依舊不變，國家便會是相似的單元(Like unit)，國家行為者的相似並不是其國內資源或是外交政策上的相近，而是國家行為者在體系內所必須面對的事物是相似的；

三、 權力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在無政府秩序之下，國家單元之間的功能並沒有獨特的差異，而其彼此有所差異的地方是在於行為者之間所擁有的權力大小與內涵是不相同的。

上述三項概念的建構，即結構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政治中的「結構」，這個結構的存在，會進一步影響到國家行為者的戰略決策過程，即在國際政治中，由於自助體系的壓力之下國家行為者彼此之間只能不斷地追求國家權力與利益以保持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生存的完整，故結構造成國家行為者的決策行為，國家戰略大方向要改變，除非結構發生變化。由於無政府狀態的存在，自助體系成為無政府狀態秩序下影響行為者最深的因素。國家行為者之間因為沒有更高的權威機構可以監督與管理，國家行為者只能透過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之所得，以及所失，來評斷在某個特定時期，哪一個國家行為者的權力比較強大或比較小。因此，為了穩定的生存國家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平衡便有其必要。在權力平衡體系運作中，國家是單一且理性的行為者，在行為者內部部分，只有不斷的增強自我實力，在外部部分，與他國結盟或是與其他聯盟對抗。但不可遺忘的前提是因為結構的因素，無政府狀態的存在，國家為了追求生存，又在自助體系的影響之下，

最終權力平衡便是國家行為者之間可能是較為理性的政策選擇。

13

然而，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平衡產生權力不平衡的過渡過程是經常發生的情況，綜觀過去歷史，單極強權國家追求成為霸權的政策最後都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因為其他次級強權國家可能會起而平衡這個強權，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這些次級強權就例如歐盟成員國、俄羅斯、中國、日本或是其他區域行為者如土耳其或巴西等。¹⁴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當這些次級強權國家在操作權力平衡時，本論文認為它們並不會以傳統硬性權力平衡的方式去抗衡，不論是以單獨國家行動或是以組成軍事聯盟的方式，因為同樣地，次級強權所要付出的抗衡成本利益太大。反而，次級強權國家會以非軍事性的外交工具去拖延(Delay)、阻止(Frustrate)或是以削弱(Undermine)的方式抗衡美國的單邊軍事政策。¹⁵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國際政治中是不是有一種有別於硬性權力平衡的平衡概念可能出現，本論文認為即軟性平衡。軟性平衡是一種利用國際制度、經濟手段或外交手法等，以抗衡國際體系中的強權，也許軟性平衡不是以直接的手段阻止強權使用武力去達成其軍事目標的行動，但軟性平衡可以有效提高強權對外政策的成本代價或減少合作的可能等。

從結構的途徑進行剖析，主要是關切到研究國際關係時本體論上的特定條件，國際關係許多行動均發生於一套事先就存在的結構化的環境之下，這些環境不論是由政治面、經濟面抑或是國際體系面等相對自主性的結構所組成，換言之，結構塑造了行為

¹³ Kenneth N. Waltz, 2001, "Political Structure," in Karen Mingst & Jack Snyder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pp. 80-86.

¹⁴ Robert A. Pape,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 8.

¹⁵ 同註 14，頁 10。

者的行為，是行為者在特定結構環境下必然的產物。但是以結構為研究途徑也遭受相當的批判，以代理人(Agent)的個體主觀意向為研究基礎的一方便認為，應該將更多焦點擺在行為者究竟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程度有多少的問題之上。例如，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美國成為單極領導體系支配國際關係的發展是受到全球化、國際組織或其他環境上的壓力所導致，支持代理人論述卻認為是美國國內領導者個人人格特質上的作風以及心理因素所造成之結果。結構與代理人之間的辯論一直都沒有終點，而事實上也沒有太多辯論的價值。¹⁶

如同類似在物理學廣義相對論的研究中提到，當每個空間所存在的點與點之間都是絕對均勻時，每個點之間就會是相對存立的，研究者經由不同的點之間所切入分析研究的物理現象就會得到相異的結果，假使研究者如此為之，漫無邊際的擴大研究範疇，則物理世界的研究將會產生大混亂，故研究者需要設定一個假定來界定研究範圍。國際關係的研究也必須先選定研究的立場，不同的立場就需要不同的途徑來支持，結構的途徑並非在試圖忽視代理人的存在，而是經由結構途徑的分析研究者能夠獲得對於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一定程度上的了解，代理人的研究途徑亦然，研究途徑本身必然有其優劣區別，這部份涉及到研究者本體論、知識論以及方法論的假定選擇問題。由於礙於論文題目限制，不宜於此處探討，但是研究者必須更加關注的是是否研究途徑與所預期的研究結果之間的適切性問題。

¹⁶ Stuart McAnulla, 2002,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Y: Palgrave Macmillan 2nd ed, pp. 271-291.

第四節 文獻述評

將相關研究問題的文獻予以整理，並且針對關鍵重點做出述評，其主要目的不外乎在於透過文獻的歸納能夠熟悉問題的歷史、對於問題的理論背景更為清晰明瞭、評估先前研究的優點、避免重複的問題研究，以及批判文獻資料的侷限所在。¹⁷而歐盟本身獨特的特質，使得在研究歐盟議題必須透過了解更多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例如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等)、衍生性的研究理論(又例如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等)或是多樣化的途徑來多方面觀察歐盟的整合或行動，藉由先前文獻之耙梳得以提供本論文清晰的歐盟整合之理論脈絡，進而了解過去歐盟整合上研究者所著重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問題點，以鑒往知來吸收先前研究成果的優點而採納更多未來理論研究上的突破，以使研究者更能貼近國際情勢變遷後歐盟整合過程或其對外行為的真實面，有鑑於此，以下便以上述為基礎來組織本論文的文獻探討與分析，並分為國際關係理論對於歐盟整合的評析、歐盟整合理論兩部分文獻探討呈現。

壹、國際關係理論對於歐盟整合之探討

在討論歐盟的整合理論之前，我們必須先將以往研究國際關係的途徑、理論加以區隔且分開說明。首先，以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不同為區分標準，就可分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m)、反思主義(Reflectivism)兩種理論途徑，與介於兩者之間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主要差異在於理性主義主要是以經驗性的、自然主義方式、主

¹⁷ 同註 10，頁 28-29；33。

體與客體之間分離、行為主義的方法再加上討論真實存在的事物的價值為途徑來分析國際政治的運作，換句話說，理性主義研究者只不過是對於客觀存在的事物作探討(What it is)，例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學派；至於反思主義則是以應然(Ought to be)為原則作為出發，且反思主義認為主體與客體之間必須融合探討才能完全的了解國際政治各項層面上的運行，例如批判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學派。以下便就對於在這兩個研究途徑的大架構之下來探討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如何解釋或描述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¹⁸

一、 理性主義：

(一) 新現實主義為理性主義陣營中的其中之一，新現實主義有下列五項核心假設，第一，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是主要的行為者，且在國際無政府的結構下生存；次之，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形塑國家行為的主要因素，國內因素影響不大；再次，國家行為者具相似性，國家行為者為了保障自我國家利益，擴張權力且成為理性以及單一的行為者是不可避免的；又在國際無政府之下，生存成為國家行為者最主要的目的，因為行為者本身無法確認其他國家行為者的意圖，即使合作的情況下亦是如此；最後，制度是因為國家行為者追求國家利益因而建立，制度並無法自動影響國家行為者，國家與制度都是中介變項而非自變項。

如同上述，新現實主義者對於歐洲整合的觀點主要有下列兩點，即冷戰的結束，歐洲國家之間的相對利益增加會一同增加合

¹⁸ Steve Smith, 2000,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US: Routledge, pp. 33-34.

作的障礙，制度的建立無法克服合作的障礙。新現實主義認為歐洲整合的確有合作的出現，但是在整合過程中依舊被相對利益的問題所限制，且在制度中無法解決大國操作制度的可能性。美國杜克大學教授 Joseph Grieco 站在新現實主義的立場，認為歐洲整合的關鍵在於這個制度中能夠提供成員國在加入後相當大的利益，例如提高新會員國貨幣的穩定等這種帶有共享公共財的制度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點即是加入歐盟整合的制度後各國對共同政策都有不同的發聲權，獲得強勢國家的共識妥協，就能在歐盟體系內佔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這點也是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的結構之下，歐洲國家會去選擇的一種權力的分配與平衡的方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Andrew Moravcsik 認為歐盟成員國在保護本國主權的前提之下，彼此之間協商出一系列各國均可接受的最低公約數(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透過制度創建以及國家為主的利益協商，進而使成員國在整合過程中得到預期的個別獲益。¹⁹

(二)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核心假設如下，第一，國家在許多議題下並非主要的行為者，反而是非國家行為者才是重要的角色；次之，國家不是單一的行為者，不同官僚組織會對國家利益有不同的需求，故國家不能完全是絕對理性的；第三，經濟才是影響國家行為的主要因素，國家之間當合作模式存在，例如創立制度，國家會開始在制度中運作；第四，國家行為不完全來自無政府狀態的形塑，無政府狀態是可以經由制度而被改變的環境；最後，透過國際制度的合作，可以改變體系運作的困境與現狀。

¹⁹ 同註 18，頁 43-45。

新自由主義認為新現實主義並沒有考慮到西歐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本質，即便無政府狀態依然存在，制度內並不是一種階層制的型態，所以行為者可以選擇制度合作來追求絕對利益，而且制度有下列重要因素：制度的合作能擴大日後合作的範圍、制度能夠有效連結議題、制度提供大量資訊以及增加資訊運用的透明度、制度可以降低行為者之間的交易成本以及制度能擴大既有的絕對利益的範圍。新自由主義一派認為整合最主要的動因還是來自國家本身對於利益的需求，透過歐盟制度的創建在加上國家政府間利益協商，歐盟各成員國可以獲得各自考量的絕對利益。²⁰ 國內學者盧倩儀教授認為，歐盟成員國的偏好不能獨立於所處的制度之外，這些制度在具體方面表現在歐盟的機構與法律，而在抽象層次上包括規範與想法等。²¹ Mark Pollack 也強調必須關注歐盟超國家制度(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在歐盟治理或整合的進程中所扮演的獨立影響力，在透過議程設定的權力上產出結構誘導的效力以影響各成員國投票的結果，超國家制度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成為權威代表且享有自主性進而轉變決策內涵。²²

二、 反思主義：

儘管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都提出了對於歐洲整合的分析觀點以及有效的運作方式，但是理性主義依舊只是單獨對客觀存在的事物作探討，新現實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便將焦點完全放在國家行為者的身上來研究歐洲的整合過程，只單純解決現有存在的問題，但實際上如同反思主義學者所言，國家行為者的研究

²⁰ 同註 18，頁 45-47。

²¹ 盧倩儀，2010，〈整合理論與歐盟條約修改之研究：以歐盟憲法條約與里斯本條約為例〉，《政治科學叢論》，第 46 期，頁 119。

²² Mark A. Pollack, 1997, "Delegation, Agency,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1, pp.99-131.

固然重要，但是完全排斥國內因素的現實情況配合，則無法完整的分析歐洲整合的實際運作過程。反思主義即為解決理性主義的不足而挑戰理性主義學者。例如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國內洪鎌德教授認為批判理論強調知識與利益的連結，其揭露知識形成背後的多樣政治因素，如藉由論述撇開社會對個人本身造成的諸多限制，國際關係因而得以發生轉變，²³批判理論即認為歐洲整合的過程中，論述(Discourse)扮演著最關鍵的整合因素；而女性主義(Feminist theory)則認為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範疇，包括權力、利益、安全等皆反映出價值判斷的高低差別，傳統研究範疇都是所謂主流理論的偏見與主觀意見，這些認知並不是女性本身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形塑之要素，傳統研究範疇使得真實世界變得相對狹窄，²⁴歐洲整合的過程中，要創造一個新的歐洲，以個體性別參與的差異因素是影響整合進程的關鍵要素，以補足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缺失，而非再探討國家或國際體系等要素。後現代學派(Post-modernist)認為認同與主觀才是整體整合過程中的主要因素。²⁵

三、 社會建構主義：

社會建構主義學者認為透過能動者(Agent)之間與國際社會的互動，經過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等因素相互形成共享的認知(Shared understanding)、知識(Knowledge)、期望(Expectation)以及認同(Identity)，在共同知識與認同的建構下會形成一種規範(Norm)，規範便會形塑國家行為進而影響國家決策、賦予物質資

²³ 洪鎌德，2010，〈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批判理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3期，頁16。

²⁴ 洪鎌德，2011，〈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挑戰與定位〉，《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7卷，第2期，頁95-118。

²⁵ 同註18，頁48。

源意義等實踐。²⁶能動者的規範、利益與認同根基於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e)的社會行動與社會秩序所建構出之雙重作用性的結構。²⁷國內藍玉春教授整理社會建構主義學派並以下列四個論點呈現，其一，具社會意義的國際體系，國際關係唯有透過賦予意義才有存立的事實；其二，為能動者之共有性，廣義的共享理念促進行為者之間的認知與利益傾向一致；其三，無政府狀態下的三種國際政治文化(霍布斯式-Hobbesian、洛克式-Lockian，以及康德式-Kantian 體系)，能動者之間相互主觀的建構賦予國際政治內生意義的產出；其四能動者身分的外部因素，身分是由內在認知與外在結構建立而成的，進而規範產出。²⁸因而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政治信念、集體價值、共享歷史的認同、共同文化以及歐洲公民社會的形成是不可被忽略的，沒有歐洲公民社會的形塑就不會有歐洲國家行為者之間共同知識以及認同，歐洲整合將會是窒礙難行。²⁹Craig Parsons 指出歐洲整合從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至迄今歐盟整合的進程，理念(ideas)的迴盪所發散的合作意願比國際制度所產生的約束效力更高。³⁰

²⁶ 彼此身分認同、理念建構以及相互主觀的互動以解釋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有關社會建構理論之思維輪廓，請參閱 Alexander Wendt,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pp. 71-81.；秦亞青譯，2008，亞歷山大·溫特 (Alexander Wendt) 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

²⁷ John Gerard Ruggie,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p. 862.

²⁸ 規範所建構的效果體現在例如歐洲公民權之發展納入「歐洲基本權利憲章」，加深認同的關聯性；國內菁英於決策過程中內化歐盟既有法規等認同之建構；歐元區集體認同之建構。請參照藍玉春，2009，〈從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頁 83-97。

²⁹ 同註 18，頁 48-52。

³⁰ Craig Parsons, 2002,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pp. 47-48.

如上所述，因此歐洲研究興起沿襲以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辯論為基礎的出發點，分別是著重各民族國家利益的「政府間主義」，或是以只考量歐洲整體利益的「超國家主義」，³¹「歐洲化」的分析途徑，則部分採納社會建構主義為利基點來討論歐洲整合的現況。

貳、歐盟整合之相關理論分析

整合意謂由主權國家之間實現某種特定過程的狀態，這個過程包含政治行為者根據許多獨特的國家間安排之途徑以使其忠誠、期望與政治行為得以被採納，進而建立一個新型態的制度之過程，或藉此過程對既有主權國家進行管轄的訴求。³²在研究歐盟整合的主要理論探討大致可以分為政治學途徑以及經濟學的研究途徑兩項，學界也有採納以國際建制或是全球治理作為途徑來研究歐盟的整合進程。經濟學途徑包括關稅同盟理論(Customs union theory)、最適貨幣區域理論(Optimal currency area theory)以及財政聯邦主義(Fiscal federalism)為主要研究方向。³³在政治學途徑方面，則是自由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聯邦主義(Federalism)與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為大宗，政治學途徑承襲國際關係理論的思維，為延續上一階段的文獻探討，此部份便主要以探討政治學途徑為主。

³¹ 黃偉峰，2007，《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台北：五南，頁25。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主張捍衛國家的主權，歐洲國家間的發展應透過政府間的會議來決定；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主張歐洲各國不應該限制國家主權，強調必須將主權轉移到一個超國家的機構，進而建立起一個聯邦或新的國家。

³² Ernst B. Hass, 1961,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5, No.3, p. 366.

³³ 關稅同盟理論之研究重心在貨物市場以及非歧視性福利的合併，例如減少區域內部的貿易障礙以及非會員國進口關稅的同等化，為共同市場的基礎思維輪廓；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之目的在於創造貨幣同盟以固定匯率，不受其他財政政策之干涉；財政聯邦主義探討聯邦國家內所引起的財政問題，例如公共財、稅賦或公債，在具體實踐上如歐盟討論單一貨幣的過程。

一、自由派政府間主義：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承續現實主義以國家為核心行為者的概念，認為會員國之間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是由經濟互賴所形成的限制與機會產生，國家之間的談判結果是取決於相關政府的權力與功能性誘因，在不釋放國家主權的前提之下，透過制度建立可達成最低公約數之期望。Andrew Moravcsick 認為自由國際關係理論始於三個核心假定，其一，社會行為者的首要地位，國際政治中的根本行為者以個人或是私人團體為主，這些行為者普遍上均是理性且了解如何迴避風險的行為者，其時常組織交易活動與透過集體行動的方式去提升在缺乏物質資源、價值相互衝突以及差異性極高的社會環境影響限制下的個別利益；其二，國家偏好以及其代表性。國家亦或是其他政治制度本身所代表的是國內社會的利益，在這類利益匯集的基礎之下，國家於國際政治活動中依此進一步定義其國家偏好與行為目的；其三，互賴的國際體系，國家之間的偏好是相互依賴的，互賴的環境影響國家行為偏好。³⁴自由派政府間主義以上述核心假定進行三階段論述，首先為國家為理性的行為者在國內形塑「偏好」(Preference)，但是「國家利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受到來自國內與國外環境因素的影響，進而促成政府間談判追求最大化利益，最後以「制度的選擇」來解釋行為者，如歐盟的條約或政策之產出。例如國內蘇宏達教授在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談判過程的研究中認為，整體談判過程主要是由德國、法國以及英國三國偏好的形成，透過協商與各國利益交換而產出的共同的制度選擇，在各國國家偏好的形成過程中，利益團體等功能性組織的影響相當有限，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是政黨或團體競爭，因此

³⁴ Andrew Moravcsick, 1997, "Taking Preference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 pp. 516-524.

德、法、英最後妥協的基礎是彼此在核心利益上的妥協與政治角力，而非機械式的最低公約數。³⁵卓忠宏教授則以歐盟南向政策 (Southward policy) 為例，說明政策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在於會員國彼此在高階政治議題上的無法妥協，由此案例顯示會員國之間利益的重要性。³⁶

二、 聯邦主義：

起因於對國家至高無上的主權的畏懼，聯邦主義試圖以建構聯邦的方式統合歐洲，聯邦主義的目標明確，其擁有一個中央政府，下層部分則是各國家或區域單位所組成，以發揮聯邦結合共治與自治的精神。³⁷一方面維繫主權國家權力之自主性，另一方面將功能性的合作予以制度化，以共同條約基礎明定成員國之權力關係與超國家制度決策過程，以追求共同目標。³⁸聯邦主義的設計原則包括依權力平衡與權力分立原則劃分國家權力、依照領域獨立性保護少數、統合異質社會以維繫社會文化自主性原則、國家行政職權依功能性區分，並分權分層負責又需要相互配合與聯繫。³⁹聯邦主義是依據憲法程序由人民同意去建立一個超越國家且具有實權的主體，故某種程度上是無法獲得歐洲各國之採納甚至青睞。⁴⁰

³⁵ 蘇宏達，2010，〈從自由政府間主義解析里斯本條約的發展過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2 期，頁 1-38。

³⁶ 卓忠宏，2011，〈歐盟南向政策之發展與爭辯〉，《政治科學論叢》，第 48 期，頁 1-32。

³⁷ 藍玉春，1999，〈有關歐洲統合的論戰及其實踐：聯邦派 vs. 主權派〉，《政治科學論叢》，第 11 期，頁 181-184。

³⁸ 張惠玲，2000，〈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1 期，頁 53。

³⁹ 吳振逢，2010，〈從德國聯邦制度論歐洲聯盟整合趨勢〉，（台北：淡江大學博士論文）。頁 13-26。

⁴⁰ 黃偉峰，2004，〈歐盟政治研究中理論方法之分類與比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5 卷第 4 期，頁 561。

三、 新功能主義：

新功能主義認為整合是一個過程，整合的過程可以增進國家間的互動，以提升所處環境的聚合過程。在整合的過程當中，權力和功能合作是不可區分的，政府必須扮演積極的角色，此外政治菁英的認知也相當重要，政治菁英在評估功能合作或進行合作時都有相互學習的效果，缺乏政治菁英的支持，整合過程就無法得到具體的結果，新功能主義主要可分為「學習」(Learning)、「外溢」(Spill-over)以及「忠誠轉移」(Loyalty-transferring)三個階段。⁴¹透過政治菁英的學習，了解功能合作的益處，修正了觀念與行為，因而產生資源或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外溢至其他單位，外溢又包含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以及政治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功能性外溢基於現代化工業經濟環境造成不同部門之間存在著高度的互賴，某一部門的整合行為不僅會達到最初的預期整合目標，更創造出與相關部門之間進一步的合作空間；政治性外溢包括漸進式的忠誠轉移，價值的改變以及參與政治利益團體與政黨在功能性部門進行跨國性聯合，形成「網狀」(Ramification)，最後透過制度化機制來扮演成員間的協調者，誘使參與者接受提升共同利益的建議。盧倩儀教授便認為歐盟架構中的組織制度及其中的行為者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力，遠超出會員國國內行為者對政策結果之影響力。⁴²有別於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出發點是先驗且任務導向的，新功能主義採非先驗且非任務導向的研究途徑能夠確切的觀察區域整合更微妙的過程。⁴³針對新功能主義的邏輯 Dorette Corbey 提出對新功能主義的調整，整合過程在合宜的政策領域決策中尚必須將國家內部介入因素納入考

⁴¹ 林碧炤，1997，《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頁 184-187。

⁴² 盧倩儀，1999，〈從歐盟移民政策決策過程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頁 19-31。

⁴³ 同註 21，頁 146。

量，國際環境的外溢效果指能是整合過程的中介變數，歐盟的政策產出必須是符合國家偏好、利益以及內部功能調和的結果，如何同時使不同的國家政府內部差異情況在整合過程中選擇一個相似的歐盟政策，唯有國際環境與國家內部之間的暫時停滯 (Stagnation) 交涉，雙方面進行功能擴散整頓便得以達成整合的效力，依此才是歐盟整合功能合作的本質。⁴⁴

四、歐洲化：⁴⁵

普遍上，歐洲化的定義指在歐洲層次上，對於會員國內部結構實施一項獨特的治理結構的成型與發展，尤其是歐洲整合進程改變了民族國家的決策程序，例如內部制度、政治文化以及與歐盟的關係之過程。⁴⁶歐洲化的程序透過對國內政策、整體體系以及制度上造成影響，來自歐盟歐洲化的良善的調適 (Goodness of fit) 與國內結構造成摩擦形成會員國調適的壓力 (Adaptational pressures)，調適的壓力促使行為者採取實際行動去調整國內內部制度的結構。⁴⁷此為歐盟對會員國造成影響的單一面向的歐洲化研究概述。

⁴⁴ Dorette Corbey, 1995, "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 Stagnation as a Boost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2, pp. 263-284.

⁴⁵ 歐洲化，為分析對歐盟整合過程的新概念，尤其是在中東歐國家擴大政策 (enlargement) 上，新會員的加入使歐盟必須要重整內部的制度和政策。有學者認為歐盟的影響力是滲透性的，但有關於歐洲化這個概念是很難被界定清楚的，因為很少被發展成理論，或做比較分析。而歐盟對在特定地區、國家或者特定議題上，是否受影響之外，其對東擴國家的政策通常稱之為設定條件 (conditionality) 的政策，但這樣的政策很少經過精確分析。而根據國內學者楊三億在設定條件一詞上，其定義為歐盟對中東歐國家，制定了特別的政策，強調歐盟對東擴所設下的強制性規範，並重視新會員國是否將歐盟各項法律轉化成為新會員國內部正式法律。而這樣的設定讓歐盟規範成為落實歐盟要求新會員國工具的手段之一，歐盟與新會員國之間藉此讓歐洲化得以在共同生活圈形塑而成」。請參照楊三億，2008，〈波蘭 1990 年代憲政改革：制度變遷與社會學習之歐洲化過程〉，《全球政治評論》，第 24 期，頁 90。

⁴⁶ Thomas Risse, Maria Green Cowles and James Caporaso,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

⁴⁷ 同上註，頁 3-12。

延續上述脈絡，然而社會學研究者 Tory Higgins 認為，一個個人在採取行動前都會事先考慮其有沒有遵守正確的原則(Right principles)、這個行動會不會帶來好的結果(Right consequences)以及這種行動對其他個人的心情(Emotion)狀態感受是如何。這三種行為模式分別是「相稱性的邏輯」(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結果性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⁴⁸以及「情緒性的邏輯」(The logic of emotion)。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的真實(social fact)原素彼此影響產生相互主觀的共同的知識認同，這些知識進而建構出一套屬於社會所有的規範，規範可以形塑國家行為者的行為、改變國家行為者的意圖甚至改變國家行為者對其利益的認同，這些特徵如同相稱性邏輯的思維。⁴⁹歐洲化的過程亦即一種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協同作用，國際制度潛在的社會化效力使參與其中的國家以及行為者接受既有制度規則之要求進而改變自身行為的作為以及規範的學習，由結果性邏輯轉變到相稱性邏輯的轉換，使行為者學習扮演某一特定角色或使行為者承認某一特定實體有權利得以執行決策。而達成初步國際社會化互動的途徑必須包含下列三項，其一為策略算計(Strategic calculation)，基於理性選擇理論，以考量國際制度與國家之間互動的成本利益，例如歐盟區域制度在歐盟東擴進程中所提供的設定條件；其二是角色扮演(Role playing)，由於行為者為受制於有限的理性選擇環境，故行為者必須在受限的環境中適應某個特定的安排；其三為規範勸說(Normative suasion)，行為者本身必須去說服其他參與者，使其利益與偏好能夠在其他參與者身上進行重新定義並進而轉變對利益的訴求。⁵⁰

⁴⁸ 結果性的邏輯，指為達到目的的正確，可能會試圖改變現有規則以便以最效用的方式去完成目的。

⁴⁹ Jack Snyder and Leslie Vinjamuri, 2003, "Trials and Errors: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in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pp. 7-17.

⁵⁰ Jeffrey T. Checkel, 2005,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pp. 802-815.

因此，在形式上、行為上以及溝通的概念上，也許可以用來確認歐洲化的確實存立，例如在歐盟整合階段的進程中，針對中東歐國家的擴大(Enlargement)政策所制定的設定條件的部份，符合上述結果性邏輯以及相稱性的邏輯兩類。以結果性為邏輯，強調策略、理性行為者追求其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以相稱性為邏輯，行為者依自身的認知、價值、和規範，選擇最適當或正當的去做，故其討論正當性規則、行為的正當性、說服、複雜的學習、描繪規則、轉型、以及採納的過程等。有此得知，歐洲化的交流是兩種不同面向結合，⁵¹藉此得以建構一個歐洲化的選擇模型，請參見表 1-1：

⁵¹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7.

表 1-1：歐洲化的選擇模型

邏輯思維 行為者	結果性邏輯 Logic of consequences	相稱性邏輯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以歐盟為主導	外部誘因模型 External incentives model	社會學習模型 Social-learning model
以中東歐國家為主導	經驗學習模型 Lesson-drawing model	

資料來源整理自：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Ulrich Sedelmeier,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8.

(一) 外部誘因模型：

是屬於理性選擇一類的模型，根基於結果性的邏輯。在一般的理性選擇的議價的過程中，國家進行交換資訊、威脅、承諾。透過結果的勝方，成為較有權力的一方，而使得在資訊以及利益取得上多於他者。依據這種外部誘因的模型，歐盟設定了對中東歐國家的條件，並要求中東歐國家必須採納規則以得到歐盟的獎賞，例如獲得加入歐盟(意味著經濟市場的轉型)以及獲得制度的聯結(意味著貿易合作等)。條件設定的方式是強化行為和強化賞罰的策略。⁵²

(二) 社會學習模型：

社會學習模型是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其主要假設

⁵² 同註 51，頁 10-17。

是以相稱性的邏輯為出發。其認為歐盟是一個正式的、有集體認同、獨特的一套共同價值與規範的歐洲共同體所建構組成的國際組織。非成員國會採納歐盟所制定的規則是因為歐洲規則和其採納規則的需求為一種適當的認同、價值、和規範集合體的程度而採納。亦即，當國內政府跟隨符合歐盟規則的適切性時，就會順理成章採納歐盟所制定的規則。⁵³

(三) 經驗學習模型：

中東歐國家也可以不受歐盟的主導而採納歐盟規則，即是所謂的「政策轉移」。有關政策轉移則必須分析「自願性」和「強迫性」兩個概念。在條件設定的部份，是屬於強迫性的；而經驗學習模型即是自願性的類型。經驗學習是對國內對現狀不滿的反應。政治菁英從別處學來的政策和規則，進而套用於現在國內的狀況，而無論結果是否如同預期。經驗學習模型包含了理性行為者和修改的社會行為者。在對現狀不滿下政治菁英會向海外學習，此一過程就稱之為「簡單的學習」(Simple learning)；而修改過的社會行為者，就執行「複雜的學習」，包括修正目標等。在經驗學習的程度上分成四種步驟，依序為「模仿」、「仿效與競爭」、「組合」、「啟發」。中東歐國家在經驗學習上可能不只有歐盟的規則，政治精英可能還會找尋其他會員國中不同的行為者作為其改善國內的藍圖。經驗學習的最好解釋是：當政府發現有可以解決國內問題的有效方案時，就會採納其規則。⁵⁴

例如在蘇聯崩解之後，位於中東歐的國家摩爾多瓦(Moldova)，面臨三項外交選擇，其一是與羅馬尼亞(Romania)合併，其二是獨立成為主權國家，並建立一個與獨立國協有強力關

⁵³ 同註 51，頁 18-20。

⁵⁴ 同註 51，頁 20-28。

係的國家，或是第三，與歐盟進行整合。歐盟的東擴政策成為對於歐洲地區和平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歐盟的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的出現，對摩爾多瓦而言確實是一項良善的調適政策，睦鄰政策加強了目標國的順從過程，在物質層次方面，歐盟提供一個直接的對於目標國輔助其憲政上、行政與立法範圍的制度建立與制度調整，共同市場的擴張與財政支援；至於非物質層次的部份，歐盟本身原有規範以及社會化的擴散，使得目標國，例如摩爾多瓦，形成對於歐盟的認同與歸屬感。歐盟的承諾便成為吸引摩爾多瓦展開民主改革的主要鞭策動力，摩爾多瓦的政策根據其外部關係與歐盟的治理模式進行改革，一個以共產黨為統治基礎的國家，便開始轉變其原有外交政策而更向歐洲靠攏。⁵⁵

歐洲整合理論的探討不論是從過去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聯邦主義或新功能主義的研究，甚至是冷戰結束，國際情勢產生大規模改變，導致國際關係歐洲研究所興起歐盟與鄰近國家之間互動的歐洲化的探究等，其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有效建立以更為科學的理論來描述、解釋或預測歐盟整合的過程。但在面臨國際新興議題的挑戰時，例如人類安全等問題，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聯邦主義、新功能主義或是歐洲化模型是否依然能夠貼切的解釋歐盟的整合過程或是對外戰略之選擇？⁵⁶ 歐盟本身所獨有的組織特性以及決策過程，對於研究者而言的確很難找到一套適合研究歐盟的

⁵⁵ Oliver Schmidtke and Constantin Chira-Pascanut, 2008, "The Promise of Europe: Moldova and the Process of Europeanization,"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uk ed., *Europe's Last Frontier*. London: Palgrave, pp. 132-156.

⁵⁶ 在解釋歐盟整合過程又如 Frank Schimmelfennig 認為批判歐盟之所以能夠順利的擴張其勢力範圍，主要是強化了本身修辭行動 (rhetorical action) 的效力，透過政治菁英語言的溝通獲得群眾的支持，因而改變了整合過程中超國家制度與國家之間彼此議價權力的結構，而非單純訴求在整體進程中的利益交換。請參照 Frank Schimmelfennig, 2001,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1, pp. 58-76.

分析或理論架構，但是如同黃偉峰教授所言，針對歐盟研究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建立一套獨一無二的分析架構去研究歐盟，而是釐清哪些理論架構，在何種情況之下，比較適合處理何種歐盟的政治問題。⁵⁷因此，從上述各整合理論內容所傳達的是歐盟整合的「過程」中其聯盟權力與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過程，不論是國家利益、偏好或是功能性組織之間的合作，其所注重的關鍵因素在於歐盟整合過程的解釋，至於本論文以下章節將要提及討論的軟性平衡則是強調歐盟整合的「鞏固」作為上，亦即透過軟性平衡的面向以說明歐盟在對外行為的實際行動上是如何操作且又能同時促進聯盟本身的制度鞏固，以使得聯盟生存的基礎得以持續發展。

⁵⁷ 同註 40，頁 544。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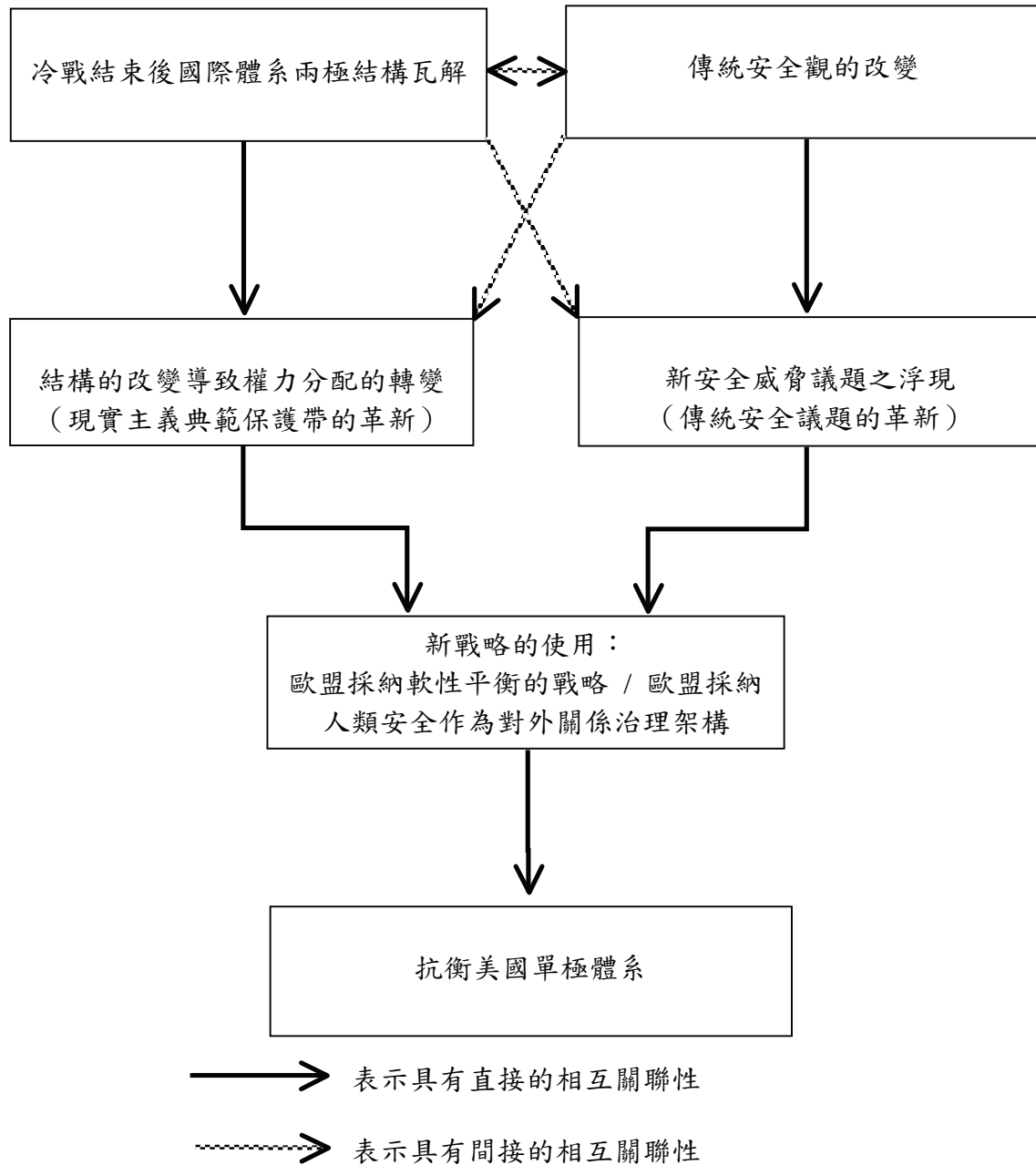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貳、章節安排

本文總共分為六章寫作，茲如以下所述。第一章為「緒論」的部分，此部份交代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假設、研究途徑與方法、文獻述評以及章節安排的部分，即針對本篇論文給予一個初步的論文框架。

第二章的主要工作是探討「典範的研究程序與現實主義」，將耙梳有關於科學典範的轉變與選擇研究程序的原因，並且同時將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假設與概念之演進納入，以處理現實主義理論中包括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英國學派以及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談論的輔助性假設，以及交代上述現實主義學派本身所面臨的局限，以釐清現實主義典範硬核與保護帶的「變與常」。

第三章「權力平衡理論的修正」回顧現實主義理論學者對於 Kenneth Waltz 權力平衡這個概念的研究修正，包括威脅平衡論、利益平衡論與階層制扈從，並且從這些貢獻中鞏固本文的論述基礎，以梳理為什麼國家行為者會考慮選擇軟性平衡的幾個原因之分析，並且加以提供軟性平衡概念上的定義與軟性平衡戰略操作方式。

第四章「安全觀的演進」試圖處理安全議題由傳統安全觀演進至人類安全觀的廣化及深化的更迭，探究非傳統安全觀中人類安全議題之重要性，並且企圖歸納有關人類安全的定義，進而探討歐盟在人類安全的研究範疇之下所建立的對外行動框架。除此之外，並以歐盟的外交政策產出為主軸，說明歐盟外交政策所發

散出的軟性平衡效益，結合人類安全議題範疇作為達成軟性平衡的基礎為主要探討內容；

第五章首要著重於「單極體系下的歐盟軟性平衡實踐」，探討歐盟由人類安全困境的因素切入，回應在冷戰結束後由美國領導的單極體系背景所進行的阿富汗與伊拉克反恐戰爭之軟性平衡作為，這些作為包括歐盟的糾纏外交、經濟的強化、釋放予以平衡的訊息以及區域途徑的強化戰略之使用。

最後在第六章則總歸上述五章的「結論」企圖回答並解決研究假設的暫時性問題，並以三個方向進行結論呈現，其一為本論文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上的突破，其二是歐盟在對外政策上以軟性平衡的方式修正與美國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則是本論文在未來之延伸性研究的部分。

第二章 典範的研究程序與現實主義 典範

起初最先使用典範(Paradigm)概念的是美國歷史與科學哲學家 Thomas Kuhn 於 1962 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首先提及。Thomas Kuhn 假定經由觀察與經驗而獲得的資料是科學理論最重要的根源，這些資料再透過知識社群以科學的方式整理之後經由嚴謹的討論而形成典範，被匯整的資料會進行源源不絕的更新，故科學的長成是不可避免的，且科學的長成必然會造成典範移轉的結果，這種結果就是科學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意義。本章首節主軸在探究典範與知識論的爭論問題，試圖整理典範革新的內容與脈絡用於補足科學革命的論述和交代社會科學知識的長成進程的漸進程序；第二章目的在檢視現實主義典範研究所發生的學術論戰中，各方的觀點及對於現實主義研究典範發展的主張與影響；第三章則體現現實主義也是符合典範得以修正的研究程序邏輯來進行的革新，藉此本論文提出不得在知識論理論層次上去直接否定軟性平衡理論存立的評論。

第一節 典範的革新？典範的長成與選擇典範 研究程序的必要

壹、常態科學的革命

典範的初始狀態是由一群知識社群首先選定並且劃定一個範圍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展開研究，常態科學必定是穩固的根基於一個或多個過去科學的成就而形成，這些成就是原先存在某些特定的知識社群之中，並且在一定的時間區間內被認知的，知識社群的共同認知得以提供另一項實踐的基礎，使用常態科學能夠以不直接言明的方式去定義一些問題之正當性以及研究領域的方法，並且持續延伸，最終完成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這些研究結果的成就具有兩點共享的特點，即足以去吸引先前從未進入此常態科學領域的參與者進入共同的知識社群，新的參與者便會擁護知識社群的研究成果，甚至逐漸疏遠其他科學行動的競爭。同時，這些研究結果的成就，便充分的開放而使得所有問題的根源都能夠進入領域的討論中，以便重新定義研究問題而成為知識社群行動的動因，假使任何的常態科學符合上述兩點共享的特點即稱此為典範，Thomas Kuhn 指出，典範的使用是去建議採納一些可接受且適用的範例，以確切的方法表明科學研究的實踐，這種範例可能是包括一整套的法則、理論、應用以及工具等等，這個範例會提供一套模式，這套模式是來自一個特定的但是符合邏輯傳統科學研究的模式，以直接而非間接的方式移轉成新的型態。⁵⁸因此，典範包括兩項意涵，首要意涵是典範是特定知識社群共享的信念、價值或是技術；次之為，典範是能夠提供模型以解決模糊的問題，以領航一群研究者。延續典範的意涵我們發現典範的使用功能包括，第一，典範可以是一種符號性的歸納；第二，典範可以是形而上學典範的評鑑指標(Rubrics as metaphysical paradigms)；第三，典範是一種價值；最後，典範可

⁵⁸ 請參照 Thomas 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23.；關於典範的定義或可參照林碧炤，2010，〈國際關係的典範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 29 期，頁 13。即任何科學都有他的知識社群存在，而知識社群一定存在共同的研究方法、解釋依據或範例，而理論也包含在內，則我們稱此為研究成果為典範。

以是一系列的範例(Exemplars)，同時提供知識社群更優良的科學架構。⁵⁹

典範經由科學革命的過程，成功的從一個典範移轉至另一個新典範，使得科學研究的發展圖像更為完善成熟，為科學革命的主要目的。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去選擇自身所支持的觀察與經驗，因為對於這些選擇的限制是相對自由的，因此研究者可以比較自由的去設定一組觀察標準或體驗現象的方法，再透過科技與新科學產出推波助瀾，研究者劃定出一個現象的範圍並且以不同的方法進行詮釋，典範就會產生。但是要能夠被普世接受成為一個典範，一個科學典範或理論就必須比其他挑戰者還要具有優勢，即便如此，這種典範或理論優勢並不必然是可以用來解釋全盤所面對的真實或問題。然而這些不可解釋的真實或問題，典範或是理論變透過移轉來解決舊典範未能解決的問題。

基於上述，首先要討論典範的出現會如何影響在相同領域之知識社群的結構，在科學的發展過程中，每當一個人或團體首次透過辯論製造一個新的綜合體，此新的綜合體成為新典範起源的開端，能夠吸引大部分下一個世代的實踐者，則較陳舊的常態科學學派就會逐漸被淘汰。新的典範暗指一個以全新且更具剛性定義的存立，以賦予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因此，不願意或是無法納入新典範的學派必然會走向孤立或被其他知識社群賦予其他意義。知識社群在新的領域當中鑽研，集中於深奧的自然現象或其他面向，知識社群皆研究同一個標的，知識社群的研究成果會以某種方式革新那些以鮮少被研究的主題，加上典範的不可比較性，相似的某些部分的改變或重組是不可能的，這時舊的典範就

⁵⁹ Thomas S. Kuhn,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74-187.

會被以不理性的方式給拋棄，典範的革新便產生。⁶⁰科學革命的結構如圖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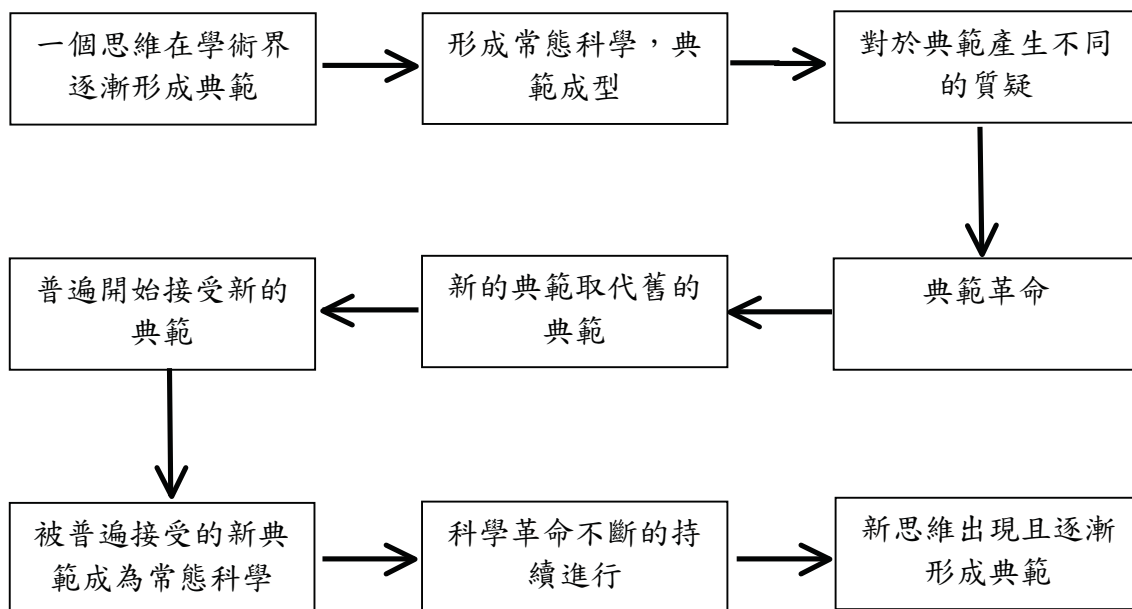


圖 2-1：科學革命的結構

資料來源：蕭瑞麟，2007，《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
台北：台灣陪生，頁 103。

貳、有效的否證論

相較於 Thomas Kuhn 對於典範科學長成的看法，Karl Popper 則重新審視一個科學理論在什麼時候以及何種情況之下，才得以被納入為是科學或甚至是區別出偽科學，Karl Popper 反對 Thomas Kuhn 以類似歸納的方式建立典範，認為應該藉由否證 (Falsification) 以及演繹 (Deduction) 的方式來建立科學理論。例如我們從實務經驗中歸納出知道蘋果會從蘋果樹上掉下來結果，但

⁶⁰ 同註 59，頁 188-210。

是這種結果卻無法說明為什麼蘋果會掉下來的因果關係。以歸納法的方式建立理論，容易產生解釋力不足的問題，畢竟歸納是一種選擇性的解讀，一個理論的科學狀態或地位之決定標準，是經過審視理論本身的否證、可辯駁性(Refutability)或是可測驗性(Testability)而確定。⁶¹請參照表 2-1。

要進行否證或演繹的工作，科學理論的論述就必然會面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問題(Problem of demarcation)，⁶²否證的指標之建立的目的，就是在於要解決劃界的問題，研究者才可能由觀察陳述推論出具有意義的見解，這種方法才是科學。任何超出研究者能夠觀察或是經驗的任何事物要形成科學都是有困難的，因此透過推測與辯駁的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就有可能得以了解為什麼我們企圖去解釋的世界是以一種具有邏輯意義的觀察。Karl Popper 認為理論的長成應該先有假設，而後才有觀察的納入，即例如一種將規矩強加於自然之上的一種武斷式的行為(Dogmatic behavior)，但是這種行為必須配合批判式的思維(Critical thinking)，批判式的思維是一種樂意去改變這些強加於自然之上的規矩或既有認知圖像的想法或方法，試圖去測試、反駁或否證這類規矩，以演繹的過程並且支持理性修正的必要而形成科學，或使科學長成。⁶³總而言之，研究者並不能保證理論的正確，必須經過不斷的批判式的思維，不斷思考、重組、否證，藉由觀察陳述以嘗試錯誤的否證，是一項淘汰理論的方式。

⁶¹ Karl Poppe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33-39.

⁶² 劃界的問題指，為了要呈現科學的排列以建立論述或一系列的論述的出現，就必須有能力可以與觀察進行可能的或可想像的衝突。

⁶³ 同註 61，頁 40-56。

表 2-1：有效的否證矩陣

	大膽的假設	謹慎的假設
經過證實的觀察陳述	有效的否證，足以形成科學	僅止於歸納（無效的）
被否證的觀察陳述	粗糙的否證（無效的）	有效的否證，足以形成科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 Karl Poppe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33-59.

參、完整的研究程序

Imre Lakatos 認為在 Thomas Kuhn 建構科學典範革命所採行的方式是否決、淘汰一個理論的想法與概念，Imre Lakatos 認為這種方式是一種，或稱為是天真的否證主義(Naive falsificationism) 且不理性的，⁶⁴Imre Lakatos 也批評 Karl Popper 的理論無法解釋在科學持續性(Continuity)長成的過程中一些邏輯否證面向的問題。Imre Lakatos 認為學術上的科學，應該是某學術知識願意去放棄自身定位的情況，亦即 Imre Lakatos 不贊成以不理性的方式拋棄原有典範的武斷式否證主義(Dogmatic falsificationism)的論述。⁶⁵

⁶⁴ Imre Lakatos, 1968, "Criticism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69, p. 181.

⁶⁵ Imre Lakatos,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1-93.

複雜的否證主義(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為 Imre Lakatos 所倡導的方法，在天真的否證主義當中，任何理論知識都可以被解釋為根據實驗而來所獲得的可否證性，而使其成為或被接受為科學。但是在複雜的否證主義當中，理論知識要被接受或是被視為是科學，只有當其先前的知識所附加的輔助假設(Auxiliary hypothesis)被佐證，而引導出一個新事實(Novel fact)的發現，理論知識才可被視為科學。這需要兩個先決要件，即第一，這種對於附加的輔助假設的佐證方式是一種先驗式的邏輯分析，符合科學歷史；第二，附加的輔助假設可以無限次的被檢定，避免不理性的理論移轉。在複雜的否證主義的途徑中，一個科學理論 T 要被否證只有在另外一個理論 T'具有下列幾項特點，第一，T'通過 T 的經驗內容，T'可以預測一個新的事實，而這個事實不可能是從 T 的觀點出發或是受到 T 的限制；第二，T'解釋了先前 T 的成果，即所有 T 無法辯駁 T'的內容都要被包含進 T'的內容之中；第三，T'通過佐證的內容都是可以實證的。⁶⁶無疑，輔助假設協助理論的問題轉移而建立真實地位。

因此 Imre Lakatos 提出一套科學研究程序的方法(A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分別以兩條路徑進行，當中包含我們要去避免接受「負面啟發」(Negative heuristic)的研究路徑，以及研究者應該去追求的「正面啟發」(Positive heuristic)的研究路徑。負面啟發所強調的是，所有的科學研究程序都保有具個別特色的硬核(Hard core)的部份，負面啟發研究程序指研究焦點不應該直接否定理論結果(Modus tollens)而推翻硬核，研究者必須避免直接否定硬核，反而可以藉由負面的理論挑戰重新賦予硬核一個新的假設而更進一步鞏固硬核，研

⁶⁶ 同註 65，頁 116-118。

研究者應該以提供輔助假設以組成一個保護帶(Protective belt)圍繞此核心，參見圖 2-2。研究者的工作應該是持續檢定保護帶的力量，使保護帶能夠承受測試的衝擊而進行下一步的調整，或甚至以新的輔助假設取代保護帶以保護硬核，一個成功的研究程序是立基於增強保護帶對於問題轉移的發展；正面啟發即為一種修正、調整保護帶建構的研究程序，因為很少研究者從事一個研究過程會付出過多的注意力在關注辯駁的工作上，而是研究者應該持有一套長期的研究程序會去預期這些辯駁的出現，這種研究程序的順序即是正面啟發，正面啟發的目的在於開發出一套可以驗證(Verification)的而非駁斥(Refutation)順序，以追求如何去修正、調整而使保護帶成熟。正面啟發的研究程序可以避免研究者大海撈針的過程，因為正面啟發的程序會建構出一套多樣且複雜的順序模式，並從而鉗接整體研究程序。⁶⁷

正面啟發以驗證而不是駁斥的方法探究以提供與事實相接的節點。研究者可以透過上述指標來評估研究程序，以程序的啟發力量為指標，而檢定研究程序在理論長成的過程之中承受辯駁能力衝擊能力的高低。負面啟發的研究路徑是以一套健全的進程去引導一個進步的問題轉移，而不完整的研究程序則是產生變質的問題轉移，研究程序構建連貫且進步的理論移轉，這些步驟也許是間歇性的經驗轉換，但每一個步驟均代表了一個經驗內涵的提升；此外正面啟發則將抽象的原則與硬核透過驗證而進行分離，總上所述，研究者需要的是一套程序以尋求進步的問題轉移(Progressive problem shift)，而不是整套完整的科學成就。

⁶⁷ 同註 65，頁 132-137。

Paul Feyerabend 認為，理論的發展進程中研究者應該給與其長成的空間。我們所理解的科學並不是在一個常態發展，更不是在其擴散區間的過程中獲得世俗的成就而訂定，科學理論之間應該能夠相互並排，並且使得彼此都有科學的價值，理論應當具有多元性的哲學、批判以及更多客觀存在的實踐。比較陳舊的學派的研究並步表示已經過時，而是可以扮演與新學派溝通的平台，並不是理論去取代理論，理論或典範應該是遍地開花的。⁶⁸ Terence Ball 則是批判 Thomas Kuhn 所提出的不理性的科學革命，並且認為現今的政治科學家對於 Thomas Kuhn 論述的接受已經是徹底的斷絕關係，Ball 讚揚 Imre Lakatos 的成就並舉出複雜的否證主義的兩項優點，其一為研究程序能夠與科學的歷史走向一致；其二則能夠避免 Kuhn 非理性主義的科學選擇與改變，研究者要容忍其他研究理論的存在，使核心輔助性假設越緊密越好。⁶⁹

⁶⁸ Paul Feyerabend, 1970, "Consolation for the Specialist,"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7-229.

⁶⁹ Terence Ball, 1976, "From Paradigms to Research Programme: Toward a Post-Kuhnia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0, No.1, pp. 159-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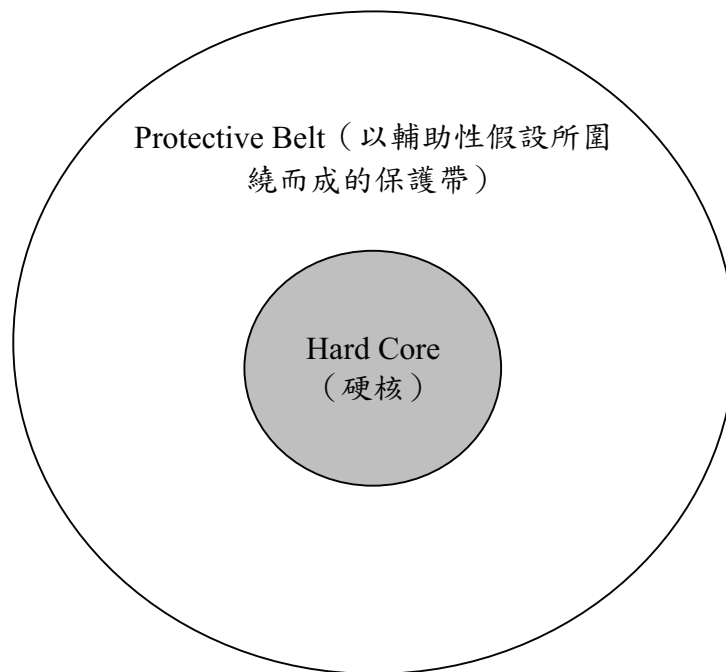


圖 2-2：輔助性假設組成保護帶圍繞硬核概念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研究國際關係理論，也許可以從上述學者們的辯論中得到二個出發點，即典範會長成，且研究過程中選擇典範的必要。⁷⁰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進程，應該還是要以既有存立的知識社群為基礎，透過不同的假設或不斷的被驗證，逐漸鞏固強化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假設之強度，使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更為健全以及更具解釋或者預測的能力。本文所採用的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社群為結構現實主義，其理論核心假設為國際關係體系運作存在著結構的強制力。具體而言，這個結構為在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互動，行為

⁷⁰ 請參閱 Emerson M. S. Niu、Peter C. Ordeshook and Gregory F. Rose, 1989, *The Balance of Power: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 或林碧炤，2010，〈國際關係的典範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 29 期，頁 12-25。知識社群本身的研究，自然會帶動學科的改變，典範不可能永久不變，典範的移轉是必然的，科學的革命也是一樣不可避免的結果。利用典範來認識學科（國際關係學科）的好處有下列幾點，第一，典範產出科學一體化的共識；次之，科學知識社群對於任何學科的成長是很重要的；以及第三，典範的使用可以讓個人價值的影響降到最低。

者之間因為單元的相似，共同追求安全與生存的可能目標，彼此只得追求自助，以達到權力配置的平衡。⁷¹的確，結構現實主義知識社群的理論足以解釋大部分的國際關係，但是隨著時間的持續，體系之間的互動使得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力逐漸下降，例如在冷戰結束之後，結構現實主義所服膺的兩極體系瓦解，在冷戰期間，武裝政策以及干涉他國事務是美國與蘇聯兩極強權最主要的國家對外行為。一旦冷戰結束，這種結構的強制力似乎隨著兩極的削弱而被腐蝕。Kenneth Waltz 解釋，他承認在現階段的國際關係中，核子武器以及經濟事務確實提供國家行為者改變的空間，雖然，結構看似正在轉變，但是主要轉變的開頭是體系單元之行為而不是結構。⁷²

無疑，結構依然是存在，但這個結果卻體現出另外二項「現實」，首先即結構現實主義知識社群的解釋力在時間巨輪的轉動之下，解釋力的範圍有越趨限縮的趨勢，這點促使研究者開始尋找新的假設來不斷證明，以補足結構現實主義的缺陷，其實結構現實主義知識社群的核心假設依然還是可以接受驗證的，即結構不變，而是體系的運作模式在改變。因此，權力平衡可能依舊是行為者所要選擇的戰略，但是不同的權力平衡戰略方式有其存在的空間，由此必須觀察第二點現實；亦即人類安全的新興安全概念的出現，不同的權力平衡的戰略才能使在結構下互動的行為者保持獨立決策的理性，因此，軟性平衡就可能有其研究必要，軟性平衡不僅回應國際新興議題的重要性，且促使研究者找出新的假設來持續驗證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假設，如同 Imre Lakatos 所

⁷¹ Paul Schroeder,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pp. 108-109.

⁷² Kenneth N. Waltz, 1993,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pp. 44-49.

言，好的理論的先決條件應該要不斷增加核心硬核假設的強度，且能夠不斷的增加輔助假設與被驗證。

第二節 現實主義典範研究

國際關係的研究廣義而言是企圖去產出一套有關於國家政府以及意見領袖在世界政治的權力競逐中，所需要採納的戰略選擇與追求安全生存考量的學科，其涵蓋了正當的學術專業，且這個學術的研究能夠確切貼近現實，因而有別於當代歷史研究的價值，因此國際關係的研究就應該要被視為一項科學知識社群。⁷³既然是知識社群，其中就有典範的建立以及學科本身研究程序的足跡可尋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就是研究者鑽研國際關係的主流典範之一。

典範的研究依然重要，建構一個正當的科學研究程序同樣不能被輕忽，國際關係研究的現實主義知識社群，也是不斷的以不同的假設與理論持續的被驗證後，而看似得以穩固現實主義典範的硬核。由此觀之，典範移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⁷⁴現實主義理論本身具備有多樣性的意涵，且研究者可以透過不斷加強保護帶以使現實主義的硬核持續存立，現實主義的硬核包括現實政治(Real politik)、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利己主義(Egotism)以及無政府狀態(Anarchy)。⁷⁵現實主義也試圖符合典範轉移的假定與嚴謹的研究過程，使現實主義具有其多樣性的意涵，例如在安全研究探討範疇上，現實主義學派投入相當程度的努力研究，但是

⁷³ Elizabeth C. Hanson, 1992, "William T.R. Fox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s.,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p. 1.

⁷⁴ 參照林碧炤，2010，〈國際關係的典範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 29 期，頁 53-58。典範移轉的幾個可能原因：

(1) 國際關係結構性的改變是最根本的原因，典範的移轉是很自然的結果，否則知識社群無法掌握和了解這些結構性變化；

(2) 知識社群的反思與自省，這些知識社群可能包括大學、個人、國家及私人企業的力量或是聯合國極其專門組織所帶動的研究、制定的規則導引出來的典範移轉。

⁷⁵ 高德源譯，2002，Jack Donnelly 著，《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頁 7-10。

當國家訴求安全與生存的目標跟隨國際現實情勢的變化而有所變遷時，國家面對不同於以往軍事安全問題的人類安全問題時現實主義本身應當如何保有其硬核，而作出不同的回應，是本論文選擇以現實主義典範知識社群作為分析基礎的主要原因。

現實主義理論脈絡發展，首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迄 1930 年代，國際政治關係爆發危機，以樂觀的理想主義(Idealism)或稱為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為主流的知識社群受挫，這些理想主義的知識社群過於樂觀的看待建立一個超國家制度以及建構一個和平世界秩序的可能，更低估了以國家為主體所組成的體系當中的政治改變複雜程度。⁷⁶理想的破滅，展開了一系列重新思考人類行為的新思潮。在理想主義的蓬勃發展的時間範疇內，國際政治都被錯誤的解釋，因為所有人都忽略了權力因素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⁷⁷相較於樂觀的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知識社群認為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依然承受著許多研究上的困難，⁷⁸欲解決這些困難就必須要擁有更具說服力的方式以處理理想主義所遺留下來的問題。E. H. Carr 認為每個理論都有其目的性，理想主義也不例外，然而理想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其過程就像是中國古代在探索煉金術的可行性一樣，企圖盡一切的可能將任何物質都煉成黃金，但是煉金師從來就沒有思考過物質既定的元

⁷⁶ Elizabeth C. Hanson, 1992, "William T.R. Fox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s.,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p. 5.

⁷⁷ 同註 72，頁 39。

⁷⁸ 例如 Raymond Aron 提到六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困難：

- (1) 有無數多的因素影響國際體系，且研究者無法區分這些因素是內部產生，而哪些因素是來自於外部。
- (2) 主要的國際行為者，國家，不可能只有單一目標的特質。
- (3) 國際政治無法明確區別獨立變項或依賴變項。
- (4) 國際政治不同於經濟學，例如投資與儲蓄對等的算計同質性可以被操作。
- (5) 國際政治的研究沒有一個機制依歸存在能夠予以中斷的研究平衡重新恢復。
- (6) 國際政治是不可能去預測的，也不可能使用任何明顯的手段進行操作而引導致特定的目的。

素組成與分子結構是無法因為改變其形狀或色澤就可以順利煉成黃金的現實，在沒有考慮到現實情況之下，煉金術是絕對不可能會實現的，理性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現實錯誤的認知，若欲達到其理想的目標其難度之高得以想像。現實主義知識社群從此出發，建立多樣性的輔助性假設以闡明權力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各個面向，進而發掘新事實。以下便提出幾個現實主義的典範並以學派為其代表作為探討軸線，加以分析其學派之研究程序，以說明現實主義典範的長成。

壹、古典現實主義

古典現實主義代表人物 Hans Morgenthau 在其巨作《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強調，在無政府狀態，國家行為者是基於理性的本質為出發，理性為外交政策的本質，而理性是根基於國家利益與權力的考量。⁷⁹對於現實政治的看法可以摘要如下，國際政治如同一般社會一樣，受制於客觀法則，而這些客觀法則是根據人性(Human nature)為基礎，一個國家的主要關切指標是利益的概念，而利益的定義則是以權力地位為基礎。國家必須盡可能維繫及發展權力，但是利益的內涵以及權力的運用決定於時間與環境的改變而轉化。普遍的道德原則的形式過於抽象，無法是用於國家行為，畢竟國家促進本身利益的目標與普遍的道德原則有其差距，國家往往是藉由普遍的道德原則來合理化其外交政策，權力的現實才是政策制定的引導方針。Morgenthau 解釋說，權力就是人類對於其他人的限制和行動的控制，只要有人類群居在一起，權力就存在；亦即，權力是國家控制其他國家的行動與意願的工具，權力是最直接的目標，因此國家必須展現

⁷⁹ Kenneth N. Waltz,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Iss.1, p. 25.

權力、維持權力以及擴大權力，⁸⁰最後必然以一種社會原則的體現方式達成權力平衡的均勢。⁸¹儘管如此，Morgenthau 的權力平衡觀，卻被批評為是模糊不清的。⁸²

貳、結構（新）現實主義

基於對現實主義的修正便成為現實主義知識社群的工作，Kenneth Waltz 在《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著作中將國際政治切割為三個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分別為個體行為者、主權國家以及國際政治體系層次，分別區隔出古典現實主義受制於客觀法則的人性基礎、國家和國際政治體系的關係，其發現國際關係本質上存在著一些相似性，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體系層次的結構是呈現無政府狀態。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強調結構現實主義有別於古典現實主義，不以個體行為者的人性為研究途徑，提出一個解決區分影響國際政治體系的內部與外部因素的方法，結構現實主義將國際政治體系視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當中存在結構，結構與單元層次同時區別與連結，結構現實主義建立國際政治的自主性，並且創造了一個理論的可行性，即將結構視為一個整體的層面，透過結構限制了國家行為者採取某些行為而同時驅策其他行為者的行動。⁸³結構的概念是基於單元(Unit)不同的排列以及由單

⁸⁰ Hans Morgenthau, 2004, "A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aren A. Mingst and Jack L. Snyder,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Y: Norton Company, pp. 49-53. 或參照 Hans Morgenthau,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p. 4-15。

⁸¹ 這裡所指的權力平衡是透過不同外交政策以達成均勢的結果，包括補償 (compensations)、武裝軍備 (armaments)、聯盟 (alliances)、成為權力平衡中的平衡者 (the holder of the balance)。參照 Hans Morgenthau, 2004, "Balance of Power," in Karen A. Mingst and Jack L. Snyder,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Y: Norton Company, pp. 124-129.

⁸² 張保民譯，1976，Inis L. Claude Jr. 著，《權力與國際關係》。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頁 18-28。

⁸³ 同註 79，頁 29。

元所組成的不同行為為基礎，而透過互動產生不同的結果。國際結構被定義為一個擁有秩序的原則(Ordering principles)：不同於國內政治內有階層的秩序，在國際政治中，體系與體系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上下階層之分並不是主要現狀，也許國際體系中的上下階層可能存在，但國際政治還是以去中心化且呈現無政府狀態為主要。在無政府狀態的結構秩序下，體系內之國家行為者成為最主要的單元，每個單元都是自助的，因此，生存(Survival)成為國家行為者追求的永續目標，在無政府的秩序之下，每個國家行為者都希望其他國家行為者能夠以相同的模式追求生存；單元的特色(The characters of the units)：在無政府的秩序之下，國家成為最主要的單元行為者，在此必須說明並不排除體系內有其他行為者的存在，由於無政府秩序依舊不變，國家便會是相似的單元(Like unit)，國家行為者的相似並不是其國內資源或是外交政策上的相近，而是國家行為者在體系內所必須面對的事物是相似的；以及權力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在無政府秩序之下，國家單元之間的功能並沒有差異，而其有所差異的地方是在於行為者彼此所擁有的權力大小是不同的。⁸⁴因此，行為者之間在結構的壓力下，追求權力平衡就有其需要。參照圖 2-3 結構現實主義概念圖。

⁸⁴ 請參照 Kenneth N. Waltz, 2001, "Political Structure," in Karen A. Mingst and Jack L. Snyder,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Y: Norton Company, pp. 7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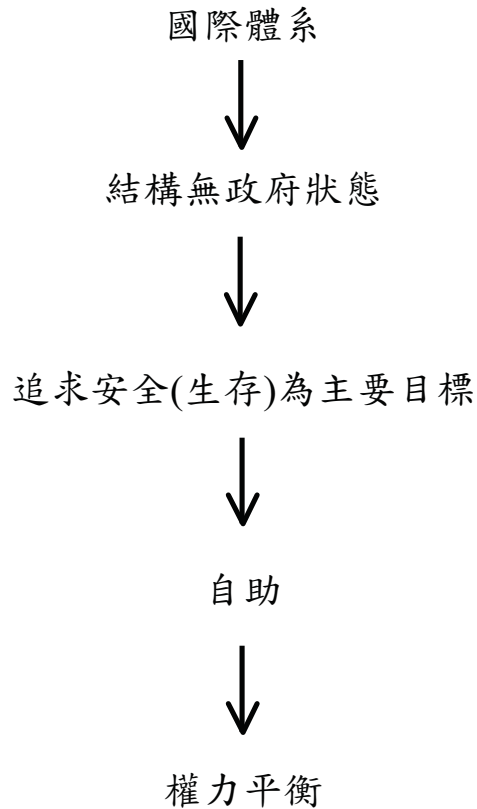


圖 2-3：結構現實主義概念圖

資料來源：Paul Schroeder,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p. 109.

即便結構現實主義沿襲古典現實主義國家中心論、無政府狀態以及權力與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議題的核心假設，但是結構現實主義的發展針對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有幾點相異處或批判，其一是分析層次上的差異，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以個體行為者為研究途徑，結構現實主義認為採用國際體系的角度切入才能解釋大部分的國際政治，而非根據客觀法則的人性；其二是雙方對於道德(Morality)的觀點，古典現實主義時常合理化普遍的道德規則成為外交政策的延伸，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透過權力追求國家安全才是道德的作為；其三，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最後的目標，反之結構現實主義將權力視為達到安全的一種手段；

最後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平衡是人為操作的，而結構現實主義認為是結構的壓力影響而造成權力平衡。

任何的理論都會預留無法解釋的一些部分，且沒有一個理論能夠直接的、簡易的去適用於現實，理論必須是可以幫助研究者了解、解釋或甚有時可以預測事件的動向，但更重要的是，理論也協助研究者去了解一個既有的體系是如何運作的。理論是無法完全貼近事實或與事件相符合，假使一個理論企圖解釋所有的事物，除非這個理論描述了所有的細節。⁸⁵結構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的不同點更包括結構現實主義改變因果關係的觀點⁸⁶、提供一個有別於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解釋途徑，⁸⁷以及以不同的觀點看待單元層次。⁸⁸現實主義是單純的歸納研究法，而結構現實主義則是大量的演繹過程。相較於結構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力可能犯了 Karl Popper 研究無法否證的錯誤。

參、 攻勢現實主義

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權力鬥爭是相當尋常的生活本質，每一國家在體系中不僅是為了追求成為最具有權力的行為者，還必須確保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超越本身的相對地位。⁸⁹國際缺乏一個具有中央集權的國際威權存在，這種安全競爭窘境阻礙行為者去獲取共同的目的，就國家而言，他們無法將國家的管轄能力讓渡

⁸⁵ 同註 79，頁 30-32.

⁸⁶ 對於古典現實主義而言，世界是互動的國家間之權力運作所組成；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互動的國家可以被研究，但是前提是當這些國家是在結構與單元層次的分化中所進行的因果關係。

⁸⁷ 結構現實主義更是利用權力的概念去定義結構的特徵。國家最終考量的可能不是權力本身，而是安全。

⁸⁸ 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異質性，因為他們相信不同的行為與結果是直接的根源於國家組成元素不同的關係。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單元之間是相似的。

⁸⁹ John J. Mearsheimer,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pp. 9-10.

於一個最終的組織或一個超國家主權體來管控，因此彼此之間無法保證都會遵循承諾，現實政治的氛圍產生的零和遊戲製造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問題便出現，⁹⁰行為者在安全困境中不斷的算計權力與利益，安全困境延伸出許多國際政治的現實態勢。⁹¹

John Mearsheimer 在冷戰結束時期後提出國際關係的研究必須部分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概念。Mearsheimer 依然認為國家的行為來自於國際結構的壓力，而國際結構卻是以下列假設摘要為重要的基礎，即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的狀態，因此主權為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體系中活動的最終依據，但是因為每個國家行為者都擁有足夠可以摧毀敵人的軍事力量，因而國家行為者永遠無法得知其他國家行為者的意圖(Intention)，況且意圖無法使用百分比的方式進行衡量，且意圖可以隨意改變，國家安全便無從依靠只得自助，故國家行為者為了確保生存的目的，必然會進行理性的行為選擇，國家的理性思考皆是深思如何在國際體系下以戰略式思維求取生存機會。總上所述，恐懼以及自助的環境，使得國家行為者必須要成為體系中最強的行為者才能解決根本問題，國

⁹⁰ John Herz 定義安全困境，意指，團體或個人彼此生活在一個沒有高度組織的一致性，比然會考量到自身的安全問題，害怕安全受到攻擊、支配、成為他者的隸屬或甚至安全被其他團體或個人給殲滅。為了避免這些情況發生，團體或個人就必須要充分的增加足夠的權力以逃脫受其他團體或個人使用權力的影響，如此，也使得其他團體或個人感到更不安全與壓力強迫他們去做最壞的打算，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感到完全的安全。在這麼一個競爭的世界裡，爭奪權力才能確保自身安全，畢竟安全與權力的危險循環是會不斷加總上去的。參照 John H. Herz, 1950,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 No.2, pp. 158-159.

⁹¹ John Herz 將安全困境延伸至六個面向：

- (1) 終極的安全困境來源是無政府狀態，即在無政府狀態中缺乏一個高度一致性。
- (2) 安全困境之所以產生的直接原因是來自國家的不確定感與恐懼。
- (3) 國家在自助的情況中，透過不斷累積越來越多的權力以企圖脫離安全困境的束縛，這種行為反而製造了權力競爭的惡性循環。
- (4) 國家持續增加權力並不會增加本身的安全，反而適得其反或最後釀成悲劇。
- (5) 安全困境可能引發戰爭，但並不是戰爭原因的全部。
- (6) 安全困境的動態是一個自我強迫下的殘酷輪迴。

參照 Shiping Tang,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18, No. 3, pp. 590-591.

家行為者會最大化國家權力，以企圖改變權力平衡並且尋找任何可以增加權力的機會。⁹²

國家企圖追求權力的最大化與生存的可能，建構霸權的地位與權力投射範圍就成為國家行為者最後的目標，⁹³國家行為者在以區域為範疇建立霸權成為對外行動最主要的趨向之後，進一步開啟與其他區域霸權之間的抗衡，以使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權力維持平衡穩定國際體系。攻勢現實主義同意結構現實主義對於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以及由結構改變體系內權力配置的論點，但攻勢現實主義修正了結構現實主義追求生存的手段，並且將行為者的意圖納入考量，在未知對方意圖的前提條件之下，權力平衡無法確定自身安全，國家唯有持續的擴張自身的權力投射範圍才得以確保生存獲得保障，在區域內部獲得勝利之後與區域外霸權產生抗衡，才能有效維持國際體系權力的平衡。

參、 守勢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間關係因為擔憂對方的欺騙行為，因此國際合作是不可能發生的。Robert Jervis 卻認為國際合作之所以在現實主義架構下無法實現，現實主義本身假定的全然錯誤是主要因素，如 Matthew Rendall 闡釋攻勢現實主義的證據實質上具有選擇性偏見存在，其論述邏輯均圍繞在侵略性國家在侵略性時期的作為。⁹⁴現實主義將權力配置的問題視為國家主要權宜目的，但是有鑑於既有的國家目標之差異的事實，因而必須將現實主義予以區分出攻勢與守勢兩項變數，在許多情

⁹² John J. Mearsheimer, 2004, "Anarch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Karen Mingst & Jack Snyder,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Y: Norton Company, p. 54-66.

⁹³ John J. Mearsheimer,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105, No.60, pp. 160-162.

⁹⁴ Rendall, 2006,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2, No.3, pp. 523-526.

勢或領域範疇，國家依然有足夠的空間可以一起行為以減輕無政府狀態的影響，製造相互利得而避免共同傷害。守勢現實主義贊同在無政府狀態下所產生的安全困境的確容易產生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於安全困境能否達成合作的關鍵端視於在追求現狀生存的國家所面對的是志同道合的夥伴還是一個堅持擴張主義意識型態的國家。在特定的情況下增加合作機會所需要的改變有賴於國家在戰略選擇偏好上(或選定達成目標的途徑上)，以及對於目的與預期結果之間的差異考量而定，因為國家本身對於手段與目的(Means-Ends)會有先後選擇的偏好差異，有些國家針對於結果選定上的偏好，而有些國家則是追求在戰略運用上的偏好，因而在選定相同手段或相似目的的國家之間便出現在特定條件配合之下的合作的可能。⁹⁵

Charle Glaser 提出結構現實主義高估對於合作與競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結構現實主義的客觀假設之下，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還是有可能會發生的，其實合作本身就是一向自助政策的產出，決定國家能力的不是權力本身，應該將攻守能力的權變(Contingent)變數整合進入現實主義理論，因而國家所要關注的不應該只是權力上的配置，反而是國家本身的動機與偏好。⁹⁶攻守能力的差距不同，國家本身所欲展現的手段與目的就會有所不同，Jack Snyder 認為當攻擊能力的效力大於防禦能力時，因為擔憂其他與自身關係良好的國家會被擊敗的可能，國家之間傾向於組成緊密的聯盟；當本身防禦能力較攻擊能力堅實時，則國家會選擇放棄現有抑或未來潛在組織同盟的可能，因為防禦能力提升

⁹⁵ Robert Jervis, 1999,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pp. 42-53.

⁹⁶ Charles L. Glaser, 1994,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pp.50-90；或請參照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2期，頁1-17。

使國家沒有必要輕易付出更多的成本去阻止侵略者，因此是國內領導者對於戰略環境的知覺才是決定國際政治結果的主要變數，而非受制於客觀環境的問題。⁹⁷

在安全困境的環境變數下，國家追求權力平衡所要考量的不是單純的權力或物質能力分配的問題，而是彼此攻守能力之間的差距。⁹⁸將上述變數納入現實主義討論，因而發現在安全困境下依舊有相互合作的空間存在，國家並非完全受制於客觀結構環境的影響，對於手段與目的戰略選擇排序以及攻守能力上的權變計算，也得以解釋相對權力之間的平衡，也許防守就是最好的進攻。

肆、英國學派

1970 年代，世界經濟發生危機，南北問題衝突升高，⁹⁹促使研究者開始反思這些問題是否依舊適用現實主義學派對於權力以及結構因素的觀點，抑或是這些既有文獻能否滿足與體現這些「現實」的問題。以 Susan Strange 為代表，將國際政治的研究場域由國際體系部分移轉到市場場域。Susan Strange 於《國家與市場》(States and Markets)一書發展她的理論概念以回應她所存疑的幾項經驗問題，並且去回覆自身對於現有文獻解釋能力不足的問題，而進一步以她的方式得到滿足。

Strange 發掘不論是古典現實主義或是結構現實主義均缺乏考慮「經濟因素」，忽略全球化與民主化改變結構的可能，因而無

⁹⁷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1997,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pp. 919-920.

⁹⁸ Thomas J.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1, pp. 65-70.

⁹⁹ Susan Strange, 1994, *States and Market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p. 13-21.

法解釋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關係，順此疑點 Strange 提問，到底在國際政治中權力是存在於哪裡？答案是一部分的權力仍然是由國家掌握，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權力是存在於市場裡。¹⁰⁰國際關係的研究必須重新衡量除了以權力為依歸之外的經濟因素造成結構的轉變已經改變國際關係的本質，因為工業化後的國家更有雄厚的權力、財富結構的改變以及信用借貸的創造，都會增加世界體系的中權力的不對稱問題。因此權力應該被區分為結構性的 (Structural) 與關係性的 (Relational) 兩個權力面向，而當今國際政治已產生有四項主要在結構性權力已發生的實質改變，即金融、生產、安全以及知識結構性的權力，¹⁰¹這四個結構性的權力建構結構，產生在國際體系內並且迫使行為者行為，這些結構權力的改變使得國家自主性越來越低，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也許在某些部分並不適用於在這類國際體系現狀。¹⁰²

Susan Strange 提供了一套新的結構概念分析架構來看待國際政治的結構以及權力內涵，其沿襲結構現實主義的結構觀點，認為結構是造成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分配的動因，但是 Strange 另外納入結構現實主義所忽略的經濟因素於國際關係的討論中，由經濟因素所建立的生產、金融以及知識結構三個面向融合現實主義關切的安全結構形成結構四角柱的四個面向，才足夠以體現國際

¹⁰⁰ Martin Griffiths, 2001, *Fifty Key Think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ylor and Francis e-Library, pp. 41-45.

¹⁰¹ Susan Strange 對於結構的定義如下：

(1) 安全結構：安全結構是由一般的現實主義所組成，即國家的威權權力端視於國家本身是否能夠供給人民安全，以對抗來自外來威脅的程度而定。

(2) 生產結構：基於在一般社會中的財富創造以及科技使用的發明方式所產生的國家與市場之間權力分配的結構。

(3) 金融結構：信用，在國際關係中是可以被製造、分配以及管理的。

(4) 知識結構：即什麼事物是被相信且眾所皆知的知識，而這些信念、理念以及知識是透過什麼管道傳播與確定的。請參照同註 99，頁 45-138。

¹⁰² Susan Strange, 1994, "Wake up, Krasner! The World Has Chang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 No.2, pp. 211-214.

現狀的現實面，Strange 的理論針對 Waltz 理論中只有權力結構單一面向的局限性，並且於實質的權力面向上進行了修正與填補。

伍、新古典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重檢視分析層次的研究途徑之問題，Randall Schweller 於其著作中曾強調，改變國家行為的是國內結構與內部政治情況，而非外在環境的影響，客觀環境影響程度並不顯著。國內政治過程扮演政策輸出以回應外部因素的中介者，國家在相同的體系與機會之下，會有不同的對外行為回應，這反映出國家內部因素影響的重要性。在實踐上，從歷史資料檢視發掘國家時常不採取平衡的行為反而轉向扈從的戰略選擇，因為在修正主義國家之中，扈從的行為更是盛行且這些國家選擇同盟是基於國家內部利益考量並非傳統現實主義所認為的安全因素。其更認為行為者內部的表現，會比國際體系層次的影響來的重要，假設平衡帶來過大的風險與代價，國家行為者不一定會選擇平衡的政策。影響國家行為者選擇平衡與否的關鍵在於行為者的意願(Willingness)以及能力(Ability)。¹⁰³

意願以及能力分別各包含兩項變數，至於意願的兩項變數部份，首先是菁英的共識(Elite consensus)，菁英是最直接的可以選擇回應與不回應外在威脅的主要因素，而菁英共識與平衡行為關鍵問題在於菁英是否同意外在威脅是一種威脅；菁英是否能夠認知威脅的本質；菁英能否決定哪一種具有效率且最適合國家利益的政策來解決威脅來源；以及在選擇平衡政策時菁英能否考量到國內政治風險與代價；最後則是菁英如果身處在民主政體中也會

¹⁰³ Randall L. Schweller,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2, pp. 162-164.

影響到其政策的考量；次之為菁英內聚力(Elite cohesion)，政治菁英可能會因為意識形態、文化、宗教差異或是官僚利益、利益團體、種族團體等因素而影響到政治菁英們的內聚力。進而影響整體國家行為者的選擇平衡政策的意願。能力的變數包括下列兩項部分，第一，政府或建制上的脆弱性(Government/Regime vulnerability)，這的變數主要關注在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菁英與大眾的連結在決定政策可行性範圍與決策者之地位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作者認為相對脆弱的政府與建制比較傾向以尋找同盟的方式與機會來對抗外在威脅，因為這種方式是成本低且效率高；第二，社會內聚力(Social cohesion)，社會內聚力指大眾對於國家認同的程度高低，社會中所有成員接受相同的遊戲規則且認同社會制度之正當性基礎則社會內聚力高，則國家行為能力高，反之。當分歧的社會面臨嚴重的外部威脅時，國內政治菁英可能會選擇代罪羔羊戰爭(scapegoat war)來增強社會共識。亦即，Randall Schweller 認為社會中越缺乏共識則國家內部越會依賴同盟去改變國內歧見與平衡外部威脅，反之國家社會共識越高則會依靠自我力量去對抗外部威脅。¹⁰⁴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內權力平衡與否端視於單元層次(Unit level)的因素來決定國際政治結構的內涵，權力平衡並非國家最終的必然選擇。

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英國學派，以及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現實主義典範長成或是變革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並且理論間承先啟後的角色，即便如此，知識社群只會不間斷且持續的進步，雖然現實主義典範不必然會跟隨 Kuhn 不理性的科學革命邏輯而全盤推翻先前的理論架構獲概念，進而重組另立新的典範。然而，現實主義典範確實一

¹⁰⁴ 同上註，頁 168-186。

直在進行修正的工作，一方面現實主義並沒有摒棄舊有理論的主要核心假設，反而是站在先前理論巨作的肩膀上而發掘更廣泛更深層的問題根源，並且採取強化保護帶的方式針對舊有理論進行檢定的程序，也因此反映出另一方面的問題，任何理論本身從歸納到演繹的形成過程就存在有解釋力受到侷限的問題，亦即沒有一個可以百分之百完美無暇的理論可以解釋所有的現象，更何況是在變化空間無法掌握又抽象的國際政治領域之中。

第三節 現實主義典範之侷限

現實主義學派無法在既有的理論框架中通過現實環境變遷的假設檢定考驗，而使理論本身產生解釋的局限性，例如在安全環境更迭的國際環境中讓過往的安全戰略研究可能面臨難以解釋的窘境，現實主義學派唯有透過不斷的回應問題與修正理論而作出更多的理論調解。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為一個典範是可以確定的，這點從本張第二節的文獻探討中各個理論生成的過程可以獲知一個肯定的答案，另外也從中發現一項明確的啟示，如果我們把這些現實主義典範以一個歷史的時間軸串起來便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即典範確實會產生學科性轉移的結果，而轉移的原因是因為綿延不斷的國際現狀的變遷導致國際關係發生結構性改變的因素，例如古典現實主義在 1930 年代對於理想主義建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烏托邦的受挫進行的批判，古典現實主義以個體行為者為主要分析層次的理論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進入冷戰的兩極體系結構，兩強在安全困境的殘酷輪迴中進行博弈，反而是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力獲得重視，進入 19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等現實問題崛起的挑戰，Susan Strange 四個面向的結構分析解釋力開始得到多數的支持，又冷戰結束之後的 1990 年代，體系的變遷帶來全球化、民主化與非傳統安全等國際新興議題複雜化國際關係研究的內涵，以上這些歷史事件反映出導致現實主義知識社群進行反思的原因，此一歷史軸線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範疇裡該用何種的理論來解釋、典範內容如何移轉等，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

然而，藉由上一節當中以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英國學派以及新古典現實主義六個現實主義相關典範的耙梳發掘一個共同點或是共同特性，此共同點或共同特性在於六個典範均是圍繞著現實政治、權力政治、利己主義以及無政府狀態的主要核心概念為出發點，回應了 Lakatos 保存硬核，以及典範長成的程序的觀點，新的輔助性假設被佐證且不斷填補保護帶的強度，並且導引出一個新的 T'理論而建立「新事實」，新事實是通過對舊有理論(T)的辯駁驗證而得以詮釋的經驗內容、新事實重新解釋了舊有理論的成果，完成舊有理論無法詮釋的內容，現實主義學派的典範學科長成程序如表 2-2 所示。

新事實所通過的佐證皆是可以實證的，因而保護帶與新事實之間是有承先啟後的關聯，輔助性假設通過檢證形成保護帶，再由保護帶內的核心假設為基礎建立新現實的理論真實地位。據此，上節六個現實主義典範都展現修正先前理論之侷限的目的，各理論所發掘的輔助性假設強化理論保護帶的長成，Hans Morgenthau 以人性本惡為假設，在受制於客觀法則的情況下，國家唯有追求權力、展現以及維持權力的以維護自身在安全困境恐懼當中不受侵犯。至於 Kenneth Waltz、Susan Strange、John Mearsheimer 以及 Robert Jervis 一派則都是採納結構為分析途徑，Waltz 認為由於結構的無政府狀態，加上單元的相似性，國家行為者最終採取的是權力配置上的平衡。

Mearsheimer 將意圖變數放進對結構現實主義的修正探討中，在未知對方意圖的困境裡，每個區域國家行為者必然以稱霸為目標，並在區域投射範圍內完全支配其他國家，最終區域霸權

之間的平衡穩定國際體系；Jervis 排除無政府狀態下於安全困境中國家之間無法合作的偏見，重新審視手段與目的的先後選擇問題，並點出在結構的客觀環境裡的權變變數而呈現合作的空間；Strange 將被忽略的經濟因素放進國際政治的研究，其修正結構的內涵，佐證結構本身的多樣性，詮釋結構另一個層向的現實；新古典現實主義則重回單元層次的研究途徑，以補足結構簡約理論所忽略的國內意願與能力上的理論缺失問題。現實主義學派的保護帶長成概念則如圖 2-4 所示：

表 2-2：現實主義學派的硬核與保護帶

典範的核心 典範的修正	硬核(Hard core)	保護帶 (Protective belt)	新事實(Novel fact)的成立
古典現實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現實政治 2. 權力政治 3. 利己主義 4. 無政府狀態 	基於「人性」的客觀法則在社會上轉變的結果即為政治	國家應該追求、展現以及維持權力
結構現實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現實政治 2. 權力政治 3. 利己主義 4. 無政府狀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際體系結構 2. 單元的相似性 3. 權力分配 	國家彼此權力平衡
攻勢現實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現實政治 2. 權力政治 3. 利己主義 4. 無政府狀態 	在安全困境中必須不斷極大化物質權力	唯有採取攻擊態勢追求權力成為霸權，達到區域霸權間的平衡
守勢現實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現實政治 2. 權力政治 3. 利己主義 4. 無政府狀態 	在特定的條件配合之下，國家之間依舊是可以合作而免除競爭	國家在手段與目的的先後選擇偏好之差異，並且將攻守能力納入考量
英國學派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現實政治 2. 權力政治 3. 利己主義 4. 無政府狀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結構性權力 2. 相關性權力 	權力結構的多樣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安全結構 2. 生產結構 3. 金融結構 4. 知識結構

典範的核心 典範的修正	硬核(Hard core)	保護帶 (Protective belt)	新事實(Novel fact)的成立
新古典現實主義	1. 現實政治 2. 權力政治 3. 利己主義 4. 無政府狀態	視單元為主要分析起點，採納考慮國家內部的意願與能力之配合程度	國家得以選擇權力平衡或扈從戰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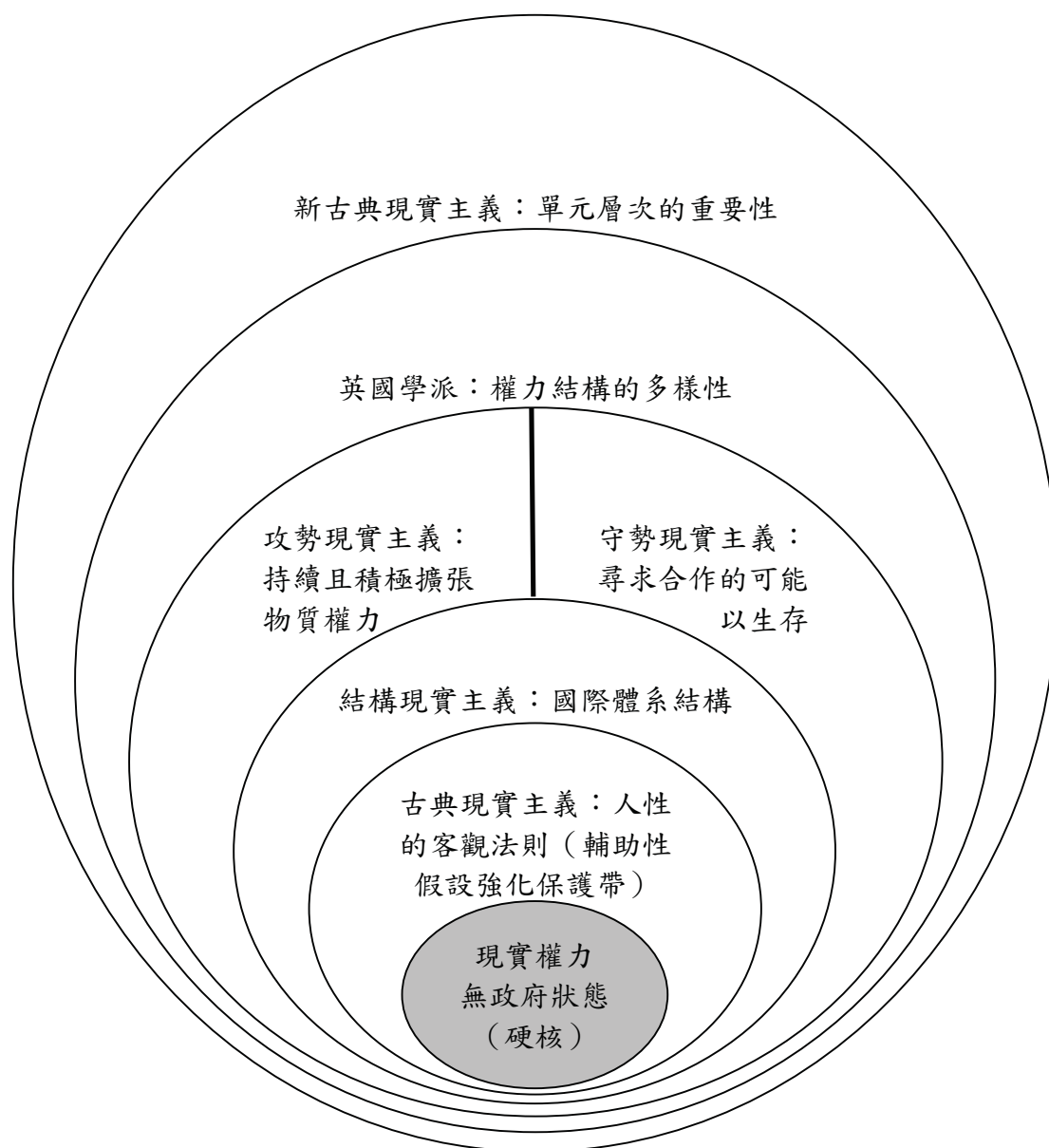


圖 2-4：現實主義學派保護帶長成概念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是故，現實主義學派在實踐上的核心價值是「現實權力」與「安全」的訴求，現實主義學派所討論的安全概念抑或是達到安全的戰略也承襲歷史進程的腳步。西元 1648 年西伐利亞條約 (Westphalia Treaty) 生效，以國家為單位的體系逐步成形，主權概

念逐漸被深化，主權國家便成為主要的安全主體，因而找尋保障主體安全的最佳調適方式，成為現實主義學派日後最主要的貢獻。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受制於安全困境的環境恐懼中，唯有不斷增強權力、展現權力以及擴張權力以保障國家以及軍事上的安全；結構現實主義有別於古典現實主義改以結構為主要研究途徑出發，在冷戰時期結構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取代古典現實主義解釋了大部分的國際關係，但當美國與蘇聯兩極體系漸趨於瓦解，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力卻也日漸凋零且批評聲浪環四，¹⁰⁵例如 Mearsheimer 與 Strange 針對權力平衡與結構提出新穎的觀點進行部分修正，即便結構現實主義也面對權力平衡瓦解的批評作出回應，¹⁰⁶即使如此，安全研究在議題、面向以及層次上確實產生擴展的改變，逐步從單一面向走向多樣化的議題面向。安全研究所指涉的對象、威脅來源以及核心價值確實要重新評估的必要。¹⁰⁷

即使如此，承如典範變革的探討，每個典範雖然都有其長成的空間與解釋力的強弱，遵循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程序，好的理論的先決條件應該要不斷的增加硬核的強度，且能夠不斷的增加輔助性假設與被驗證。結構現實主義在冷戰結束之後，因為各種

¹⁰⁵ 國際關係學界研究者對現實主義理論的重新認識，例如：透過檢證得知結構現實主義的核心問題在於，結構現實主義在論述過程中並沒有充分的檢視相關歷史證據，便對於國際歷史作出描述並且預測了一個決定性的秩序。請參照 Paul Schroeder,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pp. 108-148；又例如調整現實主義以追求長期生存目標為主要課題，因礙於安全條件，國家決策者必須以短期利益交換的方式完成一定程度上的軍事準備，以持續邁向相對安全的生存可能。請參照 Stephen G. Brooks, 1997, "Duel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3, pp. 445-463.

¹⁰⁶ 結構現實主義回應權力平衡瓦解的幾項理由：

- (1) 兩極體系的瓦解應該將它視為異常的現象。
- (2) 穩定的體系會發生改變事實上是因為軍事能力上的轉變導致。
- (3) 單一的特例不能拿來解釋證明一般理論的錯誤。
- (4) 國際政治依舊是無政府狀態。
- (5) 現今體系是一個單極體系，但是不可避免的會繼續趨於向於多極體系的方向發展。

¹⁰⁷ 陳俞之，2010，《人類安全之應用與實踐研究：以失敗國家索馬利亞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頁 4-5。

因素所遭受國際關係知識社群的檢討與重新檢視，權力平衡理論面對這個問題，後繼研究者可能就有繼續修正理論內容的需要，以回應更多實際問題所帶來的挑戰以使現實主義理論更加嚴謹。

第四節 小結

採用邏輯實證論一系列辯駁與觀點的脈絡主要目的在於呈現軟性平衡理論的價值，首先從 Thomas Kuhn 典範科學革命的理解中得知典範的使用是建議採納一些可接受且適用的明確「範例」，以確切的方法表明科學研究的各項實踐，這個明確的範例可能是包括一整套的研究法則、理論、應用方式或工具，並且這個範例會提供一個特定的但是符合傳統科學邏輯的研究模式，以供應研究者一個研究模式或架構，但是因為科學革命是不斷持續的進行，所以新思維會一一湧現且逐漸形成新典範而以 Kuhn 所言之不理性的手段取代原先的舊有典範。

Karl Popper 則認為 Kuhn 的方法是從經驗中歸納出例如蘋果會從樹上掉下來的結果，這個結果卻無法說明為什麼蘋果會從樹上掉下來的因果關係，Popper 強調研究者應該要事先設定一個假設，並配合以演繹的過程且堅持理性否證修正必要的典範內容而形成科學。

Imre Lakatos 針對前述兩位學者的論點，Lakatos 認為 Kuhn 的論點是不理性的天真否證主義，Popper 的否證法無法解釋科學的持續性，Lakatos 提出複雜的否證主義截長補短，提供負面啟發與正面啟發的方法，此方法排除選擇直接否定理論結果而推翻理論的硬核的負面啟發之修正，而是調整輔助性假設的保護帶的正面啟發以形成一套完善的典範研究程序。

縱上所述，依照辯論脈絡可以得到兩項啟示，其一，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當中選擇典範的必要性；其二，典範會因為任何客觀

環境的改變而不間斷的長成，根據本論文探究現實主義典範六個學派後也得以獲得相同的結論，亦即現實主義典範依然維持國際政治對於現實權力以及無政府狀態的硬核，進而不斷修正理論本身的保護帶提出新的輔助性假設以回應現實情況，因此，因為國際政治客觀環境之變遷而建立的軟性平衡等權力平衡理論架構在知識論層次邏輯實證上，就有其存立的邏輯正確性。

第三章 權力平衡理論的修正

現實主義所重視的安全所涉及的範疇逐步從單一軍事安全的面向走向多樣化議題面向，使得安全研究所指涉的對象、威脅來源以及核心價值確實需要重新評估，本章遵循上述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程序，即好的理論的先決條件應該要不斷的增加硬核的強度，且能夠不斷的增加輔助性假設與被驗證。冷戰結束後，權力平衡理論面對眾多挑戰，後繼研究者針對權力平衡理論有繼續修正理論內容的需要，以回應問題並且使權力平衡的論述能夠更多方面的適用於解釋國際關係。

本章順此脈絡分為三個小節呈現。第一節主要在於耙梳各研究者對於權力平衡概念重新的解構與建構，例如，有研究者認為，國家之間的權力之所以不平衡，是否是因為來自於各個國家行為者本身所受到的威脅程度不同，因而導致實質上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一種威脅來源之間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行為模式。但是在考慮威脅平衡之後，另有研究者認為，應該考量的關鍵點其實不是國家之間所受到的威脅要素，而是國家行為者之間在成本利益上之考量的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除此之外，又有研究者認為，各個國家行為者的對外行為模式不一定只有平衡戰略選項可以選擇，國家行為者還可以選擇階層制扈從(Bandwagon)的戰略，而非權力平衡的戰略。以上述文獻耙梳作為基礎，除了上述研究者所顧及的理論要素以及國家行為者可以選擇的多項戰略之外，為什麼國家行為者的對外模式抉擇上，還有得以選擇軟性平衡戰略的空間，而其背後考量的因素何在？第二節延續並處理軟性平衡的定義，與論述本文選擇軟性平衡的背

後邏輯，目的在於闡明何謂軟性平衡。並且在第三節呈現軟性平衡有哪些適切的戰略選項與軟性平衡之評估。

第一節 對於權力平衡概念的重新解釋

壹、威脅平衡論

Stephen Walt 重新對國家行為者選擇傳統的權力平衡的行為模式做探討，並且提出威脅平衡論，¹⁰⁸其認為，促使國家之間集結成一體，或是使其分道揚鑣，而影響個別國家安全的主要動力之決定因素在於該國面臨到的是多大程度上的威脅，以及本身能夠得到多少預期上的幫助而決定，此外，這些因素除了會決定國家如何選擇聯盟夥伴之外，也會對整個國際體系的形塑與革新造成影響。¹⁰⁹理論的基本假定為，國家行為者在決策過程中所考慮到的主要問題，必須是本身的對外戰略能夠為自身帶來多大程度上的安全回應。雖然 Walt 的主要問題在於回答國家之間相互結盟的政策是否會有實際上的效用，其所圍繞的核心議題有三，第一項是國家行為者如何利用平衡或甚至是選擇扈從的戰略¹¹⁰以回應所面對的威脅來源，而不單純只是為了平衡威脅所帶來的權力來源；其次是國家之間的內部特徵是否一致，會影響國家之間同盟與否，考量到各個國家內部秩序上的不完整，這個因素是否也會改變國家選擇平衡或扈從的對象，以及最後提到，正確的政策工具是否會必然導致或改變他國的同盟偏好？亦即具體言之，經濟或軍事上的援助一定帶來忠誠的盟友？¹¹¹尤此延伸，我們能夠得到以下幾點論述，Walt 認為平衡的情況會比扈從的狀況來的更

¹⁰⁸ 譚偉恩，2006，〈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22 期，頁 149。作者認為威脅平衡論對權力平衡理論做出下列三點修正：

- (1) 將主觀層面的認知因素納入。
- (2) 修正平衡與扈從的定義。
- (3) 對國家面對威脅時的行為動機予以考量。

¹⁰⁹ Stephen M. Walt,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

¹¹⁰ 此處的平衡以及扈從的定義為，與其他國家結盟以對抗共同的現存威脅可謂平衡，而扈從意味向危險來源靠攏。

¹¹¹ 同註 109，頁 2-4。

為普遍，與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研究者關注的不同地方在於國家的同盟是以平衡來對抗威脅來源，而不是純粹只是平衡權力本身。雖然權力分配還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威脅的程度藉由國家總體上的權力(Aggregate power)、地理鄰近(Geographic proximity)、攻擊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ies)以及意圖(Perceived intentions)影響較有關連，因此認為威脅平衡論會是權力平衡理論之外的更好選項；根據 Walt 的證據顯示，國家內部的意識型態的影響力會比企圖平衡而組成同盟的動機還要來得低；此外，外交上的援助或是政治上的滲透都不是使國家有強大理由去組織聯盟的原因。試圖以上述回答問題，其目的並不在於能夠期望預測國家會選擇哪些政治工具的準確性高低，而是希冀從此角度解釋為什麼國家在第一時間裡會選擇自己偏好的或認同的某些國家進行結盟而平衡威脅。¹¹²

即便如此，會有如此不同的假定以及國家如何選擇盟友的理論基礎，端視於國家是如何面對外在威脅。平衡與扈從的同盟形式所產生的體系內安全變化是有相當大的差異存在的。Walt 說明了國家選擇平衡的原因是基於兩個主要理由。首先，國家將其生存的動機轉換成為一種風險考量，假使他無法抑制潛在的霸權，因此較為安全的策略就是加入那些沒有任一單一國家可以支配的聯盟之一方，以避免任何可能被支配的情況；另外，加入較為弱小的一方可以增加本身在聯盟當中的影響力，因為較弱小的一方可能需要更多盟友即時的協助。扈從政策，其背後的邏輯假設為，選擇扈從的國家其目的只在於形塑一個緩和的情勢，或是一個國家與具有支配能力的一方在戰爭時結盟，其主要是為了分享外溢的勝利果實，但是前者的選擇是為了防衛的理由，而後者則

¹¹² 同註 109，頁 5-13。

是以攻勢的理由為優先考量。因此，選擇平衡或是扈從，時常是因為能力上的考量與抉擇，權力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國家行為的因素，但是更精確的來說，使國家傾向去結為同盟或對抗外部力量的最佳因素是威脅。¹¹³總體而言，在國際政治中，平衡是支配全局的主要戰略選項，扈從只是機會主義的特例抉擇，¹¹⁴而比較有威脅侵略性的國家才會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抗衡。¹¹⁵

貳、利益平衡論

Randall Schweller 基於 Walt 的理論基礎也提出修正傳統權力平衡的論述，他提及，國家之所以會選擇傾向以平衡或是扈從崛起的國家或聯盟，其中極為重要的變數在對於利益(Profit)上的定義。¹¹⁶另外，其對於利益上的重新定義也修正了傳統權力平衡的幾個既有假定，認為在理論層次上不應該把平衡以及扈從兩個概念以刻板觀念視為是敵對劃分的概念，因為在實際上，國家有許多不同的理由可以去選擇平衡或是扈從，國家行為者選擇平衡是為了自保以及捍衛已經掌握的各種價值，而之所以選擇扈從，則是為了自我實力的壯大，以貪圖獲得更多的有價事物。直言之，驅動平衡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避免失去既有利益，啟動扈從，是因為有利可圖，因此，國家會選擇平衡作為有效的對外戰略全端視

¹¹³ 同註 109，頁 17-27。

¹¹⁴ Walt 在論述中提及，選擇平衡或扈從的先決條件假設有以下五點：

(1) 平衡行為會比扈從行為來的普遍。

(2) 越強大的國家，越傾向選擇平衡行為。弱勢國家會起而平衡對抗其他更弱勢的國家，但是當弱勢國家在面對強權的威脅時，會先選擇扈從的行為。

(3) 聯盟的盟友供給能力越高，國家越傾向平衡行為。然而，每當聯盟具有足夠，且確切的供給時，搭便車與推諉卸責的情況也會增加。

(4) 如果一國的侵略性意圖越被肯定，其他國家予以抗衡的意願也就越高。

(5) 在戰爭期間，越是接近勝利的一方，會有越多扈從者跟隨之。

¹¹⁵ 同註 108，頁 149。

¹¹⁶ Randall L. Schwelle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p. 72.

於外部威脅所帶來的成本利益考量，而非全然不需要扈從的對外戰略。除此之外，Schweller 還提及，對於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最主要的修正關鍵在於必須要把修正主義型國家(Revisionist state)重新納入國家選擇聯盟過程之中加以審視，¹¹⁷而威脅平衡論的理論設計只考慮了結盟目標對象是否為一個安全的選項，¹¹⁸而非在系統上排除了結盟的行為是因為利益的考量而驅動。¹¹⁹在國家互動的實踐上，許多國家為了保衛權力上或是聲望上的相對損益，因而合理化更多修正主義型國家的對外動機。綜上所述，決定國家行為者之間結盟與否的最關鍵的要素是有無「相容性的政治目的」，而非不平衡的權力或是威脅，現狀維持型的國家依然會加入支持維持現狀的聯盟，但是不滿意現狀的國家行為者，因為利益上的驅動比安全動機來得大，選擇扈從修正主義型國家的可能就會相對提高。¹²⁰況且，扈從比起平衡的戰略鮮少付出過多成本，在實際運作上有能夠獲得預期中的獲利。

由此分析，Schweller 提出四種不同的扈從或是國家對外戰略的可能形式，這些包括豺狼式扈從(Jackal bandwagoning)、護樁式扈從(Piling on bandwagoning)、未來的趨向(Wave of the future)以及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¹²¹進一步說明國家因為不同利益的

¹¹⁷ 現實主義理論或是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傳統上都是以現狀維持 (status-quo) 的角度去考慮體系內的行為模式，即國家行為者所考慮的第一要件不是擴張本身權力，而是如何在體系中維持原有的地位。Randall Schweller 將此點視為是現實主義的偏見，認為這種將所有的國家都視為是現狀安全的狀態是一個不正確的假定。

¹¹⁸ Stephen Walt 說明在戰爭時期，當國家必須做出選邊站的抉擇時，在當下又沒有不平衡的威脅來源存在，該國必然會選擇較為安全以及得以生存甚至是獲勝的一邊。從此我們觀察得知國家作出選擇的考量全然依據「結果」來思考對外政策。

¹¹⁹ 同註 116，頁 74-79。

¹²⁰ 同註 116，頁 85-88。

¹²¹ (1) 豺狼式扈從：即一個強大的修正主義國家或是聯盟，會吸引追求投機主義的修正現狀型國家權力的加入，其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利，尤其這類扈從者通常都只是為了分享外溢的勝利果實；

(2) 護樁式扈從：此類的扈從通常出現在當戰爭的結果大致已經底定時，這類的扈從者會跟隨勝利的一方以宣稱不勞而獲的去分享一些戰利品，出現此類扈從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如果扈從者不選擇對抗較弱勢的一方，其擔憂勝利者將會實施懲罰；

考量所行使的不同戰略。利益平衡論的利益概念具有兩層涵義，一個是在單元層次，另一是在體系層次。在單元層次上，其攸關到的是一個國家願意付出多少成本去捍衛或是擴張其價值，而在體系層次部分，則端視維持現狀以及修正主義國家的相對強度而決定。因此，單元層次的國家利益算計，大致上可以簡約成為一個公式，即國家利益等於修正現狀的價值減去維持現狀的價值，不同的算計結果就必須作出不同的戰略選擇。¹²²利益平衡理論在體系層次的論述上強調，單純的能力配置並無法決定體系的穩定與否，體系的穩定與否全賴於修正主義國家以及保守派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平衡與否。從單元層次以及體系層次為理論論述主軸的優點在於，將焦點擺在國家行為者的不同偏好的變數上進行探討，由於不同的偏好而會有不同的平衡以及扈從策略出現，以完善傳統權力平衡以及威脅平衡論不完善之處。

參、階層制扈從

根據利益平衡論的邏輯，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國家選擇扈從或是平衡的戰略行為其最根本的考慮因素在於成本利益上的算計，國家可以透過算計獲利的高低程度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平衡或是扈從戰略。但是，David Lake 以權威的角度切入，認為即便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階層制(Hierarchy)的體系¹²³才是國家行為者之間在體系實踐上選擇最多的運作方式，形成一種具有權威

(3) 未來趨向的扈從：當國家相信某些價值、利益代表著未來的趨向時，國家行為者可能會扈從較為強大的一方，因為他們相信透過這樣的扈從行為能夠從中獲利。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型的扈從形式通常是由一些魅力領袖的意識型態或是其他外在力量所激勵產生。

(4) 骨牌效應：來自於特定的外在勢力可能造成連鎖反應的影響，國家行為者為了支持或是反對這種連鎖反應而組成新的扈從團體。同註 116，頁 92-99。

¹²² 同註 116，頁 99-100。

¹²³ 例如帝國、保護國、國家勢力範圍、依賴他國以及其他型式的主權國家支配另一主權國家的行為，都稱為無政府狀態之下的階層制。

高低位階差異的權力行使態勢，這邊凸顯出國際政治中權威因素的重要性。權威即國家命令或指揮其他國家做其不願意做的事情且此國家會遵守則產生權力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接受權力支配的臣屬國之行為是基於義務而不是強制力。權威也得以定義為是正當地支配，權威必須與強制力作區分，強制力沒有義務上的約束，只不過是因為有共同利益才需要去遵守。權威與強制力符合 Waltz 結構理論中第一種與第三種概念。單元與單元之間的相互存在之關係，而出現秩序的原則，Lake 認為這可能是無政府也可能是階層制，雖然能力能夠創造出強制力大小的區別，儘管如此，權威與強制力還是存在密切的相關性，而強制力就是構成權威的必要條件。在國際政治中，Lake 認為國家行為者所依靠的是強制力而非權威的行使，國家行為者彼此之間的關係可能如同帝國主義的互動行為，每個國家都想要支配其他國家。¹²⁴ 國家行為者的權威來源是基於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議價過程產生之關係性權威(Relational authority)，被統治者同意將維持社會秩序的權力交給統治者，使其有權威來鞏固整個社會秩序的維繫，在此，權威是一種契約關係，而權威以及強制的正當性便是來自於被治者對於企圖維持社會秩序以獲得利益之追求。從關係性的權威中可以進而延伸到國際階層制的存立根據。¹²⁵

在國際政治中，支配國運用些許有限的權威以制約臣屬國，即便國家主權是不可分割的，但實踐上可以發現，因為國家所擁有的權威大小的不同，就有著不同的涵義。國際階層制的面向包含兩個方面，其中之一為經濟階層面向，其臣屬程度由高至低可以是依賴、經濟特區到最低程度的市場交易；其次為安全階層面

¹²⁴ David A. Lake, 2007,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pp. 50-53.

¹²⁵ 同註 124，頁 54-56。

向，一樣由程度高至低可以分為保護國關係、勢力範圍以及到最低層次的外交政策。¹²⁶簡言之，階層制是支配國提供社會秩序而臣屬國服從與確保支配國之正當性，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互相交換的型式。Lake 提供了額外的系統性分析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之下的互動模式，從權威的觀點為起點分析國家行為者選擇扈從而非平衡的主要原因。階層制的扈從在國際實踐上相當頻繁，例如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霸權主權關係、冷戰時期，蘇聯對於中東歐國家的支配與從屬關係、波斯灣戰爭中，美國領導沙烏地阿拉伯國家、或是科索沃獨立的問題反映出扈從的出現，是國家行為者在面臨緊急狀況時的一種政策選項，從上述案例得知，扈從可能是相當值得關注的現狀事實。¹²⁷

階層制扈從有些假設標準更是與現實主義相同。主權國家是主要的分析單元，此種體系是無政府狀態中的其中之一，在此範圍裡使用武力是可能的。強權的實力展現以及聲望地位是由權力與地理位置來決定，在階層制中，相對的地位概念是重要的。在體系中如有一中央集權國、許多較弱勢的國家與邊陲國家在內，國家之間因為法律、契約以及言語通常被視為是不具約束力效力的，也因此，在國際體系中的不信任程度是相當高的，國家最優先的考量是生存，當威脅以及不穩定被接受為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事實時，因而主權國家所考慮的是權力與生存的優先。

¹²⁶ 經濟階層的兩項指標包括：

- (1) 國家貨幣政策的自主權。
- (2) 國家在單一政策上調整自己的貨幣匯率的能力。

安全階層的兩項指標如下列：

- (1) 支配國的軍事力量之發展。
- (2) 支配國所能夠獨立掌握的聯盟數量。同註 124，頁 57-69。

¹²⁷ David A. Lake, 2003,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3, pp. 316-320.

由上述得之，階層制並不是與無政府狀態迥然不同的，而是「平等」這個概念在階層制中是沒有的，平等以及階層制可以在廣泛的無政府狀態下共存，而在這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之間在世界舞台中互動是不可能會有平等狀況出現，在現實之中，中央強權依然能夠在無政府之下操作其理想的政策，並且沒有致使其他國家去平衡它。其關鍵原因是所有國家都知道中央強權並沒有領土上或傲慢的野心，且這種階層制的情勢可以出現一種解決衝突的方法，即所有中央強權以外的國家都會發現順從支配國反而可以得到一種平等，且這些附屬國家可以認知到順從所得到的利益會比對抗中央強權所要付出的成本還要多，因此，扈從的階層制策略便會出現。¹²⁸

國際關係研究者試圖在體系層次或是單元層次給予結構現實主義典範做出不同的修正或是截長補短的工作，這些努力依舊是以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為根基所推導出來的邏輯，抑或是納入國家實踐過程中的外部影響因素而賦予原先就相當簡約的結構現實主義更多長成的養分。即便各方論述所採用的變數不同，但從中也許可以歸納出些許相似處，第一，三方理論對於國際政治的基本假定依舊是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結構的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在不同的議題上選擇抗衡威脅來源、利益上的平衡以及扈從的戰略；第二，三方理論所討論的議題均是當主權國家面臨傳統安全問題時的權宜之計，第三，將國家動機或意圖納入理論的考量範疇之內，如表 3-1 所示：

¹²⁸ David Kang, 2003,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65-169.

表 3-1：權力平衡理論的修正歸納

修正的內容 相關理論	對於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	理論所涉及的安全議題	納入國家動機的重要變因	主要目的與戰略選擇
威脅平衡論	無政府狀態	國家、軍事安全	有	抗衡不平衡的威脅，以達到安全的目的
利益平衡論	無政府狀態	國家、軍事安全	有	在安全的前提之下，透過成本的算計獲取最大獲益的平衡
階層制扈從	在無政府環境之下存在階層制的體系	以國家安全為優先考量	有	國家選擇扈從策略，其目的在達成體系的穩定與安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雖然威脅平衡論、利益平衡論以及階層至扈從理論觀點反映了某些歷史進程的決定論觀點，並不代表展現了現實主義思想的相對性與實用性。¹²⁹尤其在新興安全議題，例如人類安全議題的提倡，國家所面承受的威脅來源、利益考量趨向或是國家動機意圖，可能會因為議題的不同而不同，國家必然會行使有別於上述理論邏輯的平衡或扈從戰略之選擇。但是威脅平衡論點出威脅來

¹²⁹ 秦亞青譯，E. H. Carr 著，2005，《20年危機（1919-1930）：國際關係研究導論》。北京：世界知識，頁 65。

源的重要性，至於利益平衡論則是告知國家利益的再思考是必要的。

Kenneth Waltz 自己也承認當今的世界已經發生改變，體系的權力互動的互賴關係程度越來越高，在複合式的互賴環境中，經濟議題強化了國家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愈趨於強大，限縮了政治的權力空間，進一步限制了國家可能使用戰爭行動的動機。¹³⁰ 在國家之間平衡的體系中，越緊密的互賴體系，國家代理者的角色就更為重要。現今的國際政治產生的情況是一種不自然的現象，與過去主要的國際政治的差異在於，當今的世界並不是國家的互賴增加所導致的延伸問題，而是國家體系之間運作生長不完全的原因，但是政治力量依然是凌駕於經濟之上。應該要有其他的國家起來平衡由美國領導的單極體系所創造的全球化的世界，這個體系才會走向正常與自然。¹³¹

回顧 Waltz 的權力平衡論述，的確世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腳步逐漸轉變，但是權力平衡還是一個常態循環的現象。¹³² 因此體系在經過轉變之後，國際新興議題的升溫，國家之間還是必須擔心本身的安全問題為主，即便是有崛起的次級強權欲挑戰體系領導的地位，卻沒有任何一國得以利用軍事的手段去達到預期的政治或經濟目的，¹³³ 冷戰後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系並非無其他行為

¹³⁰ Robert O. Keohane, 2001,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1, pp. 1-13.

¹³¹ Kenneth N. Waltz, 1999,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2, No.4, pp. 695-700.

¹³² 下列四點為國際體系結構本身依然沒有改變的要件：

- (1) 國家之間的關係也許發生了改變，但是基本的國際政治結構依然是無政府狀態的。
- (2) 相對利益依舊會優先於絕對利益。
- (3) 儘管經濟上的強盛與軍事力量是可以相互連結的，但是並非表示兩者之間相互等同。
- (4) 國際體系還是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請參照 Kenneth N. Waltz, 1993,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pp. 59-60.

¹³³ 同註 132，頁 76。

者予以抗衡，而是平衡的方式不是傳統的硬性平衡，¹³⁴可能是由其他戰略所取而代之。冷戰結束之後體系環境改變，國家採用過去權力平衡(硬性權力平衡)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太高，即使如此，權力平衡理論不斷的進行修正以試圖解釋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政治問題，承如上述，傳統權力平衡、威脅平衡論、利益平衡論以及階層制扈從理論的相對性及實用性依舊無法說明實際情況，這個實際情況指軍事手段不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或是唯一的選項，更不是什麼最好的手段。但是這並不意味威脅平衡論、利益平衡論或是階層制扈從已是落伍的理論，或是一個已經逐漸成為歷史的論述。只要無政府狀態持續存立，國家在結構中互相發生關係，沒有一個中央機構有能力管控這種情況，各國家行為者只有不斷的考慮威脅的成份、利益以及選擇扈從的原因，國家參與在整個權力平衡體系中，最多只是對這些權力平衡理論的作用方式提出不斷的修正而已。因此，國家可以選擇其他戰略以面對新挑戰的理由便浮出抬面，無疑，軟性平衡不是基於立場而是基於邏輯上的理由，國家採納軟性平衡的主要原因就有其立基點。

¹³⁴ 例如在區域層次上的複合平衡 (Regional Complex Balancing)，複合的平衡指，一種在區域層次上的構想，將多重的行為者納入一個重疊的領域內，且透過制度化來管理行為者之間的競爭(即在一個有限的規範與制度之內)。請參照 Evelyn Goh, 2007,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y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pp. 139-148.

第二節 軟性平衡概述

壹、概念與名詞的界定

權力平衡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性頗為顯著，但是仔細推敲的結果卻發現其概念的含糊不定且用法不一，Hans Morgenthau 所認為的權力平衡之意涵就包括四種之多，第一，權力平衡是作為達成一種狀況的政策；第二，權力平衡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情勢；第三，權力平衡是幾乎均等的權力分配狀況；最後，權力平衡可以是權力分配的任何狀態。¹³⁵Inis Claude, Jr.說明權力平衡這一概念的本質與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管制問題有相互關聯，若以此為核心思維，則權力平衡可以具有下列這些含義，首先，權力平衡是一種情勢，為權力分配之現狀，指權力完全由相等的權力所平衡的情勢；次之，權力平衡可以是一種政策，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一種政策，或是足以影響國家之間政策的一種原則；再次，權力平衡也可以是一種制度，這類制度意指國際政治的其中一種體系。¹³⁶

即便概念的模糊不清，但權力平衡亦可歸納如下所述，權力平衡指透過內在的動員或同盟的組織以創建或聚合軍事上的力量以防範或阻止他國以外在權力或軍事聯盟施行領土上的佔領或任何政治上與軍事上的支配，其也許是一種朝向阻止任何可能具有威脅的行為者的策略，或是防止(削弱其地位)任何霸權力量的出現，最終目的在於防止崛起中的強權進行稱霸的行為，假使或每當權力平衡的作為成功，則權力平衡便得以被認為是存立的，由於權力平衡的最終目的是以平衡戰略去阻擋或減輕強權國的能力

¹³⁵ 張保民譯，Inis L. Claude Jr. 著，1976，《權力與國際關係》。台北：幼獅文化。頁 18-30。

¹³⁶ 同上註，頁 7-17。

力，故權力平衡就具有廣泛的戰略運用空間，例如傳統的硬性平衡與軟性平衡的區隔。¹³⁷本論文首先將權力平衡概念視為是一種政策原則的採用，主要用意不外乎政策原則相較於其他意涵相對上來的容易被了解且熟知，並且使用權力平衡的目的在於達到國際秩序某種程度上一種穩定的情勢，故本論文所使用的軟性平衡概念可以是一項戰略政策原則，透過軟性平衡的政策「調整過程」使得國際秩序得到更為平衡的情勢。

在名詞的選定上，本論文選擇「軟性平衡」作為主要專有名詞定義之，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本論文所提及的軟性平衡的權力概念，依然是處理體系內的權力配置問題，而非歐盟研究本身所慣用的「柔性權力」(Civilian power)手段。¹³⁸此外，透過文獻的耙梳發現國內研究相關議題的研究者對軟性平衡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名詞界定，例如「柔性平衡」，¹³⁹「軟制衡」等，¹⁴⁰不使用柔性平衡的原因，在於易於將其具有規範性內涵的柔性權力混淆，產生研究困擾，至於軟制衡的部份，制衡，本身較常使用於政治學上的概念，尤其指國家內部體系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是一種根據國家憲法基礎由上而下制定的不可侵犯的最高內部遊戲規則，與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所產生「平行」體系互動仍然具有差異。故本文由權力本身以及用詞界定雙方的考量之下，選擇使用軟性平衡一詞，並基此作為以下軟性平衡定義的基本範疇。

¹³⁷ Daniel H. Nexon, 2009,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61, No.2, pp. 340-341.

¹³⁸ 柔性權力指透過柔性或是政治上的途徑增加與目標國潛在利益的互賴，且以準軍事的力量解決衝突。請參見 Ian Manners, 2005, "The European as a Normative Power in Global Policy," at <http://www.psa.ac.uk/2005/pps/Manners.pdf>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1, pp. 3-5.

¹³⁹ 例如甘逸驊，2008，〈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2期，頁1-19。

¹⁴⁰ 例如陳文生，2009，〈Waltz 制衡假設之檢視：以波斯灣三次衝突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40期，頁43-80。

貳、軟性平衡的定義

軟性平衡的核心假設源自於 Kenneth Waltz 的結構觀點，即結構的無政府狀態，促使生存成為國家行為者自助永續追求的目標，因為體系內單元之間的相似性，權力分配便為主要導向，因而權力之間的配置會達到一個平衡點。然而，當國家行為者在面對新興安全議題進行操作權力平衡政策時，本論文認為國家行為者並不會以傳統硬性權力平衡的方式去抗衡，不論是以單獨國家行動或是以組成軍事聯盟的方式，因為次級強權所要付出的軍事或經濟上的成本利益太大。反而，次級強權國家之間會協同出一套安全認知以非軍事性的聯盟或外交工具去拖延(Delay)、阻止(Frustrate)或是以削弱(Undermine)的方式抗衡，¹⁴¹並且從中進行調適，通常軟性平衡是以有限的軍事建立措施、特有的合作作為或是透過國際制度等區域內的協作來進行平衡。¹⁴²

在固有的權力平衡的體系中，國家必須關注三種安全上的問題，第一，來自其他強權國家直接攻擊的威脅；次之，來自間接傷害的威脅，例如來自國際體系之行為者在削弱其他國家安全地位過程中之軍事行動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第三，某一國家行為者將成為世界霸權的情勢出現，因為這種建立霸權之過程可能造成許多危害行為，如改寫國際條約以有利於成為霸權的行為者之利益等。¹⁴³面對上述這些安全問題，國家行為者可能會傾向選擇權力平衡的戰略，以權力平衡戰略成為外交政策的可能選項，也許如此，但這種權力平衡戰略可能並不是根據傳統權力平衡體系的

¹⁴¹ Robert A. Pape,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 10.

¹⁴² T. V. Paul, 2004,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ael Fortmann, e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

¹⁴³ 同註 141，頁 13。

規則來進行操作。因為在冷戰結束時期，有下列三個主要原因使得次級強權不會畏懼來自於霸權的直接征服的威脅，首先是次級強權本身擁有核子武器，能確保霸權不會直接的威脅到次級強權這麼一個獨立行為者的存在，因為次級強權的安全已有某種程度上的保障；第二，強權本身無法直接的干涉或支持次級強權(這裡例如歐盟、中國、印度或俄羅斯等)國家內部分離主義活動，這確立了強權不會去挑戰次級強權領土完整的一個認知；最後，所有主要強權，包括美國在內，在製造永久佔領其他國家領土的干預策略上，採納煽動強大的民族主義或民族團體的不對稱戰略是不會被成全的。¹⁴⁴

當單極強權還沒準備成為霸權國家之際，其他次級強權可以事先綁在一塊以抗衡現今支配體系的強權國，這最主要的問題不是在這些國家能形成集體的強大力量，而是這種集體行動可以解決因集體行動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一起完成可能的抗衡聯盟的建立，因為在多極的體系中，推諉卸責(Buck-passing)的行為是主要的阻礙抗衡聯盟成立的原因。在單極體系中，國家行為者會相互平衡以對抗威脅來源，這種抗衡程度的高或低，必須依照來自修正現狀國家(Revisionist state)的權力大小以及其侵略的意圖而定，單極領導者也會反抗抗衡聯盟的成立，換言之，次級強權可能無法在使用傳統權力平衡的方式來解決集體行動中內部與外部所面臨的問題，以降低任何使用硬性平衡造成國家利益損失的可能，故轉向以軟性平衡的方式是有其可能性存在的。

因此，軟性平衡行為在下列幾項情況發生之時機會出現，其一，當單極強權的權力地位與軍事實力正在增長，但尚未成熟到

¹⁴⁴ T. V. Paul.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56.

可以嚴重的挑戰次級強權的主權；其二，單極強權是主要公共財的來源，特別是在經濟與安全的領域內，這種來源不會輕易的被取代，因而次級強權選擇不直接斬斷公共財的資源；以及其三，當次級強權或是其他國家行為者的平衡作為是公開的，抑或是其他國家行為者並不是透過軍事手段直接挑戰單極強權的權力地位，則單極強權國便無法輕易藉口採取軍事的報復手段。¹⁴⁵

軟性平衡的方法並不是直接地挑戰到單極領導者的軍事等現狀支配能力，而是利用拖延、複雜化議題或是提高領導者之額外的成本代價等權宜之計，透過國際制度、經濟手段或直接宣布中立地位等方式來抗衡，但我們不能事先設定排除軟性平衡最後可能在允許範圍之內，會使抗衡者發展偏向成為更具壓迫力的平衡策略，也許是以傳統的權力平衡來處裡，假使單極強權繼續往侵略性之政策發展的意圖。¹⁴⁶

本論文欲將歐盟軟性平衡的對象設定為美國，主要理由在於美國於冷戰結束後的權力運作模式符合上述之情況。美國於冷戰結束之後是國際體系內最接近單極且最具有單極實力的國家，世界趨向全球化的感染主要是根基於以美國為主導的多國合作所驅動，使得跨國恐怖主義的挑戰不僅止於對於美國造成威脅，恐怖主義也成為其他國家的共同敵人，由於美國提供了一般性安全以及經濟上誘因的保護，加上各國累積之經濟財富難以快速的轉移為建造軍事力量的基礎，因而使得其他國家容易產生推諉卸責以及搭便車(Free-riding)的國家偏好或價值。¹⁴⁷以上這些情勢特點均貼近在冷戰結束現實主義理論討論中權力平衡體系內國家所需要

¹⁴⁵ 同註 144，頁 59。

¹⁴⁶ 同註 141，頁 13-18。

¹⁴⁷ 同註 142，頁 16。

關注之安全問題以及採用軟性平衡的時機，皆足以使次級強權尤其是歐洲或亞洲地區之行為者針對美國採以軟性平衡的戰略。

第三節 軟性平衡戰略與實踐評估

壹、軟性平衡戰略

硬性平衡著重於權力分配的問題，權力分配的差距促使次級強權企圖去組成抗衡聯盟以使聯盟具有足夠相對權力得以驅使掌握體系權力支配的國家回到一個對等的地位，並且不考慮所採用的任何軍事戰略手段為何。相較之下，軟性平衡亦考量到權力配置的問題，只是軟性平衡的行為訴求抗衡削弱特定的單極強權之外交政策或威脅來源而非針對單極強權整體的權力配置予以挑戰，軟性平衡雖接受當下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狀態，但是次級強權的目的卻清楚的表明必須要在此狀態下組織抗衡聯盟以阻擾或妨礙的戰略獲得更好的預期結果，因此軟性平衡亦即為一項國家之間自覺合作的外交行動，其目的在訴求一個更優越的結果以對抗單極強權的偏好，但前提條件是除非能得到雙邊或多邊上的支持，否則優越的結果便無法順利達成，假如不如此作為，則軟性平衡就不具有限制單極強權的能力。¹⁴⁸

傳統的硬性平衡是企圖去尋求改變真實上的或是潛在的強權威脅的軍事平衡形式，透過提供軍事力量給較弱的一方，例如可能有軍事科技提升或轉變同盟性質的建立戰略等。探討軟性平衡的平衡邏輯之後，軟性平衡的不同於傳統權力平衡的平衡更具有多樣化戰略選擇空間，茲如下列五點所示：

¹⁴⁸ Stephen M. Walt, 2009,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pp. 103-104.

一、 拒絕領土的授予(territorial denial)：

單極強權國通常會透過第三國等，借用其國家領土以順道進行地面攻擊或進駐他國之海、空軍基地，以減少強權自我戰爭的成本支出，拒絕領土的給予可以使強權國之成本提高，例如提高強權之後勤補給的問題等。¹⁴⁹

二、 糾纏外交(Entangling diplomacy)：

即便是再強大的國家，也沒有完全的確保可以免除來自國際組織在相關程序上或是外交實踐上來自於其他國家實質的幫助，因此，國家也許可以利用國際制度或是直接的外交行為以拖延強權國之戰爭計畫，進而使強權國之行動受限而給予較弱的一方更多的時間去準備抗衡，拖延，也可以製造複雜化的議題與反對意見。尤其強權國若是民主國家的話，實質的外交行動不僅會影響到軍事實力的平衡以限縮衝突的爆發，且也能強化與累積國家內部對於反抗強權作為的輿論。¹⁵⁰

三、 經濟的強化(Economic strengthening)：

在長期的抗衡過程中，次級強權可以建立區域貿易聯盟，增加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以及經濟成長，而不與非成員國來往，並且將強權國予以排除在外，強權國在無法透過經濟層面施壓時可能會考慮改變其政策目標，增加其政策決策過程的時間成本。¹⁵¹

¹⁴⁹ 同註 141，頁 36。

¹⁵⁰ 同註 141，頁 36。

¹⁵¹ 同註 141，頁 37。

四、 釋放予以平衡的訊息(Signals of resolve to balance)：

次級強權尋求集體行動以抗衡主要強權，可以透過發出決意去平衡強權的訊息，一來可以使次級強權聯盟之集體信任感提升，也可以表達對強權行動的不滿，而進一步強化其抗衡之對應措施的基礎。¹⁵²此戰略的成功不只是藉由限制強權的程度的衡量而得知，其次，這種平衡訊息更主要是能夠納入更多的國家加入軟性平衡的戰略聯盟以對抗單極領導者。

五、 區域途徑的強化(Regional approach strengthening)：

當共同的外部威脅存在時，¹⁵³單一主權國家獨自面對來自外部的威脅時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代價過高，一個需要共同承擔的外部安全威脅就會促使不同國家之間因為議題的結合而集結綁在一塊形成區域複合體，¹⁵⁴例如歐盟透過區域安全複合體的組合以對抗外部安全威脅，是歐盟區域整合的重要目標之一，歐盟透過全球議題連結與擴散，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結合起來以多樣的途徑或政策措施因應來自單極強權所造成的安全外部威脅。¹⁵⁵

上述五項軟性平衡的戰略作為國家行為者調適過程的主要選項，經由選擇軟性平衡戰略，以調適本身與單極強權所帶來的區

¹⁵² 同註 141，頁 37-38。

¹⁵³ 由於來自主權國家或區域的一種共同外部安全威脅，會導致安全外部化（security externalities）的擴散，這類安全外部化能夠跨越主權國家之間的疆界限制，甚至是區域之間的隔閡，進而連結不同的主權國家或區域形成一種區域的集體力量，其目的不外乎為共同對抗外部安全威脅。

¹⁵⁴ Robert E. Kelly, 2007,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Regionalism' ,"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2, pp. 208-209.

¹⁵⁵ 楊三億、林佑勳，2010，〈歐盟人類安全議程與軟平衡之實踐〉，《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通訊》，第 30 期，頁 20-21。

域支配能力的壓力，以達到權力平衡的態勢進而穩定國際體系的秩序，甚至可以發揮體系內與其他國家合作之更大作用。

貳、軟性平衡之評估

針對軟性平衡的理論論述 Keir Lieber 與 Gerard Alexander 認為，當今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國家行為者之間沒有出現權力平衡的相互抗衡，反而是來自強權國家與非國家組織(Non-state group)之間的權力配置衝突會被推回至傳統的權力平衡策略中，軟性平衡所支持的證據只是常規的世界政治運作當中一項外交的摩擦而已，國際體系依舊是傳統的權力平衡體系。¹⁵⁶ Stephen Brooks 以及 William Wohlforth 則認為，國際體系根本不會有軟性平衡的出現的情況，並沒有充分的且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明冷戰結束之後的國際體系有出現軟性平衡的行為，軟性平衡只是擷取過去多極或雙極國際政治運作的經驗加以分析，況且軟性平衡甚至偏離了結構現實主義以生存為目的的論述，軟性平衡在邏輯上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一個現狀平衡的結果而已。¹⁵⁷ 在單極體系之下並沒有改變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本質，因此國家恐懼失去相對權力上的優勢以及追求安全的慾望就不會改變，反而必須將安全區分為物質上的生存與國家政治自主性兩個面相，依此，在單極體系下國家對外戰略選擇所考慮的是經濟利益、區域安全、國家之間的政策爭議以及國內內部壓力的要素。¹⁵⁸ Evelyn Goh 甚至直接了斷說明唯有透過多樣化、正規化以及制度化的「複合平衡」，才有可能有效的解釋國際體系的轉變。¹⁵⁹ Nadav Kedem 強

¹⁵⁶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 139.

¹⁵⁷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5,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p. 106-108.

¹⁵⁸ 同上註，頁 79-82。

¹⁵⁹ 同註 134，頁 132。

調除非單極強權與次級強權之間達到某種層面上的社會制度 (Social institution) 或是規範 (Norm) 之間的對等平衡，軟性平衡才會是一項適當的策略，¹⁶⁰ 規範的存在，才可以作為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部份方案，規範同時也促使議題之間的連結，因而得以建立一個具有權力、低成本以及低風險的權宜之計以限制修正主義強權對於現狀挑戰的能力。¹⁶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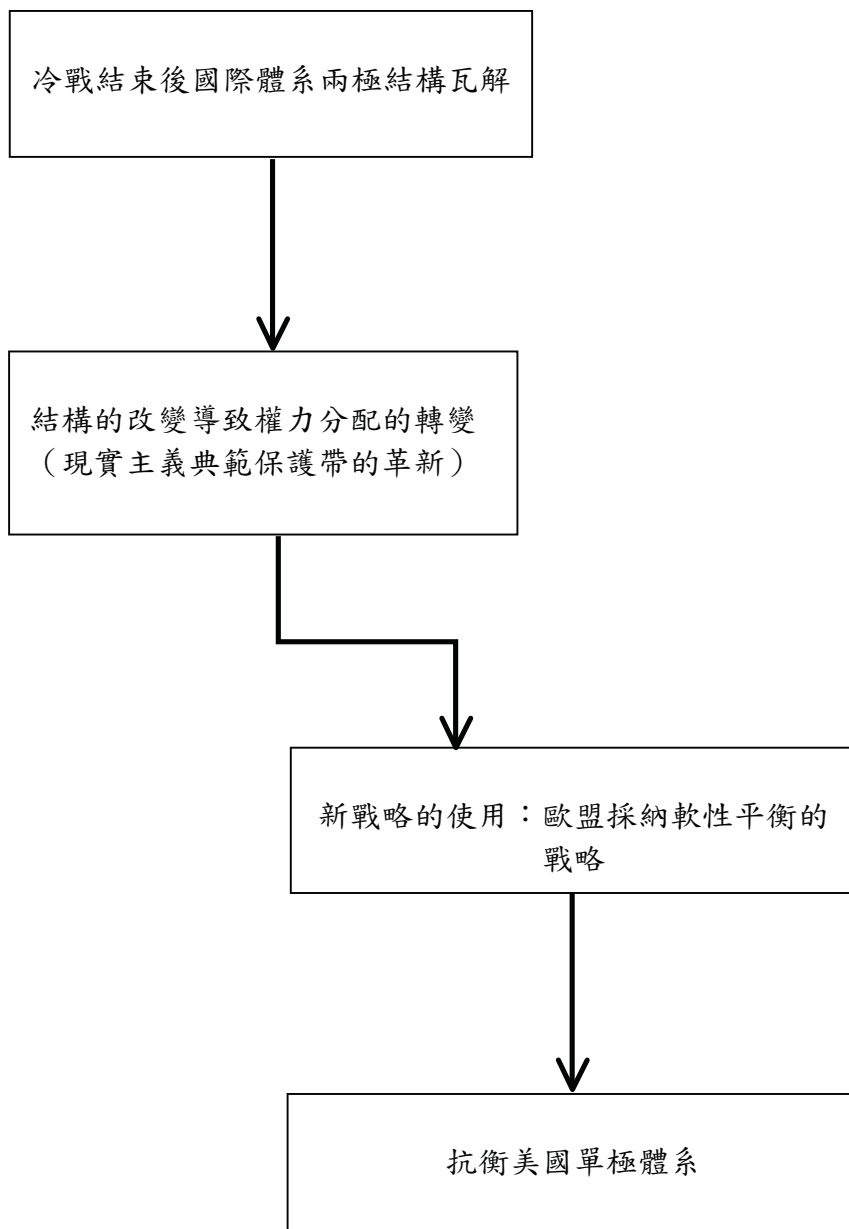
縱上所述，根據 Robert Pape 以及 T.V. Paul 解釋，軟性平衡是藉由不同的拖延、阻礙、削弱等手段回應威脅的一種戰略，既然是作為手段就會有一個預期達成的目的，但就理論層面上軟性平衡被認為是偏離了結構現實主義以國家永續生存為目的的論述，反而軟性平衡所追求的是一個維持現狀平衡的國際秩序而已，換句話說，軟性平衡本身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落差。然而無論如何，Kai He 與 Huiyun Feng 針對此落差批評提出反駁，其反對將戰略與戰術於以混為一談，戰略是長期的政策目標相對於戰術關注於短期的目的達成，經濟利益、區域安全、政策爭議以及國內壓力只是達成軟性平衡的戰術而非最終戰略。此外國際體系的真實現象確實反映出沒有傳統硬性平衡，取而代之的是相關軟性平衡的抗衡行為出現，即使軟性平衡不一定總是成功的實踐，但並不代表要全盤否認國家施行軟性平衡的作為。¹⁶² 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一度成為權力分配不均的場域，在全球化以及民主化浪潮推波助瀾之下，本論文試圖將安全因素的變數納入討論，傳統安全觀念的改變刺激了國家對於彼此相對權力的認知轉變，次級強權國家寄望能藉由軟性平衡的戰略以維繫國際秩序的

¹⁶⁰ Nadav Kedem, "Soft Balancing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Systems,"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09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ebruary 15-19, New York: NY, pp. 1-5.

¹⁶¹ Nadav Kedem, "Soft Balancing After 'After Victory': A Two Tier Approach,"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10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ebruary 17-20, New Orleans, USA, pp. 1-43.

¹⁶² Kai He and Huiyun Feng, 2008,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17, pp. 365-370.

現狀平衡，最終完成長期且具有價值的安全目的以限制單極強權的能力而加入更多自我的偏好。歐盟改採由軟性平衡的論述簡圖如圖 3-1 所示：



→ 表示具有直接的相互關聯性

圖 3-1：軟性平衡戰略實踐過程分析圖 A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起先單就於理論層次上及實踐上探討為何冷戰結束後權力平衡體系會產生不平衡的幾項原因，與透過權力平衡理論如何進行多樣的典範修正工作探討之，提出威脅平衡論、利益平衡論以及階層制扈從便是針對冷戰後 Kenneth Waltz 的權力平衡體系進行再思考。

即便如此，現實主義所涉及的安全因素之範疇因為客觀環境改變逐漸從單一面向的軍事安全走向多樣化的安全議題面向發展，導致依然著重傳統國家安全的威脅平衡論、利益平衡論與階層制扈從理論出現相對性及實用性不足的變化，畢竟全球化的環境使得軍事手段不再是最佳解決問題的方式，採取傳統硬性平衡或扈從所要付出的代價便相對增高，因此選擇採納軟性平衡的戰略考量以面對來自體系新興挑戰的理由便浮出抬面。

本論文強調軟性平衡理論在考量冷戰結束後權力平衡體系內的安全上的問題，以及次級強權本身的體系定位後，再加上單極強權的特質配合，次級強權國之間便會協同出一套安全處理認知以非軍事性的聯盟或外交工具去拖延、阻止抑或以削弱的方式抗衡單極強權，並從抗衡過程中進行有效的戰略調整。有鑑於此，本論文於第四章將安全的變因納入探討，以求進一步達成新興安全困境與軟性平衡之間的雙向連結互動之相容性目的。

第四章 安全觀的演進

傳統上對於研究國際關係安全觀的探討一直以來都是與現實主義理論架構有其密切關聯，並且以現實主義為其主要研究途徑。國際政治於 1648 年之後建立了以主權國家為主要要角的體系，現實主義便強調國家於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作為，促使主權國家必須相互設定以達到生存為前提的條件，但是因礙於安全困境的客觀環境限制，國家欲確保安全並且獲得生存的機會因而必須要提升本身物質權力的基礎，基於此，透過軍事力量的提升成為主權國家之間互相衡量彼此相對實力最明確的保障，透過理論上的分析，權力平衡便是主權國家主要的戰略選項，藉由建立軍事同盟、嚇阻戰略、提升本國軍備等方式以對抗外來威脅並捍衛主權及維繫整體領土之完整。兩次世界大戰迄至美蘇冷戰時期，軍事安全的重要性達到最高峰，直至冷戰結束後，全球化與民主化浪潮的推波助瀾使得傳統國家軍事安全的地位相對下降，相對傳統軍事安全而生的是國際非軍事安全議題逐漸被突顯，¹⁶³包括經濟方面、生態環境或是國家內部等多面向的安全威脅必須被納入維繫國家生存的考慮，面對這些安全威脅時回顧現實主義對於安全內涵的強調，現實主義無法有效體現一個新的現實情況的出現，畢竟，所謂安全觀的演進從國家安全到國際安全甚至發展全球化變革的影響，使的每個階段都應該有不同的理論與政治前題為基礎來予以檢視，並且與國際體系的歷史演進密切的連結關係。¹⁶⁴在上述條件環境下，本論文將非傳統安全的人類安全作為焦點強調之，在軍事安全問題相對於降低的情勢中，人類安全的

¹⁶³ 蔡育岱、譚偉恩，2008，〈雙胞胎或連體嬰：論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之關連性〉，《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頁 105。

¹⁶⁴ Helga Haftendorn, 1991,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1, pp. 5-16.

重要性相對被重視，但有別於處理傳統軍事安全採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途徑，人類安全的跨國性、行為主體不確定性、多重領域之複雜性特徵使得在處理人類安全議題時必須採納有別於傳統權力平衡的途徑予以進行，本論文採納軟性平衡的途徑假定，以相對而非絕對的角度並且不排斥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共同存在的前提情況下，進行檢定由傳統安全演進至非傳統安全之確保安全處理手段之區隔，使得理論更能貼近於現實。此章的目的有二，首先為陳述傳統安全觀的歷史演進脈絡；其二以突顯人類安全重要性浮現為主要討論，並以此二目的建構作為聯繫軟性平衡新戰略使用的論述橋樑。

第一節 傳統安全觀之更迭

壹、安全觀的歷史發展

如果一開始難以將安全這個概念予以具體化或明確的表明，那麼也許可以先行採用回顧歷史上對於安全研究的方法來體現以國家為主體的對象在面臨安全問題時的發展，進而表現更清晰且明確的掌握現實安全問題，安全的歷史脈絡得以簡略茲如以下主要五個階段，首先在兩次大戰期間，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並相信民主、國際認知、仲裁、民族自決、裁軍以及集體安全裁示最首要解決達到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途徑，並推崇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制裁力而非軍事武力的訴求；至 1950 年代，雖然國家安全在廣泛的國際關係架構與外交政策下進行處理，但不表示國家安全被低估，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之下，國家安全的問題持續扮演公共與政府利益的核心角色，只是此時的安全具有下列特色，第一，安全不再被視為是國家在任何時期的主要目標，經濟利益、經濟穩定與個人自由取代安全的價值。第二，國家安全被定位為得以使用軍事或非軍事權宜之計所能達成的目標。第三，安全困境依然使國家彼此強調追求一個保守且相互尊重的軍事政策。第四，致力於國家安全與國內事務之間，例如經濟、公民自由、民主政治程序的問題；1955 至 1965 年代為國家安全研究的黃金時期，此時期的國家安全被核子武器、武器管制以及有限戰爭議題所支配，其所關切的核心問題在於國家如何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成為權宜政策工具，此時以嚇阻戰略的研究最為普遍；迄至 1965 至 1975 國家安全概念逐漸式微，因為安全研究被美蘇關係的研究所佔據，安全研究趨向於政策面向的實踐研究，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核子戰略問題，戰爭議題更開始著重合法性、道德以及其他

戰爭的層面，取而代之的是和平研究與對於和平的討論；直至1980年代，國家安全研究被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所取代，冷戰將國家行為的層次拉抬至國際體系，使得安全研究實質上關切的焦點轉為東西關係、美國與西歐國家的體系安全問題；¹⁶⁵至於現階段冷戰結束後的時代，David Baldwin 便贊同應該將關切焦點擺在更多來自非軍事安全上的威脅問題，例如國家貧窮、教育危機、工業競爭能力、毒品交易、組織犯罪、國際移民、環境風險、資源匱乏、全球貧困等問題，於當今資源相對匱乏的時代，軍事武力的目標總是與其他例如經濟利益、環境保護或社會福利等目標相互衝突，因此，必須重新思考國家安全的概念。¹⁶⁶

相較於兩次世界大戰時期或是冷戰期間，國際關係主權國家對於安全的訴求可能主要服膺於目的性的軍事政策，例如軍備競賽、軍事結盟、嚇阻戰略、國家之間所進行的是零和的競爭。冷戰的結束，逐漸推翻了傳統以軍事安全為中心的基本假設，促使國際關係的研究重新思考安全概念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聯程度。冷戰結束後對於安全有三項顯著的改變趨勢，其一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軍事權力相對開始下降；其二是必須重新檢視對於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的概念；其三，國家安全的觀點應該要予以擴展，包括將國內問題以及非軍事外部威脅等危及國家安全的因素納入考慮。¹⁶⁷安全研究的範圍以及行為主體應該加以擴大且深化。¹⁶⁸

¹⁶⁵ David A. Baldwin, 1995,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48, pp. 119-126.

¹⁶⁶ 同上註，頁 127-141。

¹⁶⁷ 同註 165，頁 117-118。

¹⁶⁸ 陳牧民，2009，《國家安全理論：權利、主權與威脅》。台北：五南，頁 17。

例如多元領域之間的相互連結成長、去領土化的權威來源以及國家自主性的衰弱都是冷戰結束國際體系的發展現狀，¹⁶⁹強權國家介入發展中國家的能力被限縮，全球範圍內的區域自主性(Autonomy)逐漸增加，因此也開啟了一個更多區域秩序合作的可能性，¹⁷⁰區域的安全概念被強調出來，區域之間的安全外部威脅，得以透過區域合作以減緩威脅個別主權國家生存或安全，¹⁷¹例如歐洲的整合成效產生相當多的利益，歐盟成為區域整合的典範，¹⁷²因此，以區域為安全研究單元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的新安全觀開始受到重視。¹⁷³

與合作安全之新安全觀相關的是來自於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挑戰，綜合性安全從傳統的國防安全延伸至經濟安全、環境安全與人類安全。其中的人類安全，意謂人類本身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生活，通常我們可以發現這類問題都源自於國家內部居多，可能是來自既有結構或是先前結構遺留下來的各種威脅，這種威脅是因為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所造成的，而大部分可以追溯為是政府的無能或是好戰所製造。恐怖主義的外部勢力以及 AIDS/HIV 的廣泛擴張等是當今世界秩序中最嚴重的威脅來源。環境的挑戰、全球化的影響以及降低貧富之間的差

¹⁶⁹ Marlies Glasius and Mary Kaldor, 2009, "Individual First: A Huma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February 26, pp. 63-64.

¹⁷⁰ 同註 154，頁 197-198.

¹⁷¹ 同註 141，頁 12。

¹⁷² 同註 154，頁 202-203。

¹⁷³ 例如 Barry Buzan 與 Ole Waever 將區域定義為安全功能上的工具，領土與次級體系是一致的，區域是因為歷史的累積所造成，根據歷史與地緣關係，會不斷創造有好與敵意的鄰近國家關係，每一區域複合安全體都是小型的無政府狀態；David Lake 所重視的是其他國家所帶來的威脅，與國家的地緣關係無關。國家都是受到單獨的外部因素的安全威脅所影響，一個共同承擔的外部威脅就會使不同國家的集合綁在一起而成為區域，科技的進步與國家的成長或其他因素的變遷可以轉變國家全力投射的能力；Douglas Lemke 將 A. F. K. Organski 的權力轉移理論從全球層次降為區域層次，認為區域中就像國際體系的運作一樣，會有區域性階層的出現，且多數的階層制模型都會有一個全球霸權在其上位而形成金字塔式的組織，這種階層與全球結構所產生的一樣，不規則的安全困境是區域權力轉移的新變數。同註 154，頁 206-212。

距問題或通稱為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問題被認為是當前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¹⁷⁴因而，對於安全研究之行為主體、行為主體的目標、動機、威脅來源或是追求安全的手段就有修正的需要。

175

貳、安全觀的深化與廣化

然而何謂安全，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對於安全的研究，國際關係學界可能沒有存在一個具體且確切的定義給予這一個概念，安全一詞本身就是個模糊的符號，低度發展且極具爭議的概念，¹⁷⁶再加上安全在主觀和客觀環境上所受到的限制，實在難以予以操作化或是規劃出一套精準的量化數據來進行研究的工作。儘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安全問題的確存在於現狀環境當中，並且融入人類生活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在國際關係的多樣研究內容當中更是重要的主題。因此，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安全的相關歸納研究均企圖盡可能的以各種研究方法或探討方向來呈現安全概念的完整意涵。

自 1648 年後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體系運作法理化逐漸被認可且熟悉，在傳統的安全研究上，Patrick Morgan 認為研究的「焦點面向」應時常關注在主權國家行為者的安全(Safety)、內部社會安定或是主權國家的核心價值受到外部物質傷害或軍事壓迫的程度，而至於追求安全的目的則在於能夠免於刻意的人為暴力。安全事務原則上關心的是一種能力的維持、運用以及管理，

¹⁷⁴ James C. Hsiung, 2002, "Pacific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Order." *Asian Affairs*, Vol.29, No.2, p. 99.

¹⁷⁵ 潘忠歧，2004，〈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理論衝擊與困惑〉，《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頁1-7。

¹⁷⁶ 莫大華，1996，〈「安全研究」之趨勢〉，《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9期，頁62。

以事先預防或對抗人為所造成的暴力，特別是針對戰爭問題。¹⁷⁷主權國家的安全，成為了特別是在研究傳統安全的主要行為體或「研究主體」，然而，何謂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Arnold Wolfers 為國家安全作出更為深入經典的說明，其認為國家安全，在客觀意義上是對既有價值構成威脅的狀況是不存在的，而在主觀意義上則指既有價值觀可能受到攻擊的恐懼是不存在的，¹⁷⁸亦即，國家安全是關於國家生存(Survival)的內容，也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代理者宣布國家進入特定的緊急狀況，在此狀況之中，國家因而有正當的權利去宣稱得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去阻擋或抑止威脅來源危及國家生存的發生，¹⁷⁹安全之目的即在維持國家任何可能的生存機會。免於對於「既有價值」的威脅，是主權國家安全與否的關鍵所在，但所謂關於主權國家的既有價值包含哪些要素，而「威脅的來源」又在何處，這之中還是有很多有關安全定義的模糊空間需要去填補，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夠將安全所注重的焦點面向、研究主體、價值以及威脅來源給整理劃分出來，使得後繼在安全研究上有著比較清晰的脈絡可依循。David Baldwin 更將這些研究難題予以具體且細微的區分，Baldwin 國家安全的要素列為下列幾點以便後續研究，第一，哪些單元的安全？(Security for whom?)；第二，追求安全是為了哪些價值？(Security for which values?)；第三，需要多大程度的安全？(How much security?)；第四，從何而來的威脅？(From what threats?)；第五，透過什麼手段追求安全？(By what means?)，第六，必須付出多大的代價？(At what cost?)，以及最後，安全會需

¹⁷⁷ Patrick M. Morgan, 1997,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nd Regional Orde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 21.

¹⁷⁸ Arnold Wolfers, 1952,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67, No.4, pp. 484-485.

¹⁷⁹ Barry Buzan, Ole Waever, Jaap de Wilde,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p. 21.

要為期多久的時間？(In what time period?)。¹⁸⁰上述這些工作等同於深化了安全研究在焦點面向、研究主體、價值以及威脅來源的強調。

Barry Buzan 則將安全研究的分析內容細分為三個層次來看，這三個層次包括個人、國家以及相關國際體系，這三個層次所進行的工作是對不同層次的不同安全問題進行研究。因此價值所涉及的範圍以及行為主體便具有相當多元的性質，相對於傳統的國家安全所追求的可能是政治獨立或是領土完整，因而在個人、國家或是其他社會行為者都有可能追求不同程度的物質安全、經濟福利或是自主性，對於價值追求的差異性就會產生有別於傳統安全的利益，其所影響的會是行為主體的主、客觀因素考量。Barry Buzan 擴大了安全研究的範疇，亦即安全不需局限於傳統軍事安全。¹⁸¹當國家行為者的最終目的已經確立，¹⁸²國家在選擇各項不同保障安全途徑如權力平衡、威脅平衡、集體安全、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霸權或是扈從的對外戰略之前，即國家在選擇達到傳統軍事安全的途徑當下，國家行為者面臨不同的安全要素，其可能產出的對外戰略就會做不同的修正。

即便具體化國家安全的考量要素，但無法解決的困難在於這些具體歸納的過程依然是沒有確切具體化安全觀的終點，畢竟安全本身在定義上並非明確，況且安全觀含有規範性質，¹⁸³使得在論述安全這個領域的基本假設、指涉對象與評量標準時往往面臨許多難題。¹⁸⁴即便安全的概念與定義難以捉摸測量，但是透過文

¹⁸⁰ David Baldwin, 1997,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3, No.1, pp. 12-17.

¹⁸¹ 同註 179，頁 24。

¹⁸² 本文所論及的國家行為者的最終目的為維繫安全而予以生存。

¹⁸³ 同註 163，頁 89。

¹⁸⁴ 同註 168，頁 17。

獻的整理得以發掘一點收獲，即安全的範疇隨著實際國際情勢的演進而一同發生轉化，如同國內學者莫大華稱安全雖然難以明確給予既定範疇而使得傳統國家安全有系統的研究受到阻礙，但就安全觀本身卻產生向下、向上、水平以及垂直擴展的現象，向下指由國家主體到個人主體；向上則是國家主體擴展至國際體系；水平延展則是由軍事面向延伸至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以及人類本身；垂直變動則為確保安全的政治責任，由國家下降到區域或地方政府，向上升到國際制度，側延至非政府組織與市場。¹⁸⁵由此可知，安全觀持續更迭的趨勢是可以確定的，¹⁸⁶安全典範轉移的空間便逐漸浮現。

參、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觀之比較

對於安全研究的脈絡從傳統國家安全、國際安全、合作安全到綜合安全的發展，便得以發現幾個討論問題，在國際體系的變遷之下，傳統安全的議題以逐漸轉變成為以跨領土區域間的合作安全或是綜合環境以人為本的新興安全議題，在這其中表示，面臨安全考驗的行為主體、安全的威脅來源、安全的價值、追求安全的手段以及新興安全議題所需要考量的成本付出必須是有別於傳統安全的假定，如下表 4-1 所示。在這一系列的安全觀的變遷進程中，人類安全觀更是漸漸成為國際所倡議的主要新興議題，Roland Paris 更是把人類安全與傳統安全以具廣化且深化的角度建立矩陣形成安全研究的基礎分類模型，其將安全威脅來源歸類為軍事與非軍事兩類，以及安全所維護的行為主體以國家或個人呈現之，其中人類安全即以非軍事性且維護社會團體或個人的特

¹⁸⁵ 同註 176，頁 65。

¹⁸⁶ 莫大華，1998，〈「安全研究」論戰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8 期，頁 19-32。

質賦與實質意涵，請參閱表 4-2。本論文將於下一節繼續延伸非傳統安全觀的人類安全倡議討論之。

表 4-1：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觀之比較表

	傳統安全觀	非傳統安全觀
行為主體	主權國家	個人或公眾為主
威脅來源	外界對內部的威脅	外界對內部以及內部自發的威脅
價值	重視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	以人為本對生命的重視
手段差異	以軍事手段追求安全	以非軍事途徑為主要手段

資料來源：王昆義、蔡裕明，2004，〈全球化、人類安全與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5 卷第 2 期，頁 153-195。轉引自陳俞之，2010，《人類安全之應用與實踐研究：以失敗國家索馬利亞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頁 32。

表 4-2：安全研究的分類模型

		安全威脅之來源	
		軍事	軍事或非軍事
維護安全之對象	國家	國家安全	環境、經濟及其他安全項目
	社會團體或個人	國家內部安全 (如種族衝突)	人類安全

資料來源：Roland Paris, 2001,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2, pp. 98.

第二節 人類安全觀

傳統安全研究當中，軍事能力的效用日益削弱反映出兩個意涵，即來自於其他國家的外部侵略的可能性日趨減少，另外則是面對新的危險來源之處理方式可能不適合以傳統軍事力量來處理。如同上一小節的討論脈絡，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變遷，全球化的影響導致國際體系產生實質上的變化，許多過去或是現在不被重視的罕見的事件(Rare events)，例如政變、革命、大規模的經濟不景氣、經濟動盪，¹⁸⁷所造成的安全傷害之範圍或對象相較於冷戰期間只單純的關注主權國家安全與否的內涵有顯著擴大及成長的趨勢。國際體系不再只是主權國家所構成的權威關係網絡，昔日具有權威的國家退化成為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¹⁸⁸的出現或非國家行為者的出現，¹⁸⁹也成為國際體系環境的現實，這些罕見的事件與失敗的國家及非國家行為者形成更多冷戰結束後的威脅來源，這些新的威脅來源本身以及所涉及的行為主體都有別於傳統安全的基本假定。換言之，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環境迫使世界各國無法僅由傳統軍事安全的手段和發展經濟的途徑去

¹⁸⁷ Gary King and Langche Zeng, 2001, "Explaining Rare Ev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3, p. 693.

¹⁸⁸ 失敗的國家內部充斥著緊張、深度危險、衝突以及嚴重的競爭，在大多數的失敗國家中，其政府軍隊被一人或是團體操控而成為反叛軍是相當常見的情況。在失敗的國家中官方權威大致上都會面臨一個以上的動亂，可能是不同等級的自治區不服從，或是在國家內存在許多異議團體。以絕對暴力強度的多寡無法定義失敗的國家，而是失敗的國家都擁有上述的特徵，都是透過暴力途徑來對抗現有政府或建制，另一個明顯的特色則是都會有政治上或地理上的訴求以共同分享權力或自治權以進而合理化或能證明這就是失敗國家的識別。當暴力衝突一連串的發生且擴散至內部戰爭，當生活水準大量的惡化，當普遍生活公共建設崩解，當統治者的貪婪遍及且超越其責任權限，失靈就會出現，而內戰是國家失靈最常見的關鍵特徵；與強力國家相比較，失敗國家無法控制其領域，他們在其領土上失去權威，一個衡量國家失敗的方式即是此國家能掌控其原有領土是力範圍的能力，中央政府在多少範圍是名目上的虛偽統治，而控制此地區的真正權威者是誰等；另一項國家失敗的指標是暴力犯罪的成長率。以上例如斯里蘭卡的國內分裂主義問題、哥倫比亞的毒品問題、被塔利班政權所控制的阿富汗政府、辛巴威的內戰問題或恐怖主義等，國家失敗是人為的，並不是意外所致，也不是因為地理環境上或其他外部因素導致。請參照 Robert I. Rotberg, 2002,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Fail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25, Vol.3, pp. 85-96.

¹⁸⁹ 非國家行為者的範圍如有倡議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到滲透多國的恐怖主義蓋達組織等。

處理新的威脅來源等相關議題，而必須考慮到永續性、人類生存、生活品質、人民福祉、人類發展等超越傳統國家安全的問題。¹⁹⁰人類安全的安全觀地位之重要性水漲船高，也凸顯安全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安全的內涵應該反映當代人類生活的脈絡。

191

人類安全以從最基本的「人類本身為出發點」去討論安全議題。國際上第一次出現人類安全的探討是來自 1994 年的聯合國發展總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所提出的有關於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¹⁹²此報告強調，人類安全所關注的不是在武器上的問題，而是人類的生命與尊嚴，¹⁹³因此，其所強化的焦點議題有飢餓、疾病與壓抑等等或甚至來自日常生活上的各項傷害與崩潰。此份報告對於人類安全的定義範圍相當廣泛，各種來自對單一個人安全的不正常的或威脅的事件都包含在內，此份報告便認定常見的對於人類安全的威脅提出七項特別因素，其中包括糧食安全、經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個人安全、共同體安全以及政治安全此七項。¹⁹⁴從上述七點

¹⁹⁰ 宋燕輝，2004，〈人類安全的概念、國際發展與國家實踐〉，詩正鋒主編，《人類安全》。台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台灣心會，頁 34。

¹⁹¹ 蔡育岱、譚偉恩，2007，〈再思人類安全研究〉，《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32 期，頁 53-58。

¹⁹² 請參照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at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1994/> accessed on 12 February 2010.

¹⁹³ 同上註，頁 22。

¹⁹⁴ 同註 192，頁 24-25。

- (1) 糧食安全：指世界糧食的分配與供應方面應該免於匱乏。
- (2) 經濟安全：重視經濟領域中各人的工作權利，尤其是失業、貧富差距或通貨膨脹等問題。
- (3) 健康安全：每個個人在生活方式與生活環境上對健康所帶來的威脅。
- (4) 環境安全：國際社會中共同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例如全球暖化、沙漠化與各種能源利用等問題。
- (5) 個人安全：個人日常生活中面臨到的威脅，例如結構性暴力、人權等問題。
- (6) 共同體安全：每個人所生活的社群或團體有沒有受到基本的保障。
- (7) 政治安全：個人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有沒有受到足夠的保護，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平交流等問題。

還可向外延伸更細的議題，例如在健康安全裡我們可以探討 AIDS 的問題等。¹⁹⁵學術界也有一些對自己所認為的人類安全的定義，但是大致上都是以此份聯合國的報告為主要架構。¹⁹⁶例如，Gary King 與 Christopher Murray 還是給予人類安全下了定義，即人類安全為此種威脅或危機重要到足夠會對其個人的生命或財產上造成危險，如貧窮、健康、教育、政治自由與民主等。¹⁹⁷人類安全委員會(Council of Human Security)則認為人類安全將傳統上對於國家中心論的安全關予以轉變，並定義安全是保障所有人類生活之核心價值以強化人類本身的自由與滿足感，最終能夠使人類免於恐懼以及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Freedom from want)，進而促進人類針對生存與發展更有自我掌握之權利。¹⁹⁸不僅只關切到國家的安全，這種安全觀念已經延伸擴張並且覆蓋到每個個人的安全需求上，次級強權國家例如加拿大、日本與瑞士已經將此概念納入國內對外外交政策中。¹⁹⁹在歐洲國家中，歐盟的整合經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推廣人類安全政策的模型平台。

在 2008 年 2 月 15 號由人類安全之友(Friends of Human Security, FHS)的成員，與聯合國大會成員國籌組了研議以有關人類安全為專題的議論，這個專題議論所涵蓋的主權國家甚多且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域代表性，²⁰⁰顯現了國際上主權國家對於人類

¹⁹⁵ P. W. Singer, 2002, "AID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rvival*, Vol.44, No.1, pp. 145-158.

¹⁹⁶ Roland Paris, 2001,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2, p. 90.

¹⁹⁷ 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J. L. Murray, 2001,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6, No.4, p. 593.

¹⁹⁸ Sadako Ogata, and Johna Cels, 2003, "Human Security: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the People," *Global Governance*, Vol.9, pp. 273-274.

¹⁹⁹ John Kotsopoulos, 2006, "A Human Security Agenda for the EU?," *European Policy Center Issue Paper*, No.48, p. 6.

²⁰⁰ Hans Gunter Brauch, 2009,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in Policy and Science," in Hans Gunter Brauch、Ursula Oswald Spring、John Grin、Czeslaw Mesjasz、Patricia Kameri-Mbote、Navnita Chadha Behera、Bechir Chourou and Heinz Krummenacher eds., *Fa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nvironmental, Human, Energy, Food, Health and Water Security Concepts*. Berlin: Springer, pp. 969.

安全議題的重視。除了主權國家以外，國際上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推動人類安全議題也相當積極，包括如社會發展世界高峰會、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聯合國難民高級委員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亞太地區經濟暨社會委員會、聯合國大學、世界銀行、海牙訴求和平組織、美洲國家組織以及歐盟執委會等組織，以及 G-8 高峰會，都個別提出對於人類安全的相關報告或政策。

201

對於新的議題的倡議的挑戰，人類安全概念的倡議產生兩種效果，首先是部分主權國家決定將人類安全作為其對外政策的戰略準則，並且積極建立促進人類安全的機構與網絡，第二是部分國際關係學者決定將人類安全觀作為對傳統安全觀的修正，並且嘗試建立起一系列關於如何促進人類安全的研究。²⁰²因此，學界也勢必要針對人類安全的議題本身的特性進行探討，而人類安全議題的主要特性在於：普遍性之關切；人類安全之組成部分彼此是相互依賴的；透過早期預防，人類安全比較容易確保；以及人類安全主要是以人為中心的思維方式。²⁰³上述人類安全議題的特性得以發現，人類安全議題的處理是一種共同排斥(Common aversion)的問題，²⁰⁴因為議題本身的普遍性、跨國性、主體不確定性以及多領域之複雜性，非傳統安全的問題不再是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可以解決的，即行為者之間必須以共同透過早期預防來獲得共同利益，以免殃及其他國家的安全。

²⁰¹ 同註 190，頁 55-67。

²⁰² 同註 192，頁 32。

²⁰³ 同註 190，頁 45。

²⁰⁴ Arthur A. Stein, 1982,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pp. 299-323.

以歐盟為例 2004 年 9 月，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for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Javier Solana 帶領學術界組成研究團隊將人類安全問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巴塞隆納報告書」(The Barcelona Report)，²⁰⁵ 報告當中便提出所謂歐洲人類安全原則(Human Security Doctrine for Europe)的概念，內容中的主要原則與實質戰略如下：

一、 當中提出一組人類安全原則，其中包含七大項，即人權的至高無上原則(Primacy of human rights)、具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政治權威(Clear political authority)、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由下而上的途徑(A bottom-up approach)、重新關注各區域，並且重視區域的途徑(Regional focus)、使用合法外交工具(Use of legal instruments)，以及武力的適當使用(The appropriate use of force)。²⁰⁶

二、 組成一支由 15,000 人的人類安全反應部隊，部隊成員中有三分之一要由歐洲公民擔任，²⁰⁷ 在人類安全受到威脅或侵犯時，適當的使用武力或反抗的輔助行為是絕對具有正當性的。²⁰⁸

三、 建立一個新的合法架構以治理有關干預與直接介入操作的決策架構。除了上述歐盟內部所提出來的有關人類安全的原則之

²⁰⁵ 盧倩儀，2007，〈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頁 33-34。

²⁰⁶ Javier Solana, 2004, "A Human Security Doctrine for Europe: The Barcelona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Europe's Security Capabilities,"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CFSP*. Barcelona. pp. 14-20.

²⁰⁷ 同上註，頁 20-24。

²⁰⁸ Gareth Evans, 2004, "When is it Right to Fight?," *Survival*, Vol.46, No.3, p. 75.

外，聯合國大會 2005 年更是在世界峰會(World Summit)結果報告中確立並支持這些有關人類安全的內涵。²⁰⁹另外在歐盟內部政策需求方面，在巴塞隆納報告中主要提出有三項歐盟適用人類安全原則的主要理由：²¹⁰

(一) 道德理由(Moral case)，報告中便舉例歐盟必須主動去消除在殖民時期在世界各殖民地中殘留至今的殖民結構問題；

(二) 合法性理由(Legal case)，必須有效提升人權地位，但當國家有正當干涉他國失敗或失靈等問題時常常發現這些操作或行動都是沒有合法授權的，人類安全議程應該適切於聯合國憲章第 55 條與第 56 條結合；²¹¹

(三) 擺脫自我利益偏見的理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case)，即追求人類安全是相互利得的。

人類安全原則代表了歐盟本身對外關係的理念、價值、利益以及目標，亦即歐盟將安全政策轉換為實際作為，並且將貼近歐盟主要戰略之人類安全原則納入政策決策過程的依據，以提供一套清晰的治理架構，其實質戰略突顯了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理念特徵，並且在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DP)能夠順利針對人類安全進行三項途徑施

²⁰⁹ 請參照 2005 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http://www.un.org/summit2005/documents.html> accessed on 7 January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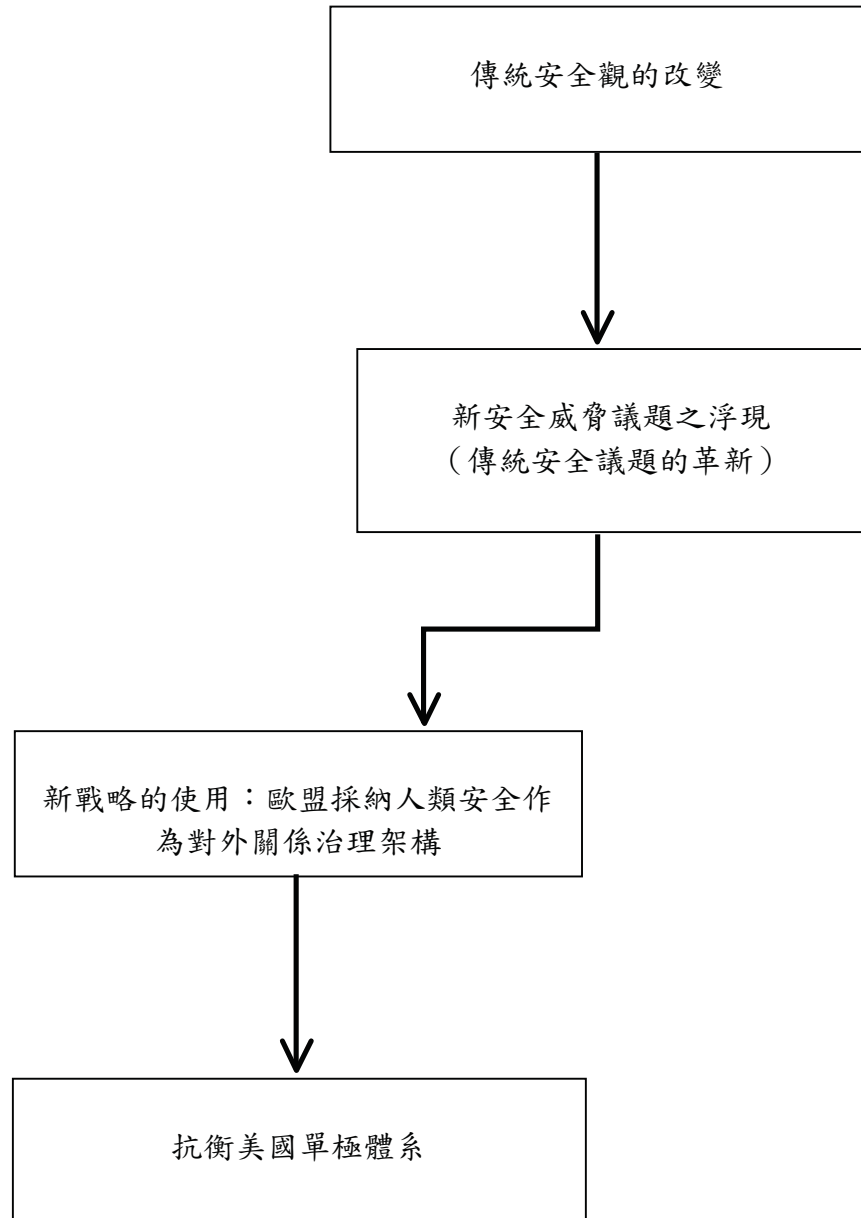
²¹⁰ John Kotsopoulos, 2006, “A Human Security Agenda for the EU?,” *European Policy Center Issue Paper*, No.48, p. 13.

²¹¹ 聯合國憲章第 55 條內容如下：為促進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即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和平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提升較高之生活程度、解決失業問題並重視經濟與社會發展；國家間經濟、社會、衛生及相關問題之解決必要，並加強國際間文化與教育之合作；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聯合國憲章第 56 條內容強調個成員國應採取共同或是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憲章第 55 條所載之宗旨。

行包括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民間與軍事的協作(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與衝突預防(Conflict prevention)。²¹²其中危機管理專注在使用柔性權宜工具以建立新的程序與發展結構去進行複合途徑的危機管理，例如警察制度的建立或法治保障；另一方面，由於冷戰結束之後鮮少有純粹軍事上的威脅來源存在，因而歐盟必須透過內部不同支柱之間的整合以回應危機，尤其是借重於民間力量與軍事上的整併；實質上的和平結果是衝突預防的最終目的，尤其是在防範失敗國家的作用上，透過預防性的干預以治理失敗國家內長期失靈的政府，此項政策除了得以重新連結國家之間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之外更能避免暴力衝突再次發生。²¹³歐盟企圖將本身的規範價值標準建立於一個以人類安全原則框架為主的對外政策之上，藉由危機管理、民間與軍事的協作以及衝突預防之治理方式訴求，一方面人類安全觀之框架解決人類安全的現狀問題進而修正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透過修正的過程試圖鞏固本身內部的理念、價值、利益以及目標。此階段的論述架構如圖 4-1 所示：

²¹² Mary Kaldor, Mary Martin, and Sabine Selchow, 2007, "Human Security: A New Strategic Narrative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3, No.2, p. 274.

²¹³ 同上註，頁 274-278。



→ 表示具有直接的相互關聯性

圖 4-1：軟性平衡戰略實踐過程分析圖 B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第三節 小結

將安全觀的演進納入討論的目的在於企圖點出自冷戰結束之後的安全環境與安全實質內涵的轉變所導致於現實主義面對新興安全議題所需要做出的理論層次之修正。

本章首先對於從兩次大戰期間迄至 1980 年代後的今天的安全環境之背景予以說明，每個階段都體現出不同的安全要素的重視與因為客觀安全環境影響而產出的國家行為模式與安全研究內涵，如果將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觀以行為主體、威脅來源、價值以及手段等四個指標進行區隔，發現安全觀不斷在進行廣化及深化的擴展，人類安全觀的被重視與崛起便是其中主要關切的重點。

由於現實安全環境改變的同時影響所及是冷戰權力平衡體系瓦解後產生的單極體系現狀狀態維持，涉及傳統安全議題的現實主義典範也需要銜接現實問題的落差，進而人類安全與軟性平衡產生因果關係的連結，在人類安全議題成為主要問題來源的環境下，歐盟以此為立基點發佈並建立一套屬於歐盟規範價值標準的人類安全一成原則與戰略架構，以危機管理、衝突預防以及民間與軍事協作的治理原則進行，目的在藉由人類安全的途徑修正與美國單極強權之間的權力關係。

第五章 單極體系下的歐盟軟性平衡實踐

本章第一節首要回顧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美國依大局所趨所塑造的單極「美國體系」，此體系供給了大部分的軍事、政治、經濟、科學以及文化的連結予其他國家行為者以進而建立以美國為主的區域或全球性的多變制度的誘因，鞏固美國國際體系的權力地位。即便如此，美國在領導體系運作的同時仍然存在許多尚未處理妥當的關係與新挑戰，美國雖然不斷的擴展其權力投射範圍，在單極體系霸權領導的作風下卻依然無法遏止恐怖主義的擴散。為了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因而美國採取攻擊性的先制戰爭以及單邊主義的作為對抗之。基此，在第二節的部份持續說明美國發動 2002 年阿富汗以及 2003 年伊拉克反恐戰爭之過程，但反恐行動並不如預期順利，反而使美國陷入多樣的威脅困境，例如反恐戰爭的實質內涵不同於解決傳統安全容易以及人類安全問題的挑戰等，因而美國的戰略思維出現了得以被修正的空間。第三節呈上述脈絡論及歐盟便扮演平衡美國的角色，但歐盟考量本身於國際體系之處境以及與美國的權力關係因此選擇站在訴求人類安全的立場上以軟性平衡的戰略，平衡美國單極體系下的強迫式單邊作為，以促使美國修正其既有的對外政策方向予以探討。

第一節 美國的單邊主義作為

壹、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單極體系」

蘇聯與美國的兩極對立體系在蘇聯共產政體宣告瓦解後隨之轉變，冷戰的結束促使國際體系朝向一個以單極為主的體系發展，尤其是以美國所扮演的首要體系領導角色，即使這種國際秩序並非一致的受到世界的肯定，但是如其他具有相異的意識型態或是地理上的抗衡者也確實沒有出現取代蘇聯以平衡美國的單極地位。美國自 1990 年之後成為超強是可以確定的，從數據上顯示在 1990 至 1998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六，相較於整個歐洲的百分之十七以及日本百分之七的經濟成長率，有著顯著的差異距離。美國除了在政治以及軍事上的支配能力之外，美國的單極體系尚足以掌握世界經濟、金融、科技甚至是文化層次的支配，²¹⁴其本身於冷戰之後所匯集的權力以及影響力的投射範圍是前無古人。

依此，美國單極體系下所產生的國際體系特色可以茲如下列數項說明，第一，缺乏戰略上競爭以及強權之間的平衡對抗，蘇聯解體後並沒有另一個強權立刻興起取而代之，故美國以單一國家領導國際體系的姿態存立是主要特色；第二，雖然沒有取而代之的強權挑戰美國，然而美國與盟國或其他區域國家進行諮商甚至是合作的方式來處理問題是不可被排除的選項；第三，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與其他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出現本質上的變化，而導致彼此位階的轉變；第四，美國能夠協同主要盟國主導全球事務或議題的設定；第五，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功能性角色越趨明顯；第六，美國能夠帶領其他各區域鼓勵進行經濟合作或整合以增加互賴；第七，雖然軍事與政治議題仍不能輕易忽視，但是其他新興議題也浮上檯面，例如經貿、科技或非傳統安全等

²¹⁴ G. John Ikenberry, 2001,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5, p. 191.

新興議題。²¹⁵由此觀之，美國現存的支配能力必須是不同於以往的霸權形式，其不再只是單純的權力支配者。反而美國提供了一套制度架構以連結其他區域並形成初步以美國為主的治理模式，美國就如同各個支點的軸心，供給重要的軍事、政治、經濟、科學、以及文化的連結而形成稱之的「美國體系」。²¹⁶透過美國體系的運作，其得以主導以美國為首，而其他歐洲與亞洲國家為主要成員的安全聯盟、建構開放且多邊的經濟關係、建立區域或全球的多邊制度，並且宣傳美國的民主與傳遞資本經濟，²¹⁷以維繫美國體系，例如自蘇聯解體後，日本與美國重新再保雙邊的同盟關係，在跨大西洋以及太平洋區域範圍內擴展雙邊貿易與增加投資機會，並且抑制任何雙邊的政治衝突而回到傳統的權力平衡，德國與其他歐盟國家也分別削減國內軍事預算以取代提高軍事能力的作為，俄羅斯與中國雖仍不是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同一陣線的核心，且甚至是反對美國的霸權全球展現行為，但兩國也開始尋找與西方導向的世界體系有更多的整合。²¹⁸美國體系的目標在於透過政府間的合作、自由民主的社會以及由資本主義為導航的秩序來建立共同利益與共享價值，但達到這些目標的前提還是「安全結構」的問題，亦即，最根本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依然是歸因本身權力、制度關係與政治上的妥協而決定，擴大權力範疇最終還是維持現存秩序的關鍵要素。²¹⁹畢竟美國體系的崛起雖然沒有促

²¹⁵ 陳一新，1992，〈美國在「單極為主多極政經體系」的新地位與新挑戰〉，《美國月刊》，第7卷第2期，頁11-12。

²¹⁶ 同註214，頁192。

²¹⁷ G. John Ikenberry 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夠支配國際秩序主要有賴於四個面相上的配合：

(1) 美國以多邊的方式在安全問題上架構同盟，經濟問題上開放市場，並且進而穩定金融貿易。

(2) 得力於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受尊重的歷史觀感。

(3) 民主與國際制度的發展。

(4) 內部深度的現代化的社會。

請參照同註214，頁197-212。

²¹⁸ G. John Ikenberry, 2007,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Survival*, Vol.43, No.4, p. 22.

²¹⁹ 同上註，頁23。

使全球激烈的反彈，美國唯有一方面採用現實主義思維的方式，另一方面則以自由主義的邏輯同時整頓不安定的美國權力，即以多邊架構推動主要單邊利益的獲取而鞏固美國體系之穩定。

即便如此，美國的單極體系下仍然存在許多尚未完善處理妥當的關係與新挑戰，例如蘇聯解體後核子武器的控制以及數量無法準確掌握、第三世界的國家正積極開發核子武器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如北韓與伊朗問題、前蘇聯的共產主義衛星國以及東歐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依舊困難重重、全球邁向區域整合的趨勢，國家之間的合作意願降低、民主的力量無法深根、武器毒品走私以及環境污染或危害人類之疾病抑或是恐怖主義成為新的威脅生存之因素。²²⁰這些挑戰也影響且考驗了美國體系的穩定與否，美國雖然不斷的擴展其權力的投射範圍，在單極體系霸權領導的作風下卻依然無法有效遏止恐怖主義的擴散。

然而蓋達組織(al-Qaeda)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成功的對美國紐約、華盛頓以及賓州地區進行恐怖攻擊，²²¹造成上千無辜的美國公民葬送攻擊事件之中，雖然沒有明顯的證據指出蓋達組織的陣營所在地，但是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神學士政權於境內藏匿資深蓋達組織成員的事實，使得阿富汗成為美國反恐戰爭最主要的目標，²²²恐怖攻擊便成為冷戰之後對美國單極體系存立的最大陰霾。為此，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政府轉而偏向更加靠攏單極甚至帝國式的大戰略，以現實利益考量美國與全球權力之間的相對位階，反恐戰爭的本質不同於以往的傳統戰爭，加上對於防範

²²⁰ 同註 218，頁 13。

²²¹ 蓋達，其意為「軍事基地」，指利用其遍佈全球的恐怖份子與各種組織，運用各式各樣的攻擊手段，進行全球恐怖攻擊行動。請參照巨克毅，2004，〈國際恐怖主義蓋達(al-Qaeda)組織的意識型態與策略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6 期，頁 3。

²²² Steven Simon and Daniel Benjamin, 2001, "The Terror," *Survival*, Vol.43, No.4, p. 5.

美國本身安全威脅上的考慮，布希政府重回單邊主義主要目的便在修正過去由美國支配的自由制度體系的運作以改變與其他強權之間的合作關係，進而結合其他夥伴的支持對抗來自非傳統國家強權威脅的恐怖主義，以持續維護其制度性霸權的地位，美國需要重整世界秩序打擊恐怖主義，在此項先決條件之下，布希政府斷然拒絕了與其他國家簽訂任何條款或協定，例如全球暖化、武器管制、貿易或商務條款等，且不再承擔大部分的政治責任，²²³而以所謂「布希主義」的主張在反恐戰爭的時代持續建構美國所需要的國際秩序。

貳、布希主義

冷戰以後美蘇兩極抗衡體系瓦解、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新安全議題的不斷出現，各種國際問題不斷的發酵的同時，一項新的安全觀以一種超越一般主權概念的安全問題也伴隨產生，²²⁴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嚴苛的考驗，此次恐怖攻擊是自 1812 年美英戰爭以來，第一次美國領土境內遭受大規模的攻擊。²²⁵作為對恐怖攻擊行動的回應，相較於過去對於參與國際事務以及開放經濟的方式，美國由布希政府所建立的強迫式單極體系成為對外反恐政策的核心，其保守般的思想產出兩項要素成為其對外政策的依據與任務，或稱為「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布希於 2002 年 6 月在西點軍校(West Point)之畢業演說上提及：「美國必須且計畫持續維持其軍事力量以免除於來自任何威脅的挑戰。」於同年 9 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The

²²³ 同註 218，頁 25-31。

²²⁴ 王崑義，2002，〈美國的反恐怖主義與國際安全：兼論九一一事件以後臺海兩岸的處境〉，《遠景季刊》，第 3 卷第 2 期，頁 157-158。

²²⁵ 吳坤暉、吳穎錫，2006，〈阿富汗與美國西方文明的衝突：以塔利班政權為例〉，《國際文化研究》，第 2 卷第 2 期，頁 10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報告中宣布：「美國必須建立且維持有效的防禦能力以避免任何挑戰的存在，美國的軍事力量將要足夠強大以事先勸阻潛在反對勢力企圖超越或平衡美國權力而建立之軍事力量的可能，以保障美國或美國盟友之安全。」²²⁶ 掀開在布希主義此種強迫式作為的底牌，根深蒂固其中的是布希政府新保守主義色彩，新保守主義並沒有特定的外交政策信念，唯有一些經過歷史所累積的經驗法則，新保守主義強調愛國、在國際場合要清楚敵我關係、國家利益可以是全球性的範疇，不地受到地理限制，以及重視意識型態的觀念進而維護及推廣民主以達成美國所設定的利益。²²⁷ 根據這些經驗法則，新保守主義展現茲如包括下列四項要素，首先是強調傳統權力平衡的方式是沒有必要且阻礙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思維，「扈從」才是美國希望與其他國家的互動行為模式，藉由扈從的戰略以合理化許多對外行為，次之為排除姑息任何國際問題的可能，防禦性戰爭是必要的，再次為以單邊主義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對付執意與美國為敵的對象，因為其認為經濟手段或聯合國的干預有效性是相當受限的，最後是高舉民主制度的優點，重視道德觀，在國際社會上擴張民主制度。²²⁸ 依此，美國希望以自身的價值判斷尋求正義的道德訴求與利益標準來制定外交政策，以所謂的布希主義鞏固並持續合理化美國單極國際體系。

其布希主義戰略實踐上包括兩大戰略，其一為攻擊性的「先制戰爭」(Preemptive war)，即以國家為例，在國家還沒遭受到實質攻擊之前就先對其可能的攻擊來源做出先發制人的消滅策略，

²²⁶ Brian C. Schmidt, and Michael C. Williams, 2008, "The Bush Doctrine and the Iraq War: Neoconservatives Versus Realists, *Security Studies*, Vol.17, p. 195.

²²⁷ 楊吉林，2010，〈反美主義與布希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之探討〉，《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3卷第2期，頁427-434。

²²⁸ 同註224，頁196-201。

恐怖主義的攻擊不同於傳統戰爭的實質內涵，其差異表現在針對恐怖主義的反擊無法有效將範圍鎖定在單一主權國家之內，亦即反擊的對象是分布游離在不同國家境內，因而無法對單一個體行為者制定具有效益且針對性的戰略，而又為了避免恐怖攻擊再次爆發，故選擇採取先發制人攻擊戰略成為美國的主要選項，透過先發制人的攻擊，以防範潛在威脅繼續擴散或再次發動攻擊行動，例如阿富汗藏匿蓋達組織的事實，以及伊拉克被指控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使得美國擔憂來自恐怖份子的二次傷害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流入恐怖份子的掌控，因此美國在自我前提條件的設定下，毅然決然發動先發制人的對阿富汗與伊拉克之反恐戰爭；其二為「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即透過單方面的權宜途徑迫使其他國家行為之，以達成美國外交政策預設的需求與目標，因為美國認為傳統的嚇阻戰略不再能有效的對抗恐怖份子，因而採用單邊作為以節省更多外交成本並且避免二次傷害的立即爆發，以直接而非間接的方式解決新的問題，如同上述美國發動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反恐戰爭可見單邊主義的表現，更詳細的單邊行為的說明將在本章第二節詳細分析。

呈上述脈絡所述，布希政府強化了單極體系的現實權力處理問題，將產生三點長期的影響，首先國際體系會變成只有美國有權力去做任何如反恐怖攻擊戰爭之類等問題的事務，且其他歐洲國家成為可能妥協的行為者；次之，歐洲的各項外交政策可能都只是美國勉強同意後的結果，最後聯合國安理可能會失去其治理全球的規範能力；²²⁹再次，恐怖攻擊除了使得布希政府拋棄過去多邊自由制度的參與，轉換以現實權力考量的外交政策，恐怖攻擊反而給予美國提供一個相當便利的重新整頓並且支配國際體系

²²⁹ Robert Jervis, 2004, "The Compulsive Empire" in Karen A. Mingst and Jack L. Snyder, ed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Y: Norton Company, pp. 138-141

的途徑。但是新保守主義之單元特色的改變並無法轉變結構所賦予的限制力，美國的單極體系使其他強權國家開始恐懼美國權力不對稱的投射。

第二節 反恐戰爭與美國反恐作為之困境

壹、2002 年阿富汗反恐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之進入美蘇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雙方都極盡可能的寄望能夠在戰略地緣關係上取得優勢，其中阿富汗因為先天上地理戰略位置重要，國內又蘊藏大量天然氣資源，美蘇兩國都設想如何將阿富汗納為置於自己的勢力範圍內。阿富汗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就是英國的目標殖民國，阿富汗東臨巴基斯坦可通向印度，西接西亞大陸，北邊甚與中國領土相連，英國為取得阿富汗的控制權甚至不惜發動三次對阿富汗戰爭(1839-1842, 1878-1880, 1919)。²³⁰1979 年蘇聯因為親蘇的阿富汗政府被推翻，同年十二月便舉兵入侵阿富汗喀布爾(Kabul)展開軍事佔領以推翻阿富汗 Amin 政權，與此同時美國也重起圍堵政策，積極擴張武力並支援阿富汗反抗軍，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在此期間赴巴基斯坦受訓，與美國接洽，藉由美國與巴基斯坦的援助進行阿富汗反蘇聯的戰爭。²³¹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行動遭受聯合國大會的批評，多次要求蘇聯撤離阿富汗，但直到 1986 年蘇聯因為國內內部問題每下愈況，而開始從阿富汗部分撤軍。蘇聯撤軍留給阿富汗許多內部問題，例如傀儡政府，塔利班軍團便在此時異軍突起，乘勢前進攻下喀布爾，於 1994 年奪得阿富汗大部分的掌控權，並且與賓拉登所籌備的蓋達組織建立合作關係。²³²

²³⁰ 黃鴻釗，2002，〈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度：阿富汗〉，《歷史月刊》，第 168 期，頁 40-47。

²³¹ 蔡育岱，2011，〈蓋達組織與賓拉登年代恐怖活動之概況回顧〉，《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頁 14。

²³² 周煦，2002，〈美國與阿富汗關係的演變〉，《歷史月刊》，第 168 期，頁 48-52。

1990-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賓拉登反對美國干涉阿拉伯世界，便於蘇丹設立蓋達組織總部，開始籌設反美行動的規劃。賓拉登提供金錢資源於伊斯蘭世界訓練聖戰士，並於 1996 年發佈聖戰宣言，強調要將美國逐出阿拉伯世界，解放伊斯蘭聖地，宣稱阿拉伯人有權攻擊美軍在波斯灣的駐軍，此後賓拉登予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正式結盟，以經援方式幫助塔利班政權穩固在阿富汗內部的執政正當性與合法性。²³³蓋達組織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對美國紐約經貿大廈、華盛頓五角大廈以及賓州地區進行大規模恐怖攻擊行動，²³⁴此次恐怖攻擊造成上千無辜美國公民身亡，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藏匿籌劃反美恐怖攻擊行動的蓋達組織成員事實，使得阿富汗成為美國首要反恐戰爭的標的。

事後布希政府要求塔利班政權交出賓拉登，塔利班政權不出預期拒絕交出賓拉登，美國改採以單極體系領導的優勢對阿富汗施行外交、經濟以及軍事上的壓力，在外交上，美國迫使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撤銷對於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承認，進行孤立阿富汗，並且美國亦透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拉攏他國共同合作以對抗恐怖主義；²³⁵在經濟上美國切斷任何塔利班政權以及賓拉登蓋達組織的經援來源；在軍事行動上，美國支援阿富汗內部的北方聯盟以抵抗塔利班政權，並且於 2002 年正式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據點進行軍事轟炸，推翻塔利班政權。但是隨著美國對阿富汗戰爭的延長和無辜平民傷亡人數

²³³ 同註 231，頁 14-15。

²³⁴ 在 911 恐怖攻擊之前蓋達組織便有參與重大恐怖攻擊事件的紀錄，例如 1995 年 11 月 1 日以及 1996 年 6 月 2 日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汽車炸彈攻擊事件；1998 年 8 月 7 日位於坦尚尼亞與肯亞的美國大使館遭炸彈攻擊；2000 年 10 月 12 日蓋達組織於葉門轟炸美國駐中東船艦。請參照同註 227，頁 17。

²³⁵ 2001 年 9 月 12 日以及 9 月 28 日兩天，聯合國分別通過 1368 號與 1373 號決議文，聲明反對任何一切形式的恐怖攻擊行動，1373 號決議文甚至強調「各國得以採取任何手段對付恐怖主義」，兩項決議文使得美國採用強勢武力攻擊阿富汗的行動獲得合理化且具有正當性。請參照同註 220，頁 166。

增加，甚至擴大戰區至中亞的策略，更有論者認為美國摒棄政治手段解決問題執意動武，其目的在於運用恐怖主義的藉口獲取不為人知的利益。²³⁶阿富汗戰爭導致原先就失靈的國家內部衍生更多人類安全的問題，²³⁷失敗的國家失去既有功能無法正常使國家政治、經濟、社會運作，更遑論能夠保障以人為本的個別人身安全，2001年大約就有370萬阿富汗人民作為難民生活在世界各地流浪，占全球難民總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迄至2007年底，全球1140萬難民人口中有310萬是阿富汗人，比例占百分之二十七，²³⁸又例如臨時政府內充斥著軍閥、全球最高的嬰兒死亡率、毒品交易猖獗的問題，阿富汗境內有極嚴重之情勢危及人類安全。

美國的單邊先制戰爭外交政策，完全與當今歐盟或是民主國家所主張的國際政治價值體系背道而馳。歐盟與美國在處理國際重要議題上因為某些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宗教的共同基礎，尚且存在對國際重要一提上有某些重疊與相同的相對利益。²³⁹當美

²³⁶ 美國進入阿富汗中亞的戰略目的經分析後可能包括下列幾項：

- (1) 提昇在中亞的地位。
- (2) 藉由聯合軍事行動，弱化俄羅斯與其他中亞國家的軍事連結。
- (3) 運用美軍先進軍事裝備取代中亞國家對於俄羅斯武器裝備的依賴。
- (4) 間接扶植親美政權，軟化俄羅斯勢力。
- (5) 抵消中共聯合中亞盟國抗衡美國的作為。
- (6) 對伊朗施加更大壓力，以阻絕其支持恐怖主義。
- (7) 維護裡海與中亞的石油利益與油管安全。
- (8) 聯繫外高加索地區，掌握能源產銷以抑止俄羅斯或中國運用中亞能源牽制美國。
- (9) 切斷毒品運輸路線。
- (10) 防範回教基本教義勢力的快速擴張。

請參照龍舒甲，2002，〈從石油利益論「九一一事件」後的中亞地區與其周邊情勢〉，《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6期，頁115。

²³⁷ 阿富汗在《Foreign Policy》的失敗國家指標中，直至2011年阿富汗依舊排名在世界第7名。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6/17/2011_failed_states_index_interactive_map_and_rankings accessed on 20 March 2012.

²³⁸ 時宏遠，2010，〈淺談巴基斯坦境內的阿富汗難民問題〉，《世界民族》，第2期，頁47。

²³⁹ 甘逸驊，2008，〈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2期，頁2。

國利用單邊主義在重組轉變中的國際體系之權力分配，以建立一個由美國所能有效掌握的新的新世界秩序時，這點必然會遇到一些障礙與變數，其中一向障礙便是歐盟開始拓展其自我的雙邊或多邊的外交策略，以反制回應美國的逐漸偏向帝國主義式的單邊主義行動。²⁴⁰

貳、2003 年伊拉克戰爭

在美國順利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同時，布希政府於 2002 年宣佈伊拉克等國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伊拉克更是因為遭懷疑藏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並可能提供此類武器給蓋達組織，美國便計畫各種方式以企圖推翻伊拉克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²⁴¹以布希主義的強勢單邊主義後盾作為決策依據，2002 年 11 月，美國為了得到出兵伊拉克的合理理由，藉由先從聯合國安理會之多邊途徑展開制裁伊拉克的計畫，首先美國強迫迫使聯合國通過 1441 號決議文，美國首先發聲聲稱伊拉克已經違反 1991 年聯合國對於波斯灣戰爭 687 號的停火決議文，687 號決議文中白紙黑字明文要求伊拉克必須在國際社會監督的情況之下銷毀國內所有核生化武器以及長程彈道飛彈並且必須接受國際對設施的檢查。在此根據之上，美國於 1441 號決議指出，若伊拉克違反決議，將面臨「嚴重後果」並且持零容忍態度採取一切必要之手段制裁伊拉克。²⁴²伊拉克海珊政權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是其被懷疑藏匿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當非親西方的伊拉克海珊政權擁有這些大規模

²⁴⁰ Daniel W. Drezner, 2007, "The New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請參照 YaleGlobal Onlin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new-new-world-order> accessed on 7 January 2010.

²⁴¹ 陳文生，2004，〈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 1441 號決議案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頁 24。

²⁴² 同上註，頁 28-31。

毀滅性武器，不僅可能將技術轉移給蓋達組織或其他恐怖份子，也可能以此類武器威脅美國位於中東的同盟國，因此，美國迫切希望避免造成災難式的恐怖主義(Catastrophic terrorism)攻擊。²⁴³2003年在勉強且間接獲得聯合國讓步妥協之後美國正式進軍伊拉克。海珊政權雖然成功被美國推翻，但國家內部隨即進入無政府狀態，²⁴⁴無辜的人民依然籠罩在大規模武器擴散的威脅之下，由於失靈的政府之間資訊不對等從而導致人民安全失去保障，人類安全的經濟、糧食、健康、環境、個人、共同體、政治安全完全無法在伊拉克獲得實踐。

布希政府除了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使用強勢的手段迫使 1441 號決議文能夠合理化其對伊拉克戰爭之外，為了將邪惡軸心國家的攻擊可能降到最低的風險，美國更計畫在歐洲地區部屬導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BMDS)，導彈防禦系統主要包含在波蘭架設導彈攔截器以及在捷克設立一個地面偵測雷達，²⁴⁵在處於反恐戰爭時期的狀態中，美國的任何軍事作為對於周邊國家而言都是相當敏感的議題，美國的戰略思維目標在求取國家安全的保障以有效降低來自例如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攻擊。美國選在波蘭以及捷克架設導彈防禦系統主要有幾項可能原因，首先，對於俄羅斯依然保有疑慮，次之是單極領導地位的強化，美國持續以多邊途徑製造單邊利益以獲取並鞏固對單極領導體系的權力分配的保障，第三是平衡歐洲的勢力，歐盟的發展進程所展現的是不同於美國的軍事內涵，因此歐盟在某種程度上必須仰賴美國的支援，然而如果未來歐盟足以發展另一套集體的

²⁴³ 同註 241，頁 30。

²⁴⁴ 伊拉克在《Foreign Policy》的失敗國家指標中，直至 2011 年伊拉克排名在世界第 9 名。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6/17/2011_failed_states_index_interactive_map_and_rankings accessed on 20 March 2012.

²⁴⁵ 蔡育岱，2010，〈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屬：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論？〉，《全球政治評論》，第 29 期，頁 6。

軍事力量，在對外政策上有更多的獨立決策的空間，對美國而言是某種程度上的戰力損失，則美國便藉此分化且平衡歐洲的勢力，美國拉攏歐盟中東歐國家勢力波蘭與捷克以有效分化抵制歐盟在安全與防衛政策上不想受制於美國的態度。²⁴⁶美國一連串的反恐怖攻擊的戰略政策，清晰明瞭展現單邊主義以及先制攻擊的思維，但是美國緊迫的部屬區域支配範圍，也帶給歐洲極大的區域壓力。

參、美國反恐戰爭之困境

儘管如此，布希政府在施行單邊主義的戰略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還是必須認清到幾項現實，亦或說是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之後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夾帶著趾高氣昂的野心制定大多數的對外政策與目標以訴求單邊利益，且不考慮本身所必須要付出的任何代價，911 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應該認知到自身的外交政策即便是單邊行為也是要付出一定程度上的代價，而非免於一切成本上的犧牲的，蓋達組織摧毀了美國全球佈局的策略，且損失程度超乎原有美國所能想像，因而美國於恐怖攻擊之後應認清無法保證其全球影響力的單邊主義基礎與範疇，且必要時可能需要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犧牲與調整；第二，美國所建構的體系不再如同其自我想像的那麼受其他國家的青睞，否則美國可能不會遭受近幾年來最為嚴重的恐怖份子的攻擊，除此之外，其他盟國例如歐盟也並非一致同意美國的反恐行動，歐盟認為美國的反恐行動必須是比例上相對稱的(Proportional)，即便有其他盟國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但這並不代表這些支持者是百分之百依順美國權力或是在其他議題上的單邊作為；第三，失敗國

²⁴⁶ 同註 245，頁 6-13。

家儼然成為威脅其他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崩解，形成國內無政府狀態，大規模的難民遷徙、經濟上的混亂或是大規模的暴力行動等人權問題都將造成大範圍的傷害，甚至外溢至其他鄰近國家，國際社會對於這些問題總是三心二意且只有部分成功解決的案例，失敗國家的組織犯罪也成為美國安全威脅的一大考驗；第四，美國的對外戰略安排已經不再是一枝獨秀，恐怖攻擊反映出不同於過往傳統戰爭的內涵，因而美國需要得到其他國家的奧援，以有效抵制威脅。²⁴⁷

縱上所述，整體美國體系的建構與鞏固的過程之中，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的恐怖主義蔓延的時代，美國在布希主義為主軸的反恐戰爭下反映出下列三項主要困境是值得關注的，亦即其一，美國雖然以強勢單邊作為進行反恐戰爭，但是反恐戰爭實質內涵不同於傳統戰爭，在地緣以及現實不對稱問題的考量上依靠單一國家的行動是無法根除恐怖主義的存在，反恐戰爭不能缺乏其他國家的多邊支持；其二，面臨新興安全議題的挑戰，美國的處理方式可能必須要不同於以往的單邊主義思維，單極體系領導權在反恐戰爭上由於採納的先發制人戰爭正當性不足而受到挑戰，其他行為者例如歐盟則表明應該採行更加多邊化或多樣化的途徑予以處理恐怖主義所衍生的安全問題；其三，美國在重建受恐怖份子掌控的國家之方式或途徑在實際觀察發現是不盡然成功的，先制戰爭以及單邊主義的結果性邏輯戰略無法有效克制威脅繼續擴散更無法完成對目標國家灌輸主觀價值，例如民主體制的建構，以改善並建立預期的政治情況。總而言之，美國處理恐怖主義問題的方式或戰略思維，浮現了被修正的空間。

²⁴⁷ Stephen M. Wlat, 2001,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3, pp. 57-63.

第三節 歐盟的軟性平衡實踐

美國與蘇聯冷戰的結束等同於兩邊相互平衡的兩極體系勢力的崩解，依照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邏輯推估，國際上必然會再次浮現一個強權或行為者以抗衡冷戰的最終贏家美國的勢力。然而，冷戰之後的 1990 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期這段期間國際上卻沒有出現任何企圖取代蘇聯地位的強權或行為者，反而讓美國情勢水漲船高的朝向單極體系的發展，這些結構轉變的問題顛覆了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解釋，也因而引起國際關係學界一連串的討論國際結構變遷的原因，結構現實主義者也大量回應有關結構改變的問題，²⁴⁸抑或是現狀國際體系的體現應該不是單極或多極的反映，²⁴⁹但更多的關注課題則將焦點擺在為什麼不會再有其他強權或是行為者起而平衡美國的單極體系，反而使單極體系得以持續存立。²⁵⁰

美國除了在政治以及軍事上的優越支配能力之外，美國於冷戰終結後尚足以掌握世界經濟、金融、科技甚至是文化層次的支配，更提供了一套制度架構以連結其他區域並形成初步的治理模式，美國就如同各個支點的軸心不斷的提供公共財，藉由各種指

²⁴⁸ 如參照 G. John Ikenberry ed., 2002,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Balance of 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99.

²⁴⁹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部長（President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Richard N. Haass 在 2008 年於《Foreign Affairs》刊登「無極時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一文中內提到，幫今對於世界不再是由一個或兩個甚至是多個主權國家所支配，而是藉由大約一打數量的行為者掌握並且運用各式各樣類型的權力所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請參照 Richard N. Haass, 2008,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from the May/June 2008 issu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397/richard-n-haass/the-age-of-nonpolarity> accessed on 10 March 2011.

²⁵⁰ 如參照 Michael Mastanduno,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 pp. 49-88. ; William C. Wohlforth, 1999, “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pp. 5-41. ; 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9, “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pp. 1-27.

標上的觀察可以得到確認的答案是冷戰之後的國際結構是以美國為領導的單極體系。加上 911 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更是藉由多邊反恐行動的途徑切入以推動單邊利益，並且以布希主義的先制戰略增進強制外交的效果。但是在反恐行動的過程中並不如美國所預設的是個可以左右逢緣的良好時機，主要問題來自於美國針對新安全議題的挑戰以及對於關鍵盟友的需求。相較於美國，國際上擁有跨國特性且具高度整合的行為者歐盟，其高度整合的一致性使其伴隨的效應更加彰顯，歐盟越來越能夠定位自己的利益、偏好與政策目標所在。²⁵¹畢竟在不同的議題上，權力的配置可能就會有不同，歐盟本身有其專業性存在，所以在特定的議題處理上，其權力的多樣性可能足以採納軟性的方式平衡大國。

壹、軟性平衡戰略空間

如欲試圖檢視軟性平衡的效力成果，得以先設定美國單極透過本身權力與實力的施予是否能夠獲得期預期的收穫。在過去對於體系的發展方向，一直都是以追求和平以及穩定為首要達成之目標，但相較於追求和平與穩定的傳統戰爭時期，在單極體系存立的結構環境中，解決傳統戰爭變得不是最為棘手的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修正主義強權具有一定程度的權力與意願足以挑戰單極的地位，因此，當傳統戰爭可能不再是對體系結構改變的挑戰因素時，可以得到兩項訊息，第一是體系最需要的是其本身的持久續航力，而不是延續傳統的發展目標；另外，結構因素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體系的核心動能依然是來自於結構。²⁵²

²⁵¹ 楊三億，2011，〈歐盟對中東歐地區民主化浪潮之回應〉，《全球政治評論》，第 34 期，頁 13。

²⁵² Robert Jervis, 2009,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pp. 192-200.

相對於以往傳統戰爭的避免，新興人類安全議題，其所強調的行為主體、威脅來源、安全價值以及執行手段皆不同於傳統安全的訴求，因而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此次攻擊事件對於美國而言是在冷戰結束後首次有外部勢力對美國構成直接的傷害，危害了單極體系的持久性，並且威脅來源不是來自於主權國家或單一的行為者，在此情況下，美國布希政府決議採取現實主義的考量以單邊的先制攻擊大行干戈的方式根除恐怖主義的散佈，於 2002 年發動阿富汗戰爭以及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然而反恐戰爭與傳統戰爭的本質是南轅北轍的基礎，因此也迫使美國採取更為激烈的手段以使體系盡可能回到穩定的狀態，但是隨著美國對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事的延長和無辜平民傷亡人數增加，甚至美國將擴大戰區至中亞的策略延伸出更多的安全問題，因此維持體系的穩定對單極之外的行為者也許其必要性便降低，亦即其他行為者並不需要再扈從單極體系的支配，反而對於在人類安全干預上具有專業性的歐盟而言，歐盟與美國的權力分配出現配置上的差異，歐盟在全球安全的操作設計上主要是以保護世界上不同區域的以人為本的安全，而不是去防衛以領土或特定主權國家為範圍的操作，以人類安全之理由進行戰略整合的平衡，歐盟施行其特定戰略就具有空間也能成為合法且合理的權宜工具。²⁵³

即便在結構呈現單極體系的不平衡狀態，面對非傳統戰爭的恐怖主義攻擊改變了體系的穩定，美國單極體系的操作造成更多來自非傳統安全的人類安全問題的間接傷害，當歐盟面對共同外部威脅存在時，這些外部因素會導致區域主體自主性的強化，透過對於議題的連結與擴散，將歐盟內部各會員國結合起來以抗衡

²⁵³ Mary Kaldor, and Andrew Salmon, 2006, "Military Force and European Strategy," *Survival*, Vol.48, No.1, pp. 20-24.

來自單極強權所造成的不穩定。加上美國單極體系的權力地位與軍事實力逐漸成長，但是這些必須仰賴多邊途徑的支援、美國是主要的公共財來源，以及歐盟沒有企圖以軍事手段的方式解決在反恐時期與美國的關係等三項前提，歐盟使用軟性平衡的方式以抗衡美國所帶來的區域壓力便有機可循。以下便繼續討論歐盟再軟性平衡上的實際作為，並選定糾纏外交、經濟的強化、釋放予以平衡的訊息以及區域途徑的強化作為歐盟主要軟性平衡戰略探討。

貳、歐盟的實際作為

一、糾纏外交：

美國於 2002 年 9 月 12 日透過聯合國大會演說提出制裁伊拉克的決議草案，以防範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可能。其草案內容認為一旦伊拉克違反聯合國之武檢規定，則由聯合國授權採取一切必要之手段，並且伊拉克如果阻擾聯合國武檢工作，將面臨承擔嚴重後果，²⁵⁴此外，美國認為伊拉克一直處於實質違反武檢決議之狀態亦即伊拉克違反 1991 年 687 號波斯灣戰爭之停火決議，因而得由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檢查人員參與武檢工作，並且在處理過程中遭受困境時由軍隊陪同之。²⁵⁵但即便是美國也無法確保得以免除來自國際組織在相關程序上或是外交實踐上摒棄其他國家的實質協助，因此，利用國際制度或是直接的外交行為以拖延美國之戰爭計畫，進而使美國的行動受限，削弱美國自行合理化單邊政策的正當性。美國在規劃伊拉克戰爭時先

²⁵⁴ 請參照聯合國大會第五十七屆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記錄 a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2/586/89/PDF/N0258689.pdf?OpenElement> accessed on 1 May 2012.

²⁵⁵ 同註 241，頁 26。

就聯合國之多邊授權之下對伊拉克執行強制性檢查，如果伊拉克海珊政府不聽從美國的強制性檢查則脅迫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這透露美國所欲傳達的兩項訊息，第一是對伊拉克下達最後通牒，第二則是脅迫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制裁伊拉克的決議草案。

美國這種壓迫式的單邊作為首當其衝是遭受常任理事國的制約，以及歐盟堅持依循聯合國的多邊途徑之處理方式。²⁵⁶聯合國決議草案即便在 2002 年 11 月 8 日由安理會通過成為第 1441 號決議案，但觀察實際內容發現其中由聯合國授權採取一切必要之手段制裁伊拉克，以及由軍隊陪同安理會檢查人員之項目遭到刪除，而另外修訂了伊拉克政府有遵守聯合國武檢之最後一次機會，否則才會面臨嚴重後果，以及伊拉克如果確實實質違反伊拉克之義務，則處理方式是必須先行向安理會報告，以茲後續評估。²⁵⁷

比較最初草案以及最終的決議案發現，原先由美國所主導的一旦發掘違反事實則直接制裁之處理方式，被予以修正為必須由聯合國來處理最終判決之依據，這一來一往給予聯合國更多的決策轉圜之空間與時間，而相對延宕了或增加了美國對伊拉克進行武檢的時間以及行動成本。決議案成立的過程中法國的立場最為突出，特別對於美國所提出的伊拉克武檢決議予以發出抗議，甚至英國受美國之牽連而遭受國內反對壓力，使得美國在聯合國 1441 號決議文中做了一些實質上的讓步，²⁵⁸在經過一番修正之後歐盟 CFSP 高級代表決定發出聲明表示，歐盟一致支持聯合國

²⁵⁶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02,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Iraq*. Brussels, 8884/02, Press 143.

²⁵⁷ 同註 241，頁 26-29；或請參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441 號決議文 at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2/s1441.htm> accessed on 1 May 2012.

²⁵⁸ 同註 241，頁 35。

2002 號 11 月 8 日之 1441 號決議文，並且要求伊拉克全力配合武檢工作，²⁵⁹透過此決議程序過程觀察完善發揮糾纏外交的影響力。

二、 經濟的強化：

經濟的強化分為內部貨幣整合與外部區域經濟整合兩個層面探討，首先在內部貨幣整合方面，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的簽署，創立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的目標的一致性，建立自由流通的單一貨幣與共同匯率市場，並且針對區域內各成員國進行階段性的調整以拉近彼此經濟狀況上的差異，²⁶⁰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正式批准穩定與成長公約、歐元的法律地位、貨幣匯率機制更確立了歐盟在貨幣經濟制度上的共同特點²⁶¹。

在區域經濟整合方面，歐盟為現行規模最大的關稅同盟，除了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來推動多邊自由貿易機制之外，歐盟更透過雙邊的途徑持續發展與其他單一國家或區域組織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就目前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就包括歐盟與土耳其關稅同盟、瑞士、地中海自由貿易區、智利、墨西哥、南非以及加勒比海區域，而尚處於談判階段的更包括歐盟與安地斯共同體(Andean Community)、東南亞國協(ASEAN)、中美洲區域、海灣

²⁵⁹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02,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441(Iraq)*. Brussels, 14300/02, Press 353.

²⁶⁰ 王啟明，2002，〈歐洲聯盟政策制定過程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頁 89-92。

²⁶¹ 王啟明、陳怡君、蕭倩琳，2009，〈歐洲與亞洲共同貨幣政策之發展：從比較區域研究角度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頁 132-133。

合作聯盟(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印度、韓國以及南錐共同體(MERCOSUR)的區域整合。²⁶²

歐盟透過不斷的深化本身內部經濟的強度與一致性，並且擴展與其他區域或單一國家的經濟連結，持續增加貿易以及經濟上的成長，提高多邊制度合作上的掌握，搭配本身的政治影響力，提高歐盟的國際政治地位以逐漸邊緣化美國所支配之多邊經濟制度的方式以促使美國考慮改變其政策，換取長期政治目的。²⁶³

三、 釋放予以平衡的訊息：

歐盟進行整合的進程中一直保持力圖重塑國際關係的特性，以不同的視野看待世界的發展，²⁶⁴即便歐盟內部有新成員與舊成員、親大西洋派與親歐洲派或是以英國、德國、法國三強統治的分歧，就其高度整合的成果來觀察不能否認歐盟是一個可以獨立行為的單一行為者。²⁶⁵例如歐盟的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架構的建立，2001年所舉辦的拉肯高峰會(Laeken Summit)，歐盟各成員國的最高政治領導人宣佈歐盟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已經具有自主的可操作性，並且於高峰會中制定「歐洲安全戰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SS)，如在加上快速反應部隊(Rapid Reaction Force, RRF)的成立。歐盟在安全事務上正在進行革新，此次革新使得歐盟在國際上出現更多戰略運用的空間及籌碼，以備在爆發衝突地區採取即時的有效作為，例如人類安全維護、維和行動

²⁶² 劉大年，2008，〈歐盟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策略〉，《經濟前瞻》，第119期，頁60-63。

²⁶³ 同註260，頁95-96。

²⁶⁴ 陳勁，2008，〈歐盟特性研究：關於歐盟作為一種文事力量、軍事力量和規範性力量〉，《全球政治評論》，第23期，頁103-104。

²⁶⁵ Jeffery Lewis, 2009, "EU Policy on Iraq: Th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sensus-base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6, No.4, pp. 432-433.

等。²⁶⁶歐盟增加了戰略的運用空間一來可以使本身之集體信任感提升，也可以透過非傳統軍事整合的方式表達對美國單極壓力的不滿，而進一步強化其抗衡之對應措施的基礎。

歐盟在 2003 年所公佈之歐洲安全戰略，其中恐怖主義，²⁶⁷被列為最為主要關切的威脅來源，²⁶⁸其戰略目標更指出將以威脅之解決、建立鄰邦之安全以及透過多邊主義與國際規範來處理安全問題。由上述觀察表示歐盟在反恐怖主義戰將會更加重視國際與鄰近國家之態度，進而產生協調合作，這是相對於美國單邊主義的一種新思維。於 2005 歐盟反恐戰略(EU-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中歐盟表示在對抗全球恐怖主義必須以尊重人權、維護歐洲安定並且給予其公民生存環境的安全、正義與自由的前提下，採取預防(Prevent)、保護(Protect)、追蹤(Pursue)、回應(Respond)的方式來對付例如阿富汗蓋達組織或伊拉克等問題。²⁶⁹歐盟更提出反恐怖主義行動計畫和發表一連串聲明反覆強調了三項原則，第一，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建立國際反恐怖主義聯盟；第二，要求美國軍事行動應避免傷及無辜；且第三，必須將打擊恐怖主義與宗教問題嚴格區分開。使美國在反恐怖攻擊戰爭中要發揮重要作用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²⁷⁰

²⁶⁶ 藍玉春，2010，〈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制度建構與人道救援之行動實踐〉，《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頁 77-95。

²⁶⁷ 恐怖主義、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區域衝突、失敗國家以及組織犯罪被歐盟列為安全威脅來源。請參照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3,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3-5. at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Upload/78367.pdf> 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11.

²⁶⁸ 張守珩，2009，〈歐盟反恐政策之發展與挑戰〉，《國際關係學報》。第 28 期，頁 124。

²⁶⁹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5,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Brussel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 3-17. at <http://register.consilium.eu.int/pdf/en/05/st14/st14469-re04.en05.pdf> accessed on 22 April 2012.

²⁷⁰ 「歐盟力圖在反恐鬥爭中發揮作用」，新華社，2001 年 11 月 12 日。at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HIAW/75130.htm>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1。

雖然在反恐怖主義戰略上，歐盟與美國有相同的方向，但是彼此對於「安全」或是「威脅」的定義仍有所差異。歐盟多數會員國，例如德國與法國等國對於恐怖主義的看法不同於美國，這些國家內部群眾與社會輿論並不贊同美國過度的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況且忽視國際規範，走向強迫的單極支配的擴散以解決任何安全上的問題。

四、 區域途徑的強化：

在歐盟整合的過程中，透過全球議題的連結與擴散，提高制度規範上多邊體系的範圍、降低區域內成員國實力間的不對稱、簡化內部利益差異，使得歐盟內部各成員國得以結合起來透過區域途徑的強化以因應來自單極強權所造成的外部威脅例，增加削弱單極強權的實力。例如冷戰結束之後，中東歐國家所面臨的傳統安全威脅相對降低，以往依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嚇阻外來軍事威脅變得不切實際，伴隨而來的是全球化的影響已經使得非傳統安全成為中東歐國家主要的威脅來源。對於中東歐國家安全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內部能否實現平穩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且承受外部非傳統安全所帶來的損害，而歐盟為歐洲地區解決非傳統安全最具效力的區域組織，靠攏歐盟便成為中東歐國家最佳的選擇，加上中東歐國家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歷史因素使得追求區域政治穩定為歐盟與中東歐國家結盟的主要目的，歐盟也樂於提供援助以鞏固中東歐國家社會改制的成果，使中東歐國家透過歐盟的治理過程和平解決內部長期存在的矛盾，並且歐盟藉由納入中東歐國家擴大聯盟本身治理範圍的過程，歐盟兩面逢緣以更強化區域途徑來面對區域衝突或增加本身與單極強權不合作的籌碼。

同樣的，而歐盟在解決阿富汗與伊拉克恐怖主義問題上更透過區域途徑的力量給予大量的經濟援助。在阿富汗的援助部分自從 2002 年起歐盟執委會已向阿富汗投入 18 億歐元的援助，其主要援助目的在於支持阿富汗國家發展戰略(Afghanista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以解決人道問題以及國家重建的困難，而歐盟在阿富汗援助的主要成果更包含 2002 年歐盟在阿富汗投入 2.07 億歐元支持阿富汗重建信託基金(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Trust Fund, ARTF)已建立阿富汗政府的治國能力，並且投資國家團結議程(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me, NSP)以促進共同發展計畫的執行效力，歐盟更捐獻 2.7 億歐元給予法律與秩序信託基金(Law and Order Trust Fund, LOTFA)協助確保阿富汗境內 6 萬餘名警力的薪水保障，除此之外，歐盟在健康、社會保護、除雷以及難民問題上都給予相當程度上的經濟援助，2007 至 2013 年更簽署歐盟與阿富汗國家戰略報告(EU-Afghanistan Country Strategy Paper)以增加更為廣泛的合作關係；²⁷¹在伊拉克方面，歐盟在 2003 年至 2008 年共援助伊拉克達 9.3 億歐元，其中 2003 年歐盟通過第一次援助伊拉克計畫金額為 1.42 億歐元，均以提供人道以及國家重建為主要用途，包括人道援助部門(Humanitarian Aid Department)供給 1 億歐元、歐盟快速反應機制(The European Rapid Reaction Mechanism)與亞洲暨拉丁美洲合作議程(The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Programme)共 4 千餘萬歐元，2004 年歐盟執委會更協同其他國家設定伊拉克國際重建基金措施(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Fund Facility for Iraq, IRFFI)以計劃性的方式援助重建伊拉克，於 2003 年迄 2007 年之間，歐盟匯集將

²⁷¹ 請參照歐盟執委會發展與合作-歐盟阿富汗援助網站。 at http://ec.europa.eu/europeaid/where/asia/country-cooperation/afghanistan/afghanistan_en.htm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2.

近 6 億歐元給予 IRFFI，歐盟也成為此措施中最大的援助國，共占整體基金的百分之四十二，此外，歐盟也針對法治正義、選舉過程、公共財經管理改革、基本人民健康、教育服務、難民等方面於以提供伊拉克援助。²⁷² 歐盟透過多邊的區域途徑，針對涉入人類安全問題歐盟給予阿富汗與伊拉克有別於美國單邊作為的反恐戰爭之處理方式，一方面以人類安全困境為擴大歐盟集體處理威脅的力量來源，另一方面藉由區域援助不斷的輸出以抗衡美國所採用的先制戰爭以及單邊作為的反恐途徑，最後以增加聯盟本身在整合過程所訴求的多邊利益。

歐盟採納人類安全觀為主的政策框架，進行危機管理、民間力量與軍事的協作以及衝突預防等方式訴求達到人類安全的短期結果，此結果反應在歐盟對於美國反恐戰爭的牽制，在長期戰略思考上，歐盟有別於美國單極體系的價值，其透過追尋人類安全的廣義價值規範並依照人類安全之框架作為對外政策原則的起點，這些原則包括人權的至高無上、採行具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政治權威途徑、多邊主義、由下而上的途徑、重視區域的途徑、使用合法外交工具以及武力的適當使用，以進行軟性平衡美國的單極體系所帶來對於人類安全價值的恐懼威脅，以維持歐盟以往所倡導的多邊、規範式的軟性作為。歐盟最終目的在維繫其聯盟持續生存的現實自我利益，這些利益包含必須更加完善並且鞏固歐盟區域整合的效力，促使成員國能夠在歐盟所建構的治理框架中穩定的進行互動，而非轉向扈從美國的單邊主義。歐盟修正了傳統現實主義研究以追求和平及穩定為首目的，將聯盟本身的運作利益反應在其人類安全的政策作為上，透過軟性平衡的方式來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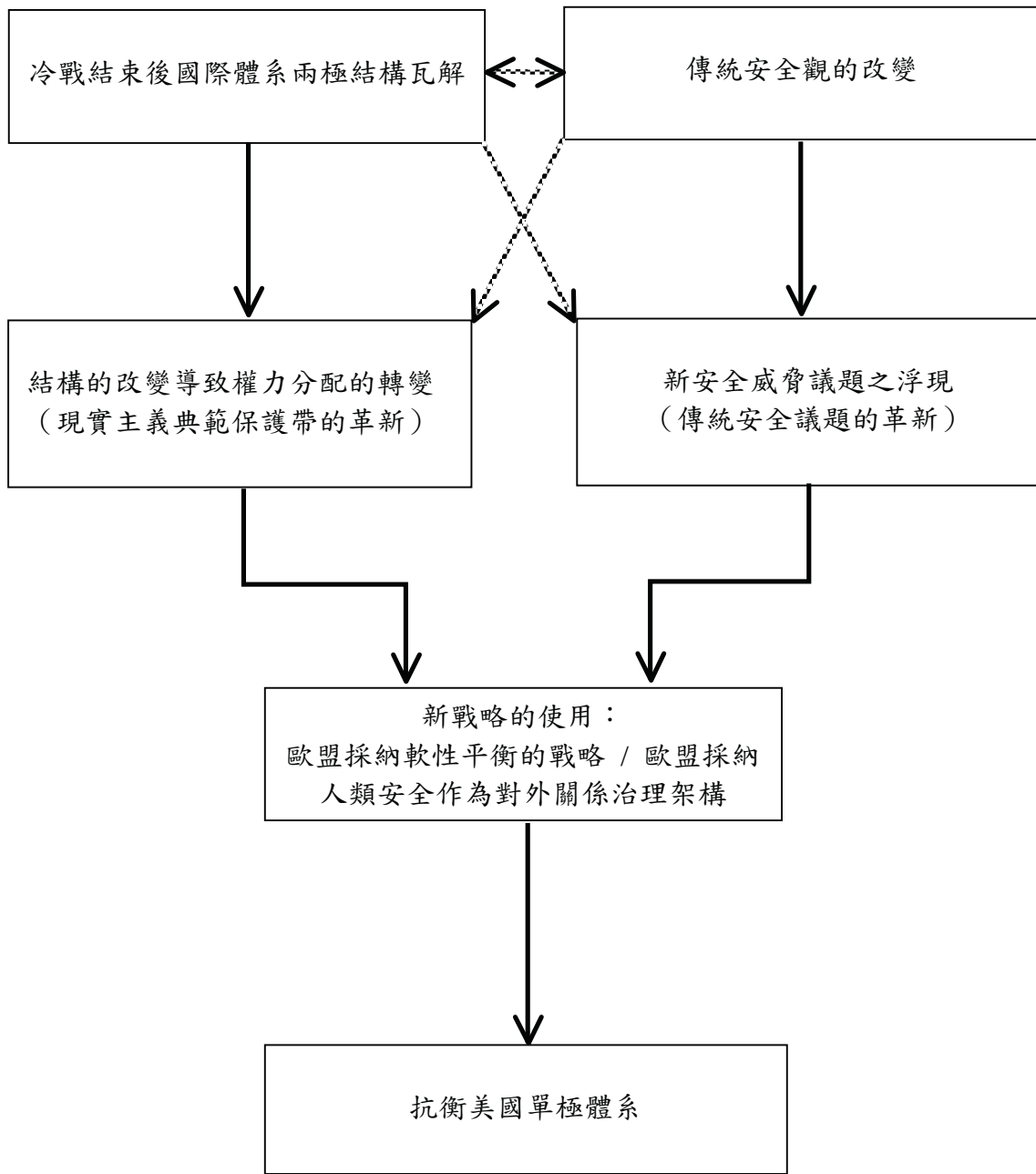
²⁷² 請參照歐盟執委會發展與合作-歐盟伊拉克援助網站。 at http://ec.europa.eu/europeaid/where/gulf-region/country-cooperation/iraq/iraq_en.htm accessed on 23 April 2012.

整與美國單邊主義的權力關係已鞏固歐盟整體治理能力的正當性基礎以及既有的規範，此為歐盟整合過程中面臨單極體系挑戰之軟性平衡回應。分析架構如圖 5-1 所示。

這些回應的效力也表現在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上台之後宣布終止反恐戰爭的新任務計畫，其中與伊拉克更簽署武力狀態協定(The Status of Force Agreement)，並於協定內容第 24 條提及將於 2011 年 12 月 31 號將所有軍事事務撤出伊拉克領土。²⁷³ 並且將未來對外政策轉為以多邊為主。歐巴馬更在 2009 年 10 月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中的致詞中也再度重申關於注重人類安全的重要性。²⁷⁴ 歐盟的軟性平衡由此觀之顯然在對外的平衡戰略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量，因而促使美國改變了在國際體系權力運作的方向，歐盟與美國之間的權力關係在軟性平衡的脈絡下獲得了修正的成效。

²⁷³ Toby Dodge, 2010, "The US and Iraq: Time to Go Home," *Survival*, Vol.52, No.2, pp.129-130.

²⁷⁴ Barack Obama, 2009,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Acceptance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請參照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cceptance-nobel-peace-prize> accessed on 14 February 2010.



—————> 表示具有直接的相互關聯性

-----> 表示具有間接的相互關聯性

圖 5-1：軟性平衡戰略實踐過程分析圖 C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小結

冷戰結束之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系提供了大部分的軍事、政治、經濟、科學以及文化的連結，美國不斷的發展全球性的多邊制度誘因而促進本身的單邊利益。

儘管如此，美國本身仍然存在許多尚未完善處理妥當的關係與新挑戰，美國面對人類安全危機恐怖攻擊採行單邊主義與先制戰爭回應發動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反而製造了更加複雜的人類安全困境，這些反恐戰爭困境反映出三項要點，亦即人類安全之實質內涵不同於傳統戰爭、美國的處理方式可能必須排除單邊主義思維，以及美國在企圖重建或干涉他國事務之途徑有必要全盤重新檢討。

依此，歐盟考量到本身在單極體系內不必受制於直接或間接安全要素的威脅，加上單極強權所發散出的誘因本質，再配合人類安全客觀環境的變因，歐盟選擇以人類安全為出發點制定解決安全問題之途徑與戰略框架基礎，以軟性平衡戰略包括糾纏外交、經濟的強化、釋放予以平衡的訊息與區域途徑的強化，抗衡美國的單極作為。引而申之，短期內得以解決人類安全的現實安全問題，於長期策劃上得以修正與美國之間的權力關係，並且依照貼近歐盟整合價值的戰略框架持續致力於可長可久的鞏固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互動關係、政策維繫與多邊整合進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軟性平衡戰略便為歐盟所必須嘗試達到解決外部與內在現實問題選項。

第六章 結論

在早先時期，人類關心自然科學的議題可能是究竟太陽與地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當時的科學家普遍認為太陽是以地球為中心，繞著地球在運轉的，這在當時被視為是常態科學，是一套典範。但是，當有另外一群科學家認為此典範產生問題時，對太陽跟地球之間的關係提出不同的看法，一場科學革命的更迭就會產生，例如伽利略所提出的太陽中心論。原先舊的典範就會完全被新的典範所取代，而且不留痕跡，全新且更具剛性定義的存立以賦予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舊的典範將不理性的被拋棄。典範的革命得以成功，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自然科學的世界裡有「正確答案」存立。然而社會科學所面臨的研究環境是多樣的符號、文字以及對社會的觀察，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透過不同的角度問為什麼，故一個社會科學理論的科學狀態或學科地位之決定標準，是端視其本身的否證、可辯駁性以及可測驗性而確定的。並且藉由標準的研究程序，不斷更新輔助性假設，排除否定硬核，而持續檢定保護帶的力量，進而以發現新事實。科學理論之間應該能夠相互並排，並且使得彼此都有科學的價值，理論應當具有多元性的哲學、批判以及更多客觀存在的事實。

傳統的理论思想，不但有助於陳述所見到的事物，且提供了許多好的研究方法，同時也讓研究者確切明白目前國際關係所關注的焦點，並指出理論本身認為重要的事項，而在某些個案上，更會形塑研究者所看到的事物提供立場。也是因為存在這些不同的論點，國際關係研究者才能在這個世界上，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思考與行動，以下便根據本文先前假設一：「理論的產出是為了有效解釋國際現狀，」來依序回答。

冷戰結束，國際情勢變遷，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面臨修正的考驗，威脅平衡論探討威脅來源才是國家行為者應該考慮的平衡因素，利益平衡論認為成本利益的算計，才是國家選擇平衡的關鍵，而階層制扈從討論國家行為者除了平衡的戰略之外還可以選擇扈從的方式以最有效益的追求生存。當安全觀產生更迭伴隨國際新安全議題的倡議，產生了新的理論困境與挑戰，因此唯有透過選擇研究程序的選定，透過有別於上述等的角度或途徑去嘗試認識、解決檢證新議題，才是展現國際關係研究者追根究柢的本質。

軟性平衡的途徑便基於此而予以採納並且修正現實主義的輔助假設，冷戰結束兩極體系瓦解，結構的改變導致權力分配的轉變，傳統講求國家安全的觀點亦受此轉變之影響產生向下、向上、水平以及垂直的新興安全議題之擴展，體現了國際關係不同的現實面，依此本論文站在軟性平衡的立場提供軟性平衡輔助性假設並且修正既有現實主義的保護帶，認為可能依此能獲得比較好的視角去解釋在冷戰結束之後的結構的議題，故本論文選擇重新思考現實主義各個學派的論證方式所提供不同的詮釋角度以有效解釋國際現狀，但並不認為結構現實主義存在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後的情況因而必須淘汰結構現實主義，反而本論文在結構現實主義邏輯概念下重頭深思權力平衡的作用，擷取其長處以歐盟軟性平衡抗衡美國之單極體系作為來補足現實主義無法有效解釋的國際現狀。

除了在理論層次之外，本論文假設二：「國際情勢的變遷也伴隨改變國家對於安全觀的認識」如下所述，當今國內社會與社

會之間的跨國互動而非遵循傳統國與國家之間的國際政治交涉的大幅度增加，是國際體系的一大轉變。國家可能已經不是國際政治最優先的研究單元，而是其他新興單元才是當今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但這並不表示國家這種人類集體行為的最高組織會消失，雖然國際體系中出現新的動力，但這些新動力不能與國家分開研究，且這些新動力的發展過程中不能沒有國家的參與。²⁷⁵ 歐盟其特殊的角色，產生其獨特有別於傳統權力平衡的權力主導方式，配合安全觀的更迭，當面臨人類安全議題的考驗時，來自安全的行為主體、安全的威脅來源、安全的價值、追求安全的手段以及人類安全議題所需要考量的成本付出必須是有別於傳統安全的假定，必須重新認識且省思歐盟的對外戰略思維。因而假設三：「歐盟考慮本身權力配置的問題而採用軟性平衡手段抗衡美國的單極體系」獲得初步答案，這些改變提供歐盟一個重新定位短期戰術與長期戰略的機會，並且進一步修正與美國的權力關係，一方面在短期戰術部分歐盟以及美國在 2002 年阿富汗與 2003 年伊拉克反恐戰爭所衍生出來更多的人類安全為主軸進行對人類安全問題區域予以提供援助與安全上的保障，然而進一步探究歐盟主要長期戰略目的則在進行對美國長期戰略性權力平衡的修正。

美國於冷戰結束後挾帶單極體系的優勢地位建立多邊制度以推動單邊利益，由於美國除了長期提供安全保護傘的保護之外，尚例如促進經濟條件的誘因等，使得歐盟排除傳統軍事權力平衡的考慮改採以非軍事性的聯盟或外交工具進行拖延、阻止或是削弱美國單邊主義的效力並且增加單邊主義行動上的成本，歐盟透過制定人類安全框架來訴求國際體系回到一個具合法性與正當性

²⁷⁵ Gunnar Sjöstedt, 1977, "The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Power: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12, No.1, p. 21-22.

的政治權威的治理模式，亦即主權國家必須在聯合國架構之下行為、多邊主義的強調，透過多個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以產出適當的外交政策、由下而上的途徑，關注人權的重要性、重視區域途徑的治理模式、以及合法的外交工具、以及武力的適當使用等，本論文發現歐盟最終的目的在追求聯盟本身多邊制度上的鞏固與維持，藉由人類安全的框架以制定對外戰略，透過人類安全的合理化原則以藉由軟性平衡的方式平衡美國單極體系下的作為特別是在反恐戰略上，進而強調並且鞏固歐盟本身成員國之間的行為規範，以使未來的歐盟整合過程能夠更具歐盟治理架構之深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本論文涉及兩項概念，軟性平衡以及人類安全觀，是研究國際關係的新興概念。人類安全反應了一種以人為根本的安全觀念，其襯托出在全球化的世界裡，研究者所應該注意的是來自哪些安全方面的威脅；軟性平衡雖然在理論層次上，也許尚有許多待討論以及辯論的空間，但是歐盟在抗衡美國反恐怖主義戰爭中有效的以軟性的方式抗衡美國所支配的單極結構壓力，確實由論文研究當中可以觀察得知。

日後，人類安全以及軟性平衡的研究依然是值得國際關係研究者繼續開發關心的概念。本論文選擇從歐盟在反恐怖主義戰爭為主要佐證案例，以軟性平衡的視角來觀察問題，即便如此，現有對於軟性平衡的研究文獻比較多是專注在理論層次的辯論，或是將其與傳統軍事議題做連結，反而忽略在其他議題上焦點。本論文希冀透過此次研究能夠提供更多元的詮釋，以增加研究合理度。傳統權力平衡理論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是在硬性的，例如結構層次上的軍事問題，但是冷戰結束之後，兩極體系瓦解，傳統權

力平衡支持者雖然認為權力平衡會再度出現，確沒有明確解釋將是以何種方式再創造權力平衡。本論文提供軟性平衡的新型態的權力平衡使由基本面進行反思與批判，在這個角度，藉此也期盼能夠提供一個關於未來歐盟整合研究的新觀察架構以使研究更能貼近於「現實」。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分

一、專書

- 林碧炤，1997，《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
- 邱泯科、陳佳穎、蔡毓智、姜馨彥譯，Earl Babbie 著，2004，《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台北：雙葉。
- 倪世雄，2003年，《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信強譯，2003，Kenneth N. Waltz 著，《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高德源譯，2002，Jack Donnelly 著，《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台北：弘智文化。
- 秦亞青譯，2005，E. H. Carr 著，《20年危機（1919-1930）：國際關係研究導論》。北京：世界知識。
- 秦亞青譯，2008，Alexander Wendt 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
- 徐宗國，2008，〈紮根理論研究法：淵源、原則、技術與涵義〉，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黃偉峰，2007，《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台北：五南。
- 陳牧民，2009，《國家安全理論：權利、主權與威脅》，台北：五南。
- 張保民譯，1976，Inis L. Claude Jr. 著，《權力與國際關係》。台北：幼獅文化。
- 詩正鋒主編，2004，《人類安全》，台北：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

教基金會、台灣心會。

潘明宏、陳志瑋譯，C. Frankfort-Nachmias and David Nachmias 著，2003，《最新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韋伯。

蕭瑞麟，2007，《不用數字的研究：鍛鍊深度思考力的質性研究》，台北：台灣陪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刊

王啟明，2002，〈歐洲聯盟政策制定過程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5期，頁87-110。

王啟明、陳怡君、蕭倩琳，2009，〈歐洲與亞洲共同貨幣政策之發展：從比較區域研究角度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25期，頁117-150。

王崑義，2002，〈美國的反恐怖主義與國際安全：兼論九一一事件以後臺海兩岸的處境〉，《遠景季刊》，第3卷第2期，頁137-183。

甘逸驊，2008，〈歐盟與美國的權力關係：柔性平衡的適用〉，《問題與研究》，第47卷第2期，頁1-19。

巨克毅，2004，〈國際恐怖主義蓋達（al-Qaeda）組織的意識型態與策略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6期，頁1-17。

吳坤暉、吳穎錫，2006，〈阿富汗與美國西方文明的衝突：以塔利班政權為例〉，《國際文化研究》，第2卷第3期，頁109-136。

林泰和，2011，〈歐洲聯盟打擊恐怖主義洗錢措施之演進與展望：後911的政策研析〉，《歐洲國際評論》，第7期，頁29-63。

林碧炤，2010，〈國際關係的典範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29期，頁11-67。

- 卓忠宏，2011，〈歐盟南向政策之發展與爭辯〉，《政治科學論叢》，第48期，頁1-32。
- 周煦，2002，〈美國與阿富汗關係的演變〉，《歷史月刊》，第168期，頁48-53。
- 洪鑣德，2010，〈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批判理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6卷第3期，頁1-30。
- 洪鑣德，2011，〈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學說中的挑戰與定位〉，《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7卷第2期，頁93-128。
- 莫大華，1996，〈「安全研究」之趨勢〉，《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9期，頁61-78。
- 莫大華，1998，〈「安全研究」論戰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8期，頁19-33。
- 張惠玲，2000，〈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1期，頁49-70。
- 陳一新，1992，〈美國在「單極為主多極政經體系」的新地位與新挑戰〉，《美國月刊》，第7卷第2期，頁4-16。
- 陳文生，2004，〈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1441號決議案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3期，頁23-44。
- 陳文生，2009，〈Waltz 制衡假設之檢視：以波斯灣三次衝突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40期，頁43-80。
- 陳勁，2008，〈歐盟特性研究：關於歐盟作為一種文事力量、軍事力量和規範性力量〉，《全球政治評論》，第23期，頁101-136。
- 黃偉峰，2004，〈歐盟政治研究中理論方法之分類與比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5卷第4期，頁539-594。
- 黃鴻釗，2002，〈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度〉，《歷史月刊》，第168期，頁40-47。

- 張守珩，2009，〈歐盟反恐政策之發展與挑戰〉，《國際關係學報》。第 28 期。
- 楊三億，2008，〈波蘭 1990 年代憲政改革：制度變遷與社會學習之歐洲化過程〉，《全球政治評論》，第 24 期，頁 90。
- 楊三億、林佑勳，2010，〈歐盟人類安全議程與軟平衡之實踐〉，《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通訊》，第 30 期，頁 15-22。
- 楊三億，2011，〈歐盟對中東歐地區民主化浪潮之回應〉，《全球政治評論》，第 34 期，頁 13-20。
- 楊吉林，2010，〈反美主義與布希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之探討〉，《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 3 卷第 2 期，頁 405-446。
- 蔡育岱、譚偉恩，2007，〈再思人類安全研究〉，《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32 期，頁 53-58。
- 蔡育岱、譚偉恩，2008，〈雙胞胎或連體嬰：論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之關連性〉，《國際關係學報》，第 25 期，頁 77-118。
- 蔡育岱，2010，〈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屬：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主義〉，《全球政治評論》，第 29 期，頁 1-28。
- 蔡育岱，2011，〈蓋達組織與賓拉登年代恐怖活動之概況回顧〉，《全球政治評論》，第 35 期，頁 13-18。
-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頁 1-17。
- 潘忠歧，2004，〈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理論衝擊與困惑〉，《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3 期，頁 1-7。
- 盧倩儀，1999，〈從歐盟移民政策決策過程譚自由派政府間主

- 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頁 19-32。
- 盧倩儀，2007，〈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頁 33-34。
- 盧倩儀，2010，〈整合理論與歐盟條約修改之研究：以歐盟憲法條約與里斯本條約為例〉，《政治科學論叢》，第 46 期，頁 111-158。
- 龍舒甲，2002，〈從石油利益論「九一一事件」後的中亞地區與其周邊情勢〉，《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6 期，頁 109-122。
- 藍玉春，1999，〈有關歐洲統合的論戰及其實踐：聯邦派 vs. 主權派〉，《政治科學論叢》，第 11 期，頁 181-228。
- 藍玉春，2009，〈從社會建構主義探討形塑中的歐洲認同〉，《全球政治評論》，第 25 期，頁 81-116。
- 藍玉春，2010，〈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制度建構與人道救援之行動實踐〉，《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頁 77-96。
- 譚偉恩，2006，〈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22 期，頁 149。
- 蘇宏達，2010，〈從自由政府間主義解析里斯本條約的發展過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2 期，頁 1-38。
- 劉大年，2008，〈歐盟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策略〉，《經濟前瞻》，第 119 期，頁 60-63。

三、學位論文

- 呂光耀，2008，《「九一一」事件後歐盟反恐政策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吳振逢，2010，《從德國聯邦制度論歐洲聯盟整合趨勢》。台

北：淡江大學博士論文。

陳俞之，2010，《人類安全之應用與實踐研究：以失敗國家索馬利亞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四、報章資料

新華社，2001年11月12日，〈歐盟力圖在反恐鬥爭中發揮作用〉，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HIAW/75130.htm> 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11.

貳、英文部分

(I) Books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arnett, Michael, and Duvall, Raymond eds., 2005,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mberg, Elizabeth, and Stubb, Alexander, eds., 2003, *The European Union: How Does It Work?*. Oxford.

Brauch, Hans Gunter, Spring, Ursula Oswald, Grin, John, Mesjasz, Czeslaw, Kameri-Mbote, Patricia, Behera, Navnita Chadha, Chourou, Bechir, and Krummenacher, Heinz eds., 2009, *Fa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nvironmental, Human, Energy, Food, Health and Water Security Concepts*. Springer.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Waever, Ole, and Wilde, Jaap de,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Castetter, William B., and Heisler, Richard S., 1977, *Developing and Defending A Dissertation Propos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ohen, Benjamin J., 2008,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ths, Martin, 2001, *Fifty Key Think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ylor and Francis.
- Ikenberry, G. John ed., 2002,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Balance of 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ohn, and Mastanduno, Michael eds., 200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Robert H., and Sørensen, Georg, 2003,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lstrup, Morten and Williams, Michael C.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US: Routledge.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atos, Imre, and Musgrave, Alan eds., 1970,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e, David A., and Morgan, Patrick M. eds., 1997, *Regional Orders:*

-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 David, and Stoker, Gerry, 2002,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 NY: Palgrave Macmillan.
- Mingst, Karen A. and Snyder, Jack L. eds., 2001,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1st ed. NY: Norton Company.
- Mingst, Karen A. and Snyder, Jack L. eds., 2004,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2nd ed. NY: Norton Company.
- Morgenthau, Hans,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Niou, Emerson M. S., Ordeshook, Peter C., and Rose, Gregory F., 1989, *The Balance of Power: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ul, T. V., Wirtz, James J., and Fortmann, Michael eds., 2004,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pper, Karl,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sse, Thomas, Cowles, Maria Green, and Caporaso, James, 2001,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othstein, Robert L., ed., 1992,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Schimmelfennig, Frank, and Sedelmeier, Ulrich, 2005,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tke, Oliver, and Yekelchik, Serhy eds., 2008, *Europe's Last*

Frontier. London: Palgrave.

Silbergh, David M., 2001, *Doing Dissertations in Politics: A Student Gui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trange, Susan, 1994, *States and Market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I) Journal Articles

Baldwin, David A., 1995,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48, pp. 117-141.

Baldwin, David A., 1997,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1, pp. 5-26.

Ball, Terence, 1976, "From Paradigms to Research Programme: Toward a Post-Kuhnia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0, No.1, pp. 151-177.

Brooks, Stephen G., 1997, "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1, No.3, pp. 445-477.

Brooks, Stephen G., and Wohlforth, William C.,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p. 72-108.

Checkel, Jeffrey T., 2005,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4, pp. 801-826.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Snyder, Jack, 1997,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Degenerate Allian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pp. 919-922.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7,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1, pp. 65-97.
- Corbey, Dorette, 1995, “Dialectical Functionalism: Stagnation as a Booster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2, pp. 253-284.
- Dodge, Toby, 2010, “The US and Iraq: Time to Go Home,” *Survival*, Vol.52, No.2, pp. 129-140.
- Evans, Gareth, 2004, “When is it Right to Fight?,” *Survival*, Vol. 46, No. 3, p. 59-82.
- Glaser, Charles L., 1995,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50-90.
- Glasius, Marlies, and Kaldor, Mary, 2009, “Individual First: A Huma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pp. 62-82.
- Goh, Evelyn, 2008,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y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pp. 113-157.
- Grieco, Joseph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p. 485-507.
- Haas, Ernst B., 1961,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5, No.3, pp. 366-392.
- Haftendorn, Helga, 1991,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1, pp. 3-17.
- He, Kai, and Feng, Huiyun, 2008, “If Not Soft Balancing, 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ecurity Studies, Vol.17, pp. 363-395.

Herz, John H., 1950,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pp. 157-180.

Hoffmann, Stanley, 1986, "Hedley Bull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2, pp. 179-195.

Hsiung, James C., 2002, "Pacific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Order." *Asian Affairs*, Vol. 29, No. 2, p. 99-116.

Ikenberry, G. John, 2001,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5, pp. 191-212.

Ikenberry, G. John, 2007,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Survival*, Vol.43, No.4, pp. 19-34.

Ikenberry, G. John, Mastanduno, Michael, and Wohlforth, William C., "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pp. 1-27.

Jervis, Robert, 1999,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pp. 42-63.

Jervis, Robert, 2009,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pp. 188-213.

Kaldor, Mary, and Salmon, Andrew, 2006, "Military Force and European Strategy," *Survival*, Vol.48, No.1, pp. 19-30.

Kelly, Robert E., 2007,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9, No.2, pp. 197-229.

Keohane, Robert O., 2001,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pp. 1-13.

- King, Gary, and Zeng, Langche, 2001, "Explaining Rare Ev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p. 693-715.
- King, Gary, and Murray, Christopher J. L., 2002,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p. 585-610.
- Kotsopoulos, John, 2006, "A Human Security Agenda for the EU?" *European Policy Center Issue Paper*, No. 48, p. 1-22.
- Lakatos, Imre, 1968, "Criticism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 Vol.69, pp. 149-186.
- Lake, David A., 2007,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pp. 47-79.
- Lake, David A., 2003,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3, pp. 303-323.
- Lewis, Jeffrey, 2009, "EU Policy on Iraq: Th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sensus-Base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6, No.4, pp. 432-450.
- Lieber, Keir, and Alexander, Gerard, 2005, "Waiting for Soft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p. 109-139.
- Mastanduno, Michael,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 pp. 49-88.

- Mearsheimer, John J.,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pp. 5-49.
- Mearsheimer, John J.,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0, pp. 160-162.
- Moravcsick, Andrew, 1997, "Taking Preference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 pp. 513-553.
- Nexon, Daniel H., 2009,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61, No.2, pp. 330-359.
- Oye, Kenneth A., 1985,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pp. 1-24.
- Paul, T. 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 46-71.
- Parsons, Craig, 2002,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pp. 47-84.
- Paris, Roland, 2001,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p. 87-102.
- Pape, Robert A.,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 7-45.
- Pollack, Mark A., 1997, "Delegation, Agency,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1, No.1, pp. 99-134.
- Rendall, Matthew, 2006,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2, No.3, pp. 523-540.

- Rotberg, Robert I., 2002,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Failu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25, Vol. 3, pp. 85-96.
- Ruggie, John Gerard,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pp. 855-885.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1,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1, pp. 47-80.
- Schroeder, Paul,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108-148.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 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2, pp. 159-201.
- Simon, Steven, and Benjamin, Daniel, 2002, "The Terror," *Survival*, Vol. 43, No. 4, p. 5-18.
- Singer, P. W., 2002, "AID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rvival*, Vol.44, No.1, pp. 145-158.
- Sjöstedt, Gunnar, 1977, "The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Power: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2, No. 1, p. 21-39.
- Snyder, Jack, and Vinjamuri, Leslie, 2004, "Trials and Errors: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in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pp. 5-44.
- Stein, Arthur A., 1982,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pp. 299-324.
- Strange, Susan, 1994, “Wake up, Krasner ! The World Has Chang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pp. 209-219.
- Tang, Shiping,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3, pp. 587-623.
- Waltz, Kenneth N.,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p. 21-37.
- Waltz, Kenneth N., 1993,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pp. 44-79.
- Waltz, Kenneth 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2, No. 4, pp. 693-700.
-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pp. 5-38.
- Walt, Stephen M.,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ecial Edition: Frontier of Knowledge, pp. 29-32+34-46.
- Walt, Stephen M., 2001,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3, pp. 56-78.
- Walt, Stephen M., 2009,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pp. 86-120.
-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pp. 71-81.
- Wolfers, Arnold, 1952,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4, pp. 481-502.
-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 “The Security of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pp. 5-41.

(III) Conference Papers

Kedem, Nadav, 2009, “Soft Balancing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System,”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09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ebruary 15-19, New York: NY, pp. 1-40.

Kedem, Nadav, 2010, “Soft Balancing After ‘After Victory’: A Two Tier Approach,” *Pap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10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ebruary 17-20, New York: NY, pp. 1-43.

參、網路文獻資料與報告書

Barack Obama, 2009,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Acceptance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cceptance-nobel-peace-prize> accessed on 14 February 2010.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2003,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pp. 3-5. at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Upload/78367.pdf> 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11.

The 2005 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http://www.un.org/summit2005/documents.htm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at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1994/>

Ian Manners, 2005, “The European as a Normative Power in Global Policy,” pp. 3-5. at <http://www.psa.ac.uk/2005/pps/Manners.pdf>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1.

Javier Solana, 2004, “A Human Security Doctrine for Europe: The Barcelona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Europe’s Security Capabilities,” *Europe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CFSP*. Barcelona, pp. 1-35. at http://eprints.lse.ac.uk/40209/1/A_human_security_doctrine_for_Europe%28author%29.pdf accessed on 24 May 2010.

Richard N. Haass, 2008,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from May/June 2008 issu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397/richard-n-haass/the-age-of-nonpolarity> accessed on 10 March 2011.

肆、官方網站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Index_en.htm

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homepage.aspx?lang=en>

歐盟對外行動（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http://www.eeas.europa.eu/Index_en.htm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ttp://www.un.org/Docs/sc/>

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ga/>